泉

新加坡海南会馆出版 2013-01期
Singapore Hainan Hwee Kuan's Publication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 MICA/P/138/11/2013 | ISSN 1793-8538

泉主编的话：

·以双语文迎合今日读者·

《馆讯》已经出版了三期，但是，它和《泉》的内容涵盖量与编版方式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本馆本届理事会都一致把《泉》视为一本独立性的综合杂志，文章内容与编版形式可以给予突破。

理事会对《泉》的要求，确给编者带来几许压力。我要如何去突破内容题材和排版形式与旧《泉》有别呢？我首先想到得使文章内容更具多样化；甚至采用“中英双语文”同时刊出，这才可迎合今日一般读者的新需求。好，就按这个要求请作者赐稿。

我也是本年度大专奖助学金甄选委员之一。在同诸申请者相互交流中，发觉一些青年学有专长；且有能力“握笔”，于是，盛情邀请他们加入《泉》的作者阵容。我想：这就是“就地取材”呀！

这一期的《泉》是“停刊”颇久后重生，但是，却以新面貌和读者见面。作者群中包含了老、中、青，以海南籍作者居多，当中包括新马不同籍贯和年龄层的名家学者，乐意为《泉》笔耕。将自己的真知卓见发表于《泉》，让《泉》成为华社“灯塔”；让《泉》成为新加坡社会琼籍族群言谈和文化“指南”的天地。只要大家不分彼此派别；群策群力，我们该有信心落实这份重托的文化使命。

就从这期的内容读来，我们可以说：它的内容实较过去更具深广度且更多元多彩。近几年来，华社各个层面对讲华语用华文的课题一直备受关注；也令国人感到忧心忡忡。曾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的黎经富博士(琼籍)的专题：《深思，别成为新加坡的华裔》一文，其论述点真值得读者们细读并好好去深思远虑。华校这百年来的兴衰和命运，也教热心兴学者深深慨叹，资深学者兼作家周维介(琼籍)的《华校百年轮廓》一文也一样值得兴学者共同回顾前瞻与深入探讨。

新加坡海南籍美术家、作家以及其他艺坛者乃为数不少，但能获得‘国家文化奖’者为谁？何和应便是2012年的获奖者。《泉》这期，特别刊载获奖者同学曾炽豪撰写与之有关的文字，可让读者更进一步去认识这名我国文化奖得奖人是怎么样走入艺术世界。

中外历史人物有很多是教人缅怀的。大马著名女作家兼画家朵拉的《孙中山和槟城五层楼》一文，让国人站在“新加坡晚晴园”一个位置去“追踪”孙中山在槟城一角的历史故事。这可增进国人对历史产生兴趣，也藉历史去启发人生。

在许多历史事件中，有关‘南洋机工’的历史课题是与‘琼帮人’有关。侯公撰写《林秋雅牵动了“海南南洋机工”的情缘》的这篇文字，是表扬大马槟城琼籍女儒商林秋雅对‘南洋机工史’的关注与推动。今日有多少年轻人对这项历史事件表示关注呢？

“口福”是新加坡饮食界有口碑的。东主庞琳不谈经济课题，作家李喜梅的《富而好礼，承先启后》是针对庞琳从人文社会看人生的宏观课题，他的想法和见解很值得国人一起探讨。这和知名学人陈荣照博士“谈儒家与互动和对话”相关，读者们可以同时给予进行关注与思考。

本期刊的其他重要文章，尚有：汪来昇、黄韵仪、陈文慧联合撰写的：《梁文福——新加坡派族群与国家结构》、吴先皓的《我们现代文化中的西方影响》、王汉逸的《通过艺术与设计看事物的普世方法》、王大銓的《我在国大当义工经验的反思》等等篇章又是知识又是经验，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陈川强

(写于飞往迪拜机上，打字于迪拜公寓18楼书桌)

本刊同仁祝愿：海南乡亲及各界读者2014年新春进步、马到成功！

督印兼顾问:
潘家海

顾问:
陈泽平

执行主编:
陈川强(烈浦)

编委:
陈经源、王永炳博士、韩进元

设计、分色、承印: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 6745 8733
Fax : (65) 6745 8213
Website: www.pcl.com.sg

国际书刊号:
MICA/P/138/11/2013
ISSN 1793-8538

出版日期:
2013年12月

目录：

馆慧：

05 新加坡海南人的姓氏公会 文：王兆炳

13 今日的会馆社团能为新加坡社会做什么? 文：何子煌博士

15 殷殷寄望 于海南会馆 文：王一白

17 中华文史班25周年感言 文：韩山元

馆智：

18 富而好礼 承先启后 ——庞琳PBM先生分享人文关怀憧憬 专访：李喜梅

21 深思，别成为新加坡的华裔 文：黎经富博士

23 新加坡华校百年轮廓 文：周维介

36 从“儒家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谈儒家与宗教的文明对话 文：陈荣照博士

馆艺：

38 我所认识的何和应学长 文：曾炽豪

42 新加坡琼剧概况与未来发展途径 文：王永炳博士

46 从泰国海南作家的作品中理解乡亲多元生活思潮及对待人生 文：烈浦

50 乡亲情谊——泰国海南文友联谊会成立十六周年怀思 文：陈爱妹

51 梁文福《新加坡派》：族群与国家的建构 文：汪来昇、黄韵仪 、陈文慧

57 《蝉声处处》的陈忆 文：莫河

59 着手推展海南武术与中华武术并驾齐驱的时候 文：川强 · 讯

61 通过艺术与设计看事物的普世方法 文：王汉逸

64 谈动画艺术 文：冯静微 撰文(英) 何良 译文(中)

66 桥牌简介 文：许禄文

馆谊：

67 天佑的人生三爱 文：王永炳博士

70 林秋雅牵动了“海南南洋机工”的情缘 文：侯公

72 与峇淡岛一同成长的年轻企业家——王家财 文：符慧平

泉每期专论：

共同朝着崭新的期望……

一转眼又是2013年的岁末了。大家回首看看，万事中有喜也有悲；这也是每一国每一地每个社会常见的事态起伏。哪一些是喜？哪一些是悲？从不同大环境不同社会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彼此都有各自的结论而不奇矣。

《泉》在这岁末的当儿，根本是没有条件去谈周围林林总总的变化和得失。

如何开展《泉》的未来前程才是《泉》当前的期望与职责。在全国的华社里，由宗乡总会出版的《源》，是代表了华社乡团并反映了全国乡团的所思所欲。我们要为《源》的20多年来的努力表达心中的赞赏，它直接或间接反映或提供了华社不同组织在文化生活上诸多需求和欲望。

《泉》是华社中仅是代表海南乡亲为社会文化献出一份小力量，我们需要《源》的扶持；至少我们可从‘合作’开始：今后如何共同去推广文化范围的活动以促进全国华社文化热量。

今天，要把文化搞‘热’，不只是政府要下足力量；民间的核心力量是不可漠视的。《泉》非常乐观并愿意付出这份“泉力”同《源》的主力一起加强‘推波逐浪’把文化甚至文艺的气势撼动高潮，这是可以期望与期待的。

在文教与艺术圈中，我们有不少海南乡亲在这方面具有能源力量；我们希望这群‘火种’要自我珍惜和发挥并供分享知识；分享情趣；分享快乐至无穷无尽。

不分年龄层的乡亲们，学有不同专长的乡亲们；至祈你们把各己的学习心得和生活经验‘献’给《泉》。让《泉》在未来一期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元性。只有大家共同努力耕耘，才能使《泉》生色；使《泉》活在乡亲心间；为中华文化发光发热。

2014年就快到跟前了，也就是骏‘马’来临！《泉》编委同仁谨此恭贺乡亲及各界友好：马到成功，福降身边。

馆知：

74 我在国大当义工经验的反思 文：王大铨

79 我们现代文化中的西方影响 文：吴先皓

81 女子足球日益引人注目 文：陈慧仪

83 2013年终总结 文：王贞嬉

馆谭：

85 孙中山和槟城五层楼 文：朵拉

泉会长 发刊词：

潘家海的《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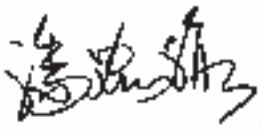
在海南乡亲们的殷殷期盼中，《泉》终于破土而涌出了。

去年会员大会选出的新理事会，至今虽然还面对着一些不确定因素，但依然坚守一本服务族群原则与热诚，积极展开并全力以赴地完成各项有关海南族群福利事宜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譬如为了与族群及全体会员达到更好的沟通交流、增加彼此的互动互惠，本馆“文化、教育与出版委员会”负责出版《馆讯》（季刊）及《泉》（半年刊）刊物，如今都一一落实了，令人感奋不已。

《馆讯》与《泉》各负其不同任务，《馆讯》主要向全体会员及乡亲介绍海南会馆的会务进展与会馆及其属下各乡团组织的活动情况，目的是方便会员及乡亲们的了解并提供参与活动的管道。《泉》则视为海南会馆具有代表性的刊物出版，着重于介绍论析与海南族群相关的文化、教育、医疗、历史、人物及企业等等课题与专论，内容涵盖面广泛而多样。难能可贵的是，海南会馆与时并进所设立的“网络与资讯委员会”能及时地把《馆讯》及《泉》的内容在网页上刊登，让所有关心海南会馆会务及海南文化的人士游览。

《泉》的出版，意义更在文字之外，它可作为海南族群的精神粮食，提高族群的团结意识。《泉》无水则干涸，成为无用之泉，所以，我们应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泉》成为源泉活水，涌流不断，生生不息。

身为会长，在此恭贺《泉》的成功出版之余，我要特别感谢本馆“文化、教育与出版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与无私的奉献，也恳切吁请馆员乡亲们敞开海量，群策群力地促进与充实《泉》的质量，为发扬海南文化进而为中华文化做出积极贡献。



2013 • 12 • 09

位于荷罗卫巷之琼崖林氏公会旧址，匾额字体即林森所题

新加坡海南人的姓氏公会

文：王兆炳

【新加坡海南会馆和琼崖王氏祠联办专题讲座，已于2013年3月23日(星期六)下午2:30至4:30，在海南会馆礼堂举行，由王兆炳主讲：《新加坡海南人的姓氏公会》，下文即当天讲稿的详细内容。】

新加坡1965年独立之后，社会逐渐倾向西化，加上城市重建计划实施，富于华人传统文化、民俗色彩的血缘、地缘团体，如姓氏公会、同乡会都面对了非常大的冲击。一是会所搬迁问题；一是会员递减问题。算算过去50年来的变化，以海南帮群来说，至少有11间同乡会，和2间姓氏公会解散，值得庆幸的是大部份的姓氏公会、同乡会都保留下来，继往开来为同乡、宗亲服务和作出无私的贡献。

姓氏公会、同乡会命运的转捩点是1976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庞大的经济潜力牵动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寻根问祖热潮，姓氏公会、同乡会也在这一波中水涨船高。近年来由海外姓氏公会、同乡会所主办的不同类型的“世界同乡联谊会”，“世界同宗恳亲会”，都是这时期的产物。我想这时候谈谈新加坡海南人的姓氏公会，应该是恰当的。我的主讲内容主要集中在殖民地时代从1887年至1963年这段时间的姓氏公会。

一、华人的姓氏来源

首先了解华人的姓氏来源，中国周代以前，“姓”和“氏”代表的是不同的意义。大家注意，“姓”字旁是女字，原来中国古代曾经历过一段“母系社会”。基本上，从古代留下来的，今天还在继续用，凡有女字旁的姓氏，都是“母系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见证，如姚、姬、姒、姜等。

“氏”是中国从“母系社会”进入“父族社会”之后，男性在朝廷当官被皇帝封赐的各类称号。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1. 以国名为姓氏，如韩、宋、郑、吴、秦等。

2. 以邑名或居住地为姓氏，如苏、东郭、南郭等。

3. 以先人的名或字为姓氏，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姓林、齐国大夫童刁，其后代姓刁。

4. 以排行为姓氏，如春秋鲁国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

5. 以官职为姓氏，如司马、司徒、司空等。

6. 以技艺为姓氏，如巫、卜、屠、陶等。

7. 以谥号为姓氏，如楚庄王之后为庄氏、周武王之弟康叔之后为康氏。

可以这么说，姓氏不但是一个家族的符号，也是一个人的符号。一个有姓氏的人，就有了关于自己身世的线索，也就有了可追寻的祖先。

目前全中国有22,000个姓氏，中国第1个姓氏是风。

二、新加坡海南人的姓氏

新加坡海南人的祖先来自中国海南岛，因此新加坡海南人的姓氏也和中国本土的姓氏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至于海南人什么年代来新加坡？由于缺乏原始资料，已难确定。但根据一些海南帮群的零星资料，显示1819年莱佛士开埠之前，已有海南人在新加坡的山芭里从事种植业。至于海南人大批移民新加坡则是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事。1881年，也就是琼州天后宫重建完成后的第二年，英殖民地政府的人口普查记录，当时海南人有8,319人；2000年新加坡民选政府的人口普查，海南人有167,590人；目前的海南人，根据海南会馆潘家海会长说有230,000人。看来新加坡的海南人口逐年增长，是很好很好的现象。

谈到新加坡海南人的姓氏似乎没有人统计过，我最近就根据海南会馆所留下的有限资料，作了一个有限的统计。1964年，海南会馆的馆员有2,283人，其中永久馆员1,607人；普通馆员676人。而馆员的姓氏也作了统计，共有106个，其中已组织成公会的有24个。另外我又作了一个统计，把属于24个姓氏公会的海南会馆馆员和其他82个尚未组成姓氏公会的姓氏的馆员作一比较，结果发现前者有1,727人，占总人数的76%；后者556人，占24%。

这样看来，可作一推论，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海南人最大姓氏是已组成公会的24个姓氏。不过，遗憾的是琼崖邢氏公会已于2000年解散，而琼崖谢氏公会也于2001年解散，目前只留下22个姓氏公会了。

三、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起源

姓氏公会和同乡会，都是我们的先贤含辛茹苦，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谋生所留下来的珍贵遗产。可想像到，他们早期南来并不会想到组织姓氏公会或者同乡会，要的是现实的寄宿之所，这就是移民时代海南人“公司楼”、“楼仔”或“隆帮馆”(海南话“公司楼”的别称)的来源。所谓“公司楼”，是共同宿舍的别称，最初由数位早来的同乡或同宗合租一间房或店屋，费用共同分担。后到的同乡或同宗也可寄宿，这就称为“公司楼”。在过去，同乡的“公司楼”叫做“友滙楼”，同宗的“公司楼”叫做“兄弟楼”。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海南人的“公司楼”最少有200间以上。

我作过海南帮群的研究，发现海南人的第一间“公司楼”是琼州天后宫。1857年11月24日，两位海南先贤韩旺彝(韩亚二)和王志德向东印度公司购买位於玛拉岑街31、32、33号三间店屋，作为“琼侨海员聚会寄宿之所”，所谓“琼侨海员聚会寄宿之所”不就是“公司楼”吗？内供奉妈祖、水尾圣娘、昭灵一百零八兄弟诸神，可说是琼州天后宫的由来。

我过去在海南会馆和琼州天后宫活动了20余年，当时海南社会喜欢争执的问题是先有“馆”还是先有“宫”？其实“馆”也好，“宫”也好，都属于海南人的产业，谁先谁后都不重要。但如果一定要探讨，我个人的观点，是先有“宫”后有“馆”的。因为英殖民地政府1890年实施“社团法令”之前，除了有宗教色彩的庙宇向不干涉也免注册之外，其他的所谓社团均属非法，作为社团名下的海南会馆怎么可能幸免呢？这也解释了为何早期新加坡各类社团都必须依靠庙宇才能生存。

1890年英政府颁布“社团法令”，并同时宣布取缔非法组织。在当时所谓名义下的友滙楼、兄弟楼的公司楼，都在此法令下成为姓氏公会或同乡会。目前新加坡存在的海南姓氏公会几乎是那时候所遗留下来的。

这里举几个姓氏公会和公司楼有密切关系的例证:

1. **琼崖朱氏社**
“1890年代，当时有几个从海南岛来的朱氏宗亲，合租朱拔英楼作为‘公司楼’，这就是朱氏社的雏型。”

2. **庄严宗亲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些有识宗贤倡议设置公司楼‘庄严寄廬’，收留没有家属的宗亲。”

3. **琼崖李氏公会**
“1930年代，新加坡琼崖李氏宗亲成立数个李氏社，分别在密驼律、启信街、小坡大马路。”

4. **琼崖林氏公会**
林天卢等组织“楼仔”于海南二街，后定名为“双桂斋”，以及公司楼“琼林社”、“航星”合并而成。

5. **卢氏总会**
之前为“卢氏社”公司楼。

由于姓氏公会的前身是公司楼，因而，后来的姓氏公会，还可看到早期公司楼的流风余韵，如寄宿、开伙食、聊天、下棋、麻将、四色牌等娱乐消遣。

四、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成立历史

新加坡海南人的姓氏公会成立年代，是在殖民地时期。大约从1887年至1963年止这76年的期间。现分述如下:

1. **100年以上的海南人姓氏公会**
符氏社(1887年)、星洲韩氏祠(1900年)、琼崖彪氏公会(1903年)、琼崖黄氏公会(1910年)

2. **80年以上的海南人姓氏公会**
琼州梁氏公会(1924年)、琼崖王氏祠(1926年)、琼崖朱氏社(1926年)

3. **70年以上的海南人姓氏公会**
琼崖周氏公会(1933年)、琼崖陈氏公会(1935年)、云氏公会(1935年)、琼崖许氏公会(1936年)、琼崖吴氏公会(1936年)、琼崖郑氏公会(1936年)、琼崖林氏公会(1937年)、琼崖翁氏公会(1938年)、琼崖邢氏公会(1939年)、琼崖谢氏公会(1939年)、琼崖杨氏公会(1939年)、琼崖李氏公会(1940年)、琼崖何氏公会(1940年)

4. **60年以上的海南人姓氏公会**
南洋詹氏公会(1947年)、卢氏公会(1948年)

5. **50年以上的海南人姓氏公会**
琼崖潘氏社(1956年)、新加坡庄严宗亲会(1963年)

琼崖王氏祠位于海南街三层楼旧会所，该会所乃创办人已故海南侨领王绍经先贤所捐赠，1988年为政府征用。→

星洲韩氏祠在荷罗卫巷旧会所，已被政府征用。→

五、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分布地区

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即由早期的公司楼转变而来，因此其分布也大都在原来公司楼聚集的地区。现叙述如下:

1. **启信街**
   琼崖彭氏公会、琼崖李氏公会、琼州梁氏公会

2. **荷罗卫巷(猛街，俗称咖喱厂巷)**
   琼崖林氏公会、琼崖何氏公会、琼崖黄氏公会、琼崖郑氏公会、琼崖邢氏公会、星洲韩氏祠

3. **海南街(旧日本街)**
   琼崖王氏祠、琼崖潘氏社、琼崖谢氏公会

4. **密驼律(海南一街)**
   符氏社、新加坡庄严宗亲会

5. **巴米士街(海南二街)**
   琼崖杨氏公会

6. **余街(海南三街)**
   琼崖吴氏公会

7. **小坡大马路**
   琼崖朱氏社、琼崖陈氏公会

8. **小坡二马路**
   琼崖许氏公会、琼崖翁氏公会

9. **小坡五马路**
   云氏公会

10. **20桐(电车湾)**
    卢氏公会

11. **亚迷年街**
    南洋詹氏公会

12. **民尼拉街**
    琼崖周氏公会

琼崖王氏祠礼堂

海南人姓氏公会的分布地区，正好是早期海南帮群聚居的地盘。同时也是海南人的商业、贸易、教育、文化、习俗荟集的中心。和海南会馆、琼州天后宫、同乡会集中在一起，各自发挥他们各自的独特功能，高度为南来的同乡作出大公无私的贡献。

六、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供奉的祖先

姓氏公会的内容是祖先崇拜，其核心是表现人们内心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孝道的热衷。在社会生活上加强宗亲之间的互助团结，如对贫困族群的赞助，婚丧的帮办，家庭纠纷的调解，职业劳动的互助。同时加深宗亲对于祖籍故乡的血缘情谊。

从祖先崇拜而来的是祖先供奉，新加坡海南人来自海南岛不同的县市，因此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供奉的先祖也和海南岛本土各县市姓氏祠堂所供奉的本家先祖不同。

我把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所供奉的先祖归纳为7类:

(1) 供奉始祖为主
符氏社、琼崖林氏公会、琼崖李氏公会、琼崖何氏公会。

(2) 供奉渡琼始祖为主
琼崖周氏公会、南洋詹氏公会、卢氏公会、云氏公会、琼崖翁氏公会、琼崖许氏公会、琼崖吴氏公会、琼崖杨氏公会、琼崖谢氏公会、琼崖潘氏社、琼崖邢氏公会、琼崖郑氏公会、琼州梁氏公会

(3) 以始祖、渡琼始祖为主
星洲韩氏祠(始祖：毕万公；渡琼始祖：显卿公)

(4) 以始祖、渡琼始祖、名人先祖为主
琼崖王氏祠(始祖：子乔公；渡琼始祖：悦公；名人先祖：王羲之公)

(5) 以名人先祖为主
琼崖黄氏公会(黄香，孝子，名列廿四孝，有“天下无双，江夏黄香”称誉)
琼崖朱氏社(明太祖朱元璋)

(6) 以历代祖先为主
琼崖彭氏公会(武陵郡历代祖乃宗亲神位)
新加坡庄严宗亲会(历代祖考妣神位)

(7) 附设公祠
琼崖陈氏公会(周陈侯讳满胡公、完公、双太邱长实公先祖神位)

以上分析，以渡琼始祖供奉的姓氏公会最多，也就突出了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特色，以始祖为主则打破地域界线，以名人先祖供奉为主，无疑会引发族人内心的自豪感。

七、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祭祖典礼

祭祖典礼是海南人姓氏公会的重点活动，祭祖的意义来自海南家乡的祠堂，因此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祭祖活动也叫做“祭祠堂”。祭祖活动有一套典章制度，一年之中分为春、秋两祭。春祭定在农历正月内某一天；秋祭定在农历七月内某一天。古语：“祖宗虽远，祭祀必诚”，因此仪式要庄严隆重。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祭祖有以下特色:

1. **祭品**
   全生猪、全生羊、饭团(饭珍)、鸡、鱼、海南什菜、生果。一些姓氏公会有一些特殊祭品，如琼崖王氏祠的祭品中必须有一对鹅，原因是供奉祖先王羲之公是一位爱鹅的书法家。

2. **主祭**
   海南家乡的主祭是“宗子”(中国宗法制度中是世袭的)，海外姓氏公会的主祭是当届会长。

3. **陪祭**
   当届全体理事

4. **三跪九叩头**
   由主祭陪祭领班和全体参拜的裔孙，在祖先神前，一起行三跪九叩头礼。

5. **读祝文**
   祝文以四六文撰写，读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内容大都盛赞祖宗功德，以及后裔自勉虽为谋生移居海外，但时刻不敢数典忘宗。奋发图强，以报答祖宗的恩典。

6. **焚烧元宝**

7. **聚餐**
   祭祖典礼举行过后是聚餐。海南人姓氏公会的聚餐在会所进行，

祭祖盛况

属大锅饭式。不限时间，人满就开席(每桌8人)。菜肴由族内有烹饪经验的兄弟主理，菜式不外海南家乡菜，如海南扣肉、海南炖羊汤、韭菜尤鱼、萝卜焖肉骨、海南白斩鸡等等。

参拜祭祖的活动，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是同宗族的人都受欢迎。祭祖的气氛很感人，乐趣是无穷的。通过祭祖的活动，既表达了后人对于先祖的敬仰，又祈望先祖保佑子孙，福荫后代。

对于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祭祖活动，我认为还有以下的意义:

1. 照顾离乡背井孤独无依的宗亲。
2. 加强海外宗亲的凝聚力。
3. 激励海外宗亲为前途奋发图强。
4. 深化海外宗亲对于祖籍家乡的血缘情谊。
5. 突显海外宗亲对于传统伦理孝道的热衷。

以上匾额题字均出自中国近代名人之手，已成为海南人姓氏公会的特色。

八、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名人题字匾额

殖民地时代，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匾额题字是相当有特色的。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如下:

王氏祠，中国海牙国际法庭法官，1936年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的王宠惠所题。

林氏公会，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题。

杨氏公会，曾任国民政府时代福建省省长杨杰所题。

陈氏公会，国民党的文胆阵公博所题。

郑氏公会，曾任蒋介石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所题。

吴氏公会，担任过上海警备司令的吴铁民所题。

翁氏公会，中国近代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所题。

以上举例是名人题字的部分姓氏公会，我记得当时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几乎都有邀请名人题字的习惯。可惜后来许多姓氏公会的会所搬迁，这些名人题字的匾额都不再保留，取而代之的是电脑打字的匾额，既没有原来的韵味，而意义方面已荡然无存了。

过去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匾额的名人题字，有两点值得注意:

1. 近代同姓名人
2. 基本上是1911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名人

邀请同姓名人题字，既可提高同姓公会的声誉，也可引发同宗兄弟的自豪感。至于邀请近代国民政府名人题匾额，是突显了海外乡团和祖国的认同感。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华人算是外来移民，而华人心中所认同的祖国当然还是中国。

九、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内的楹联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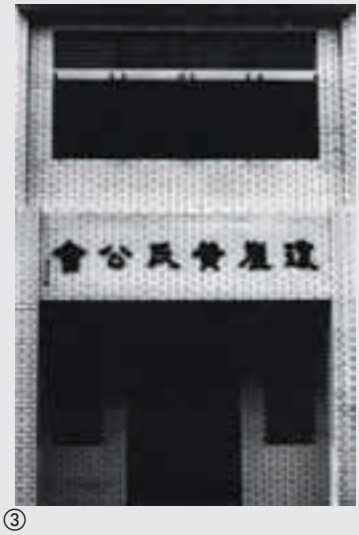
和匾额名人题字一样，楹联也是

琼崖龙氏公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度执行委员合影

①

②

③



④

1. 琼崖王氏祠对联
2. 琼崖陈氏公会对联，乃陈济棠将军为该公会成立时所撰题
3. 琼崖黄氏公会旧址
4. 江夏黄童天下无双公树勋庸垂汉史
   琼南孙枝海外生聚世传孝友振家声

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另一特色。楹联是华人优秀的传统文化，上下几十个字的一联对，里面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教育意义和人文思想，以下举三个例子:

1. 琼崖王氏祠对联

2. 琼崖许氏公会

莘子姓于一堂缅先人祖有德宗有功为烈为光春露秋霜明祀典衍云仍播诸代愿吾辈孙也贤子也肖能文能武鸳班鹭序集南洋

3. 琼崖何氏公会

肇迹自庐江以来派运流长都是渊源一脉崇祠在狮岛之上敦宗睦族还看继述千秋

4. 琼崖黄氏公会

以上对联都强调在新加坡建祠堂的目的。阐述本姓的源流，瞻仰祖先的功德，不忘激励后裔，以祖先为榜样，不忘血缘情谊，不可数典忘祖，不忘春、秋祀典，慎始慎终。

事实上，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内的楹联都各有特色，这里只是举例说明而已。我倒是期望有兴趣的海南同乡学者在这方面多作研究，把这富于血缘特色的楹联文化保留下来。

十、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领袖

海南帮群的原始资料非常缺乏，特别是1947年以前的资料。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1880年琼州天后宫重建石碑，但这块石碑记录的多是商号。因此，我们要了解殖民地时代的海南侨领就非常困难，这次我为了搜集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的资料，不意间看到了一些既是姓氏公会的倡议领袖，同时也是海南帮群侨领，这里和大家分享。

1. 韩旺彝、王志德

这两位先贤于1857年创立琼州天后宫。韩旺彝后来还倡立了星洲韩氏祠，目前星洲韩氏祠内还有他的神主。王志德的资料找不到，但他当时既能和韩旺彝同时领头海南帮群，当然也是一位重要的海南领袖。

2. 1880年琼州天后宫重建时代的琼帮领袖

由于南来的海南移民日益增长，同时旧址年久颓圮。1857年所购买

的马拉峇街琼州天后宫旧址已不敷应用。1879年11月21日，琼帮14位领袖签约购买美芝律地段(海南会馆现址)，作为重建琼州天后宫之用。当时在购买地契上签字的共有14人，名字如下：

王永祥、邢祖谟、吴时裕、冯辉昌、韩惠丰、王业彬、杨家润、黄可辉、郑大纶、郑志聪、周道炽、龙士章、陈时禄、卢疏章

我们完全有理由深信他们是当时海南帮群的重量级领袖，可惜他们的个人资料没有保留下来。不过值得探讨的，是除了冯辉昌之外，其余都属于海南人24个姓氏公会中的姓氏，他们的事迹是否可从这些姓氏公会中搜索，值得关注。

3. 1889年新加坡华人参事局成立时的琼帮代表

华族领袖受英政府的认可，是始自1889年新加坡华人参事局成立。当时新加坡华人参事局的结构是：福建帮6人，潮州帮5人，广府帮2人，客帮2人，琼帮2人，合共17人。这17位得到英殖民地政府认可的帮群领袖，就称为“侨领”，算是社会上成功的领袖人物。新加坡华人参事局的第一次成立会议，琼帮的两位代表是：王润祥、符愈贵。

王润祥的传略已不可寻，唯一值得注意的是重建琼州天后宫时，在购买地契上签字的14人中领头的王永祥。我怀疑王润祥和王永祥会是同一个人，因为‘润’和‘永’的英语发音相当接近。如我的怀疑属实，王永祥倒不是一位等闲的海南帮侨领了。

符愈贵，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819—1919》记载，说他是19世纪著名海南帮领袖，8岁来新加坡，从小店员到商人并成为富翁海南帮群尊他为“大哥”。他也是符氏社的创建人。

先后被委任为新加坡华人参事局的琼帮代表有：

王绍经、陈开国、符致逢

4. 1906年中华总商会成立时的琼帮代表

王绍经、黄可辉

王绍经是20世纪初海南帮群著名领袖。他担任过新加坡华人参事局的琼帮代表，1906年中华总商会成立时琼帮代表，1926年创办新加坡琼崖王氏祠，并捐赠三层楼店铺作为祠所。他担任过琼州会馆总理多届，琼崖王氏祠总理，中华总商会董事，育英中学发起人。

黄可辉，育英学堂的发起人，1906年中华总商会成立时琼帮代表，1879年重建琼州天后宫时，在购买地契上签字的14人中之一，他也是海南新义山的信托人。

5. 1906—1947年担任中华总商会董事的琼帮代表

王绍经(前述)、黄可辉(前述)、卢熙耀(育英学堂发起人)、陈开国(琼崖陈氏公会发起人，华人参事局琼帮代表，育英学堂发起人、总理，琼州会馆总理)、林熙蕃(不详)、符振学(育英学堂发起人)、符昌邠(育英学堂发起人，符氏社领导)、黄有渊(育英学堂发起人、总理，琼崖黄氏公会创建并任总理，琼州会馆总理)、郭新(琼州会馆总理，育英中学董事、总理)、韩钊准(琼州会馆总理，育英学堂发起人，韩氏祠总理，琼州乐善居信托人)。

结语

新加坡海南人姓氏公会是我们的先辈辛辛苦苦创建遗留下来的血缘组织，里面充满了先辈们血汗和泪水，也为移民后代保留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孝道的热衷。

新加坡目前面对两大危机，一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一是儿女不赡养父母。恰恰这两大问题和姓氏公会的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因此值得探讨。有关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政府已推出了很多奖励生育的政策，成效有待观察。至于儿女不赡养父母，政府已于1994年立法“赡养父母法令”，成为全球第一个有“赡养父母法令”的国家。2010年又作了一次修正。参加这次修正案辩论的国会议员有18位，可见“赡养父母法令”的深受瞩目。以下我摘录几位参与辩论的国会议员的发言：

马炎庆：“以法律对付少数不孝的案例能有效率当儿，不会让大多数人对‘孝道’的概念变成一种交易。”

成汉通：“家事仲裁庭有更大权力可追查孩子下落。下落摆平了就有效率了，‘效’率的‘效’不是‘孝’道的‘孝’。不见得更加孝顺，因为孩子还钱只是尽责任，并非尽孝心。”

多名国会议员建议：“灌输年青人孝顺父母的思想。”

陈振泉：“建议本地宗亲团体设立‘孝道奖’，创导孝顺的行为。”

以上国会议员的发言，大都认识到华人“孝道”的重要性，但没有人提到新加坡的姓氏公会一惯所提倡和灌输年青人的就是孝道思想。法律是治标不治本，孝道的推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须通过华人传统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才能达到目的。华人血缘组织的的姓氏公会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

人口下降是社会西化，人们忽视“多子多孙”的观念所致，而华人姓氏公会强调的孝道正好是和“多子多孙”的观念连成一套家庭伦理价值观。保留姓氏公会的潜能，发扬姓氏公会的传统文化，调动姓氏公会的积极性，我想应是华社致力的一大目标。泉

乡馆慧：

何子煌博士

今日的会馆社团能为新加坡社会做什么？

文：**何子煌博士(海南会馆)**

会馆社团成立的目的

新加坡华人会馆社团的成立，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为什么华人会馆社团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殖民地政府对华人事务不很积极，许多南来找生计的华人大多举目无亲，再加上他们大多数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在生活、就业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就有一批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会馆社团应运而生。地缘、血缘社团最初成立的宗旨主要是为乡亲谋求福利，联系乡情，让这些南来的乡亲有个栖身之所，然后帮他们找份工作。

原有的功能日渐消失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政府就积极发展新镇和组屋，组屋生活分散了会馆社团会员的凝集力。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政府机构取代了地缘、血缘社团组织哪种扶弱济贫的角色，并提供国民福利，教育，凝聚族群等社会功能。因此，维持那一时代华人社会运作的基本组织架构,也就逐渐解体。华人传统式的大家庭，也随着都市社会发展而变成核心小家庭。人们在生活上依赖地缘性、血缘性组织的互助作用，也日渐消失。

1960-70年代政府为了加强社区凝聚力与种族和谐，成立了官方社团，如人民协会等。在组屋区新镇内办民众联络所（今天有些提升为民众俱乐部）及居民委员会等。在活动经费上，有官方规划赞助，有地点适中、宽大場地及现代化设施，又有全职人员主办适合多元种族的文教、体育、休闲等活动。相比之下，传统会馆社团除了几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团体，还能搞一些较大规模的活动外，其余的地缘、血缘的会馆社团大多数都面临经费短缺，领导层后继无人，会员年龄逐渐老化的困境。

今日的会馆社团能为新加坡社会做什么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是：华文教育、会馆社团与华文报章。

但在1984年后，新加坡学校源流统一，年轻一代是接受以英文为媒介语的西方教育为主，他们大多数以个人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及宗乡群体观念越来越淡薄。华文水平也随着教育政策的改变而日渐低落，华文报章的读者群也慢慢失去了年轻的一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今日的会馆社团在华人社会里还能做什么？如果目前的会馆社团不尽早做自我调适，发挥自强不息的精神，许多会馆社团的关闭，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1986年，全国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打破了宗亲方言地方界限，克服各自为政的帮派观念，汇集各族群力量，共同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挑起新时代的使命。因此，我们希望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能有一个全面的发展蓝图，领导本地近500多个会馆社团来为新加坡社会做些事情。

今后的会馆社团能为新加坡社会做些什么

我认为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首先要有能力团结所有的会馆社团，充当各会馆社团的协调、仲裁角色，领导他们，并协助它们的发展。不只在精神上、物资上给予他们协助和鼓励，还要促进各方言群体的和谐、稳定。因此，我认为今后的会馆社团可以帮助新加坡社会做以下的事情:

1. 设立华文教学机构提升华文水平:

- 眼看华文水准每况愈下，会馆社团应该有责任协助提高母语的水平。比如最近福建会馆创办福建会馆文化学院，就是很好的起头作用。
- 希望其他有经济实力的会馆社团也能仿效，设立多个这样的机构，辅助学校母语教育的不足。

2. 传承及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习俗及节日:

- 现今社会强调经济发展，强调利用先进科技的技术来提高生产力，认为只有努力提高生产力，就能过好日子。在这种情况下，物资决定意识的意识形态占据上风，不可避免的会流失文化自信，使中华传统文化的边缘化越来越明显。
- 如果我们不找回优良的传统文化，设法传承给年轻的一代，我们将不自觉地彻底失去，因此，会馆社团应承担传承及发扬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历史使命。
- 伦理道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主要强调做人的道德修养和处世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各民族要和谐相处，更需要道德文化的力量来调节。
- 举办习俗活动和庆祝传统节日，来保留传统文化。

3. 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

-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现代的新移民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辈一代强，他们大多数是技术移民、婚姻移民和经济投资移民。他们代表的是新生力量，其成员年轻、经济条件好、学历高、思想观念先进，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今日的会馆社团在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所应用的方法要与过去的不同。
- 他们刚来新加坡这个新环境时，都会有些不适应，不很了解当地的国情。如教育、医药、社会福利和住房等方面的政策，尤其是小一入学政策、雇佣法令，公积金制度等都需要时间来了解。
- 会馆社团可以扮演积极角色，主办各种说明会，学会接纳新移民，协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令大家和睦相处，彼此快乐生活。

4. 扶植社区慈善公益福利与文化教育:

设立奖助学金，帮助贫穷的孩子读书；扶植社区慈善公益事业，赞助社会福利和文化艺术活动等，。

5. 鼓励年轻人寻根:

主办回乡祭祖和乡亲的联欢活动，让年轻人了解血缘关系，了解自己的文化历史根源，加强亲情的联系。

6. 关怀及照顾年老乐龄人士:

随着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政府要照顾的乐龄人士越来越多，为了关怀及照顾他们，会馆社团也应成立志愿义工队伍在这方面给予协助。

7. 积极吸纳年轻人入会:

会馆社团的活动范围应与时渐进，扩大活动范围，举办现时青年喜欢的活动，积极吸纳年轻人入会，培养新一代接班人，为乡亲和社会服务。

8. 开展传统艺术、饮食文化等活动:

开展饮食文化和传统艺术活动，保留及推进各方言群的饮食文化和传统艺术，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

9. 成立专家顾问团:

有能力的会馆社团成立专家顾问团，不时讨论国家施行的各种政策，并将结果向政府部门反馈和提供建议。

最后，谈一谈海南会馆能为新加坡社会做些什么？海南会馆的活动有:

1. 开办文史班，组织合唱团、口琴队和乒乓队等。
2. 庆祝传统节日，传承传统文化:如新年团拜、庆祝中秋节等
3. 举办专题讲座、座谈会及举办海南小吃节。
4. 颁发奖助学金和分发老人渡岁金
5. 组团参加海南省主办的青年夏令营和世界海南同乡联谊会大会
6. 组织医疗队伍到海南义诊，为穷孩子进行兔唇手术，也在会馆举行中医义诊。
7. 为嫁来新加坡的海南新娘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可见海南会馆举办的活动不仅提供给馆员，关心馆员的福利，也与新加坡社会挂钩。让我们继续努力建设更美好的新加坡吧。泉

这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会馆社团与新加坡社会”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24-08-2013

殷殷寄望
于海南会馆

文：**王一白**

据《联合早报》2013年2月4日报道，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公布，去年在会务活动方面特出而赢得杰出会馆奖的有六桂堂、九龙会、苏氏公会、晋江会馆和福建会馆等五家，另五家即雷州会馆、惠安会馆、龙溪会馆、茶阳(大埔)会馆和广东会馆表现优异获颁“优秀会馆奖”。

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家得奖会馆中，福建会馆连续第二年赢得“杰出会馆奖”，龙溪会馆连续第二年获颁“优秀会馆奖”，在激烈角逐中守成，诚属不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各会馆都可以从得奖会馆中观摩学习，根据各自特点发挥所长，为族群和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在传承和弘扬文化传统方面，无可置疑的福建会馆可说不遗余力，成绩斐然可观。2012年，它趁主办第七届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之际，连同闽属会馆协办的福建文化节，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例如，重点展出“蓝海福建”文物展，让人追随十九世纪从福建航行到东南亚的历史足迹；推出音乐剧《神笔马良》，把经典童话重新演绎；编著与出版《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详细记载先人贡献等。它的闭幕式项目，是中国千百年来元宵灯会和乐舞百戏的“踩街”活动，热闹非凡，为大会划上深具文化内涵的完美句点。

平心而论，福建会馆并非为了参加会馆杰出奖而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因为颁发奖项举措之前的2006年，它已首创文化节，推广与保留新加坡道地的福建文化与传统，以本地年轻人为推广对象。长达九天的文化节活动包括丰富的福建美食节、文化表演、书籍出版、文化讲座及历史文化展。历届的福建文化节总是吸引超过万人参与，并获得社会发展、青年与体育部的鼎力支持。该会馆对这些活动持之以恒，通过有效途径达到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所以，它一再得奖，是实至名归，绝非侥幸。

与此同时，福建会馆能整合资源为共同目标而团结一致。除了与国外团体合作，加强活动影响力，也汇合五所属校南侨、光华、道南、爱同和崇福小学250多名小学生参与表演，还和民众及游客一起感受节日的气氛。 让年轻一辈沉浸于文化氛围中受潜移默化的影响，意义可说重大而深远。

杰出会馆的评审标准共有七条，内容极为明确，也不难实践。

1. **对会馆本身的贡献**
2. **对华族社会的贡献**
3.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4. **东方价值观的传播**
5. **促进种族和谐**
6. **协助新移民融入**
7. **对其他会馆和总会的效益**

从近期的海南会馆《馆讯》创刊号中看出，海南会馆亦将有一番作为。会长潘家海强调要落实六大目标，即

1. **联络感情，互助合作**
2. **代表海南社群，争取共同利益与权力**
3. **谋求海南族群的福利，发扬海南传统文化**
4. **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
5. **促进教育、社会及社群服务活动**
6. **促进贸易、工商业与技术发展**

仔细读来，潘会长六大目标与宗乡会馆的评审标准七条，内容上确有契合之处，有共同性也有针对性。共同性如联络感情、互助合作和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以及促进种族和谐以及协助新移民的融入；促进教育、社会及社群服务活动以及促进贸易、工商业与技术发展，等同于对会馆本身与华族社会的贡献，也对其他会馆和总会产生效益。此外，六大目标也有其独特性的需求，如代表海南社群，争取共同利益与权力以及发扬海南传统文化。

有了明确的目标，然后通过正确途径和方式，逐步实现会馆的宏愿，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因此，权衡利害得失，为海南会馆的生存与长远发展着想，我们不得不改变思维与运作方式，解决争端，和谐共处，积极谋求会馆的会务蒸蒸日上。同时以恳挚的姿态寻求会馆属下各小宗亲组织团体的协商合作，整合资源力量，避免活动上的架床叠屋和浪费精力，从而发挥海南族群的最大功能，对族群和国家社会都会带来莫大的裨益。泉

王一白电邮于2013年8月21日

中华文史班25周年感言

文：韩山元

本馆开办的中华文史班，从1988年11月至今，已近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世纪。在新加坡华人社团(包括宗乡会馆)开办的中华文史班当中，本馆的这个班是最“长寿”的。据不完全统计，25年来，在这个班进修的学员，多达三、四千人。目前这个班的学员仍有60名。

回顾中华文史班的创办，我们深切怀念已故的本馆文教部主任王佐先生。王主任为这个班的开办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开班初期，他密切关注这个班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在执委会上和多个场合一再强调这个班的重要性。饮水不忘掘井人，王佐主任虽已过世多年，他的功绩依然牢牢记在中华文史班的史册上。

25年来，会馆虽然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风风雨雨，执委会的成员有很大变动，但是，历届执委对中华文史班的支持却是始终如一，这正是中华文史班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

我们非常庆幸的是，中华文史班有一批又一批热爱中华文化的学员，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英校生，他们听得懂华语，但是写不出华文，上课时听老师讲华语，他们做记录却用英文，这也算是文史班一个奇景吧。

我们的学员有老、中、青，还有十来岁的少年，年纪最大的超过80岁，可说是三代同堂学文史(这个“堂”是指课堂)。还有夫妻、母子、父女同班的。他们的职业也十分广泛，有公务员、教师、商人、小贩、在籍学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早在十多年前已经在这个班进修的“资深学员”，现在又回来重修。

这个班能维持那么久，如今依然生机勃勃，学员众多，还有原因是我们的教学法比较生动灵活，我们有意识地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不让学员觉得文史很枯燥。

有海南会馆执委会的鼎力支持，有众多学员的拥护，我深信中华文史班必将红红火火地办下去！泉

(本文作者是中华文史班讲师之一，另一位讲师是符传丰博士。)

海南会馆中华文史班2013至2014年课程大纲

2013年11月18日 至2014年3月24日	一、 陶杰散文选读	符传丰博士主讲
2013年11月18日	二、 1957年“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3年年11月25日	三、 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3年12月2日	四、 董桥散文选读	符传丰博士主讲
2013年12月9日		
2013年12月16日 因符、韩两位老师均出国，故停课。	五、 中苏关系恶化的前因后果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3年12月23日	六、 张小娴散文选读	符传丰博士主讲
2013年12月23日	七、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全国动乱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4年1月6日	八、 小思散文选读	符传丰博士主讲
2014年1月13日	九、 林彪集团与四人帮的垮台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4年1月20日	十、 亦舒散文品选读	符传丰博士主讲
2014年1月27日		
2014年2月3日 是农历大年初四，停课一次。	十一、 文革结束与邓小平复出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4年2月10日	十二、 李碧华散文选读	符传丰博士主讲
2014年2月17日	十三、 改革开放的曲折道路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4年2月24日	十四、 蔡澜散文选读	符传丰博士主讲
2014年3月3日	十五、 1989年“六四”风波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4年3月10日	十六、 黄沾、胡燕妮散文选读	符传丰博士主讲
2014年3月17日	十七、 邓小平逝世、港澳回归	韩山元硕士主讲
2014年3月24日		

富而好礼 承先启后

专访：**李喜梅**
日期：2013年11月27日
地点：口福总部办公室
时间：上午10时30分

庞琳PBM先生
分享人文关怀憧憬

前言

虽说口福是岛国家喻户晓的饮食集团，总裁庞琳先生也是社会知名企业家，在访谈前，还是必须做点功课、收集资料。

网上有关口福私人有限公司的讯息，非常全面。公司成立于2002年，迄今已届11周年。在业务营运和发展上，均取得稳健、蓬勃的业绩。想庞琳先生作为企业领导者，必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 敏锐的眼光和思维，才能一路带领企业团队，从容迈步，穿过风雨，迎向彩虹；精益求精，近年尚跨出大步，向区域进军。

当年，庞琳先生累积了本地传统咖啡店餐饮文化的厚实经验，在这基础上跨跃提升，创办了口福。之后的这些年，口福赢得了众多的表扬与奖项，其中包括：新加坡前50家最优秀企业奖，新加坡金字品牌奖，新加坡1000强及中小企业500强奖和新加坡50强成长最快企业奖；传奇性地树立一个深入民间的金字品牌，口福食阁，成为狮城无人不识的餐饮标志。

步入口福总部办事处大门时，收入眼帘的装潢和设置，尽是清新悦目风格；接着，与口福总裁庞琳先生首次见面，是位谈吐谦和儒雅，微微散发着书卷气之士！

庞琳先生开门见山：这次访谈不谈“商”，而是聚焦在“文”—— 人文课题。如此广泛的话题，无边无际、海阔天空，从何切入？庞总不愧是餐饮界资深“领头羊”，犹如导航师般，先锁定方向；然后打开话匣子， 侃侃而谈。

人文关怀　富而好礼

处于现今发达文明、表象进步的社会，物资、知识并不匮缺；人际之间却普遍存在着疏离感；我们可曾静下心来，作出回顾反思？

在这商业活动频密、科技发达的时代，生活节奏快捷；人们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生活水平日益提升，为何精神层面却相对贫乏？

我们是否只专注自己，而忽略了身旁亲友，可想过多花时间关爱他

们？在文明社会进程中，我们拥有越多实质东西的同时，是否不知觉中也失去许多“无价之宝”？

国学里“富而好礼”可作为我们的社会憧憬。“礼”表示礼仪，好礼，可以引伸为有了富足的生活，礼仪精神更应提升；体现真诚待人的一面，人们生活因而过得更为自在，内心更为充实，社会气象更为温馨融洽。

从庞琳先生的睿智目光和款款言谈中，投射出他的人文关怀价值观和未来憧憬。

阅书导读　探索内心喜悦

庞琳先生是新智读书会前会长。好一段时期，曾与夫人积极参与阅书导读的活动。

询及与读书会的缘分，庞琳先生认为，各类型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和工作，包括一些慈善组织。若能获得他人表态支持，对有关组织和执行者会是一种鼓励和肯定，这些将化为能量，促使志工、负责人继续前行；在进步的同时，也会做得更好。

新智读书会成立于1997年，意欲促进与推广本地读书风气。苏启祯博士与陈君宝先生率先发起，引进“行、知教育”的理念，陆续到本地学府进行推介倡导；也曾与本地教育工作者，组团到台湾和中国一些地区的学府考察、取经。

庞总表示，通过阅读书籍，能更好地进入、领会书中作者的思维；

导读活动则能汇聚有心人，一起交流结合想法，探索内心更深层的喜悦。

无偿付出　接纳融入

庞琳先生一再提起，早年获得贵人提携，加上多方机缘和不懈努力，终于造就了今天的他和集团。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感恩于能获得如此广阔的平台，因而义不容辞，回馈社会。唯有通过无偿的付出，才能完全被接纳并融入社会。

餐饮业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给年长者。虽然，他们之中，多数教育程度不高，却都忠于职守，默默付出。公司不时安排培训计划，鼓励年长者掌握新技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帮助他们与时并进。

餐饮业中的年轻员工则是生力军，都是未来接班人。一些因为个人境遇，所受教育有限；公司则提供机会，激励他们透过工作平台，努力进修、提升，挑战自己，争取改变未来命运、人生的机会。

口福集团旗下近60间分行，拥有千多名雇员。庞总设立教育基金，每年颁赠给所有员工的在籍学习的子女，将一定数额直接过账至个人账户，并亲自致函勉励。想借这种方式，表达对新一代的关怀，期望他们力争上游，来日能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接班人。

面包的故事

当年刚出来创业时，他开了间小咖啡店。因为经验不足，时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措手不及的问题。因为生意不是很好，准备的食材较少；有一次，在接近打烊的时间，来了一位老人家，他要喝咖啡、吃烤面包。当听得面包已售完时，老人家沉下脸，生气地说：开咖啡店没面包卖，关门啦，还做什么生意？！

从此，庞总一直铭记这个教诲。开餐饮业，必备足够食材，才能随时满足顾客的要求。要保持正面心态，专业态度；看重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坚持信念，让顾客感受到诚意，才能赢得口碑及回头客，生意才能越做越好！

结霜桥启蒙教育

庞总今年58岁。小时候住在黄埔区惹兰登得兰(Jalan Tenteram)一带，时常爱跟随叔辈到结霜桥，看人家摆地摊，做生意；长期耳濡目染，融会贯通，这里可说是他的启蒙场所；他目睹五光十色的社会，长辈在旁循循善诱下，他从开小店学作生意起步，点点滴滴累积经验，为日后餐饮业奠下扎实的根基。

承先启后　持续发展
乡团任重道远

庞总祖籍海南，在新加坡出生；

大会全体合影

情系祖辈家乡琼海，不时关注和支持那里的发展。

近年，他加入乡团，受委海南会馆第一副会长。他与乡亲集思广益，思考乡团如何立足现在，回首过去；希望在检讨、重新定位后，一齐展望、规划未来。

若干年前，祖辈为了摆脱贫困之牵绊，为寻求出路，毅然离乡，投奔怒海，漂向充满未知数的海洋彼岸。后来顺利在南洋地方落脚后，开拓垦荒、不辞劳苦；他们全面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常心怀故土，定时汇钱回老家(即侨批)接济同胞。

一些乡亲本地生活稳定后，事业有成，遂成立同乡会，办学施药，无私为公益；也鼓励乡亲们南来工作，一起打拼。

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故事，却是隽永、值得记载、传颂的祖辈事迹。先辈披荆斩棘的冒险和拼搏的精神，勤俭刻苦，提携后进等美德，成就了今天诸多乡团领袖，也升华为感召这些成功人士回馈社会的动力泉源。

庞总认为“承先启后”是乡团精神的精髓。这些属于中华民族的珍贵人文资产，其中或有不合时宜者，必须筛选出“精华”，传承下去，启发新一代，重复同样的坚持； 唯有去芜存菁，不断革新，发扬光大，乡团社群才得以持续发展，人文社会才会越来越好；这些，均是今日乡团社群领导的职责和挑战所在。

后记

素闻海南族群格外注重教育，更以餐饮为传统行业见称。这些美德和特质，都落实在庞总的人文关怀版图里，也体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施和受都是有缘人，未必皆来自同乡团、种族、宗教，这是岛国多元社会维持和谐安定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乡团所奉行的。

常听说这样的话：要掳获一个人的心，先掳获他的胃。口福做到了，它已成为人们心目中公认的品质食阁之一，说到口腹，即想到口福。在今天的本土餐饮领域中，口福秉承着对于社会的承诺和使命，已拥有了“精致美食”，接着将是追求“优质生活、圆满人生”，也正是庞总导航的定位方向。

访谈接近尾声时，庞总的同事送上一杯口福咖啡。这是庞夫人到食阁去，带回的。原来夫人每天必访不同的分店，这也是和分店保持联系的方式。喝下浓香的热咖啡，温暖我心。握别时，庞总亲切地送我到楼下，发现他穿着袜子的双脚自在地踩着一双室内拖鞋。

一路上，咖啡香和庞总的亲切谈话，萦绕交融在脑中。见识了人文胸怀如此宽阔的现代企业家，我们的未来社会将因此更为温馨美好，明日的天空将更为蔚蓝亮丽！泉

(完稿： 2013年12月7日)

深思

别成为新加坡的华裔

文：黎经富博士

这么说来，人类的语言是有民族性的，如果你自出生以来生长在自己民族的环境，讲自己的语言，那当然这种语言就是你的母语。

为什么一个自小就只讲英语的人，在英国人的眼里，英语就不是他的母语呢？我们还是听听语言学者的看法。

1975年，我享有大学给予的一年有薪假期，可以到自己喜欢去的机构做研究。由于我长期生活在亚洲东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想乘这个机会，到西方国家去浸濡一下，就选了英国，到那里的大学去做访问学者。我是老华校生，当然英语是不灵光的。到伦敦后，我就去报读给外国人的英语班。在第一课时，老师要每个学员做自我介绍，并说明自己的母语。其中有一位亚洲籍的学员，在介绍自己时说，他不清楚为什么他的大学要他来补习英语。他自小在家里就讲英语，这是他的母语。可是，老师很强烈的反应说，那不是你的母语(That is not your native language)。

为什么一个自小就只讲英语的人，在英国人的眼里，英语就不是他的母语呢？我们还是听听语言学者的看法。

语言学家说，人类的语言自有史以来就不统一，体现为多种多样的民族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能够满足本民族社会文化的任何表达需要。没有哪个概念，那种关系，是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因此，语言没有等级之别，更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一种语言，只要你肯学习，都可以学会。所以，人有怎样的语言，是由他出生和成长的后天环境决定的。

同时，每个人的头脑中都至少有一个词库——母语词汇的仓库。如果学了一种外语，或第二语言，那就另外还有一个第二语言的词库。至于语库的规模、容量、或专业用语等等，因人而异，但基本词汇在所有成熟的母语者那里应该都一样。而且语言的语法，都包含一套组词构句的规则，任何语言都有句法，但词形不一定都起变化。

这么说来，人类的语言是有民族性的，如果你自出生以来生长在自己民族的环境，讲自己的语言，那当然这种语言就是你的母语。如果你自出生以后就生长在一个不是讲本民族的语言的环境中长大，你所学会的语言当然是另一个民族的语言，你的母语也就是另一个民族的语言。这就难怪那位英文老师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我们新加坡，在殖民时期，英语是殖民统治者的语言，不是我们的语言，更不是我们的母语。可是，建国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特殊情形，英语变成了我们国家的行政语言，同时也成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语言。

随着新教育政策的宣布，教育制度也改变了。改变最大的可能是华校。在殖民时期，华校的教学媒介语

就是会说华英两种语言，不代表很多新加坡华人都懂得双语。而且，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辞不达意，参杂了其他语言的词汇来代替。一种语言要能做到真正掌握的程度，是有一定的要求标准的。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就读于私立和教会办的学前中心幼儿班的家长学历较高，但在与孩子沟通时使用华语的频率偏低。

我们的建国总理都说了，“要在新加坡生存，没有英语会很辛苦，没有华语则一定会后悔莫及。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崛起，是因为你自己要了解你自己的根。”

是华语，英语只是华校的单一科目。可是，自从1961年开始，教育部宣布调来五位系统工程师主持华校按剑桥的课程标准为蓝本的四二制推行实施。从此华校就朝向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方向发展。整个华校引起了强烈的变化，1980年原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大学，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79年，新加坡开始“讲华语运动”，方言边缘化。1987年传统的华校终于走入历史。

这种结果是可以预知的。我们如果再以为了华文文化、文化的承袭、或者为了保护华族的根等理由，都是抵不过为了升学或就业的实用理由强。一些家长早已放弃华文教育的思想，他们选择让孩子一出生就接触英文英语，这种现象让热爱母语的华人倍感无奈。在整个教育制度下，华文只是一门单科语文课，即使有高级华文课，也只是作为选修课，要提升华文的程度是没有可能的。

虽然，我们从1979年就开始推行“讲华语运动”，经过34年的努力，目前还停留在“多用就可以”的层面上，如此般苦苦挣扎，让关心与爱护母语的社会各界人士担忧不已。然而，就是能说，听懂却不能以文字表达，缺乏文化素养，等于有空壳没有灵魂，又要如何向自己的根与身份来认同?

就是会说华英两种语言，不代表很多新加坡华人都懂得双语。而且，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辞不达意，参杂了其他语言的词汇来代替。一种语言要能做到真正掌握的程度，是有一定的要求标准的。既要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对情境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必须能够表达对社会、经济、时事、或者参加会议的讨论、进行业务的谈判等的表达与书写能力，若能做到以该语言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那才能说你掌握了该语言(文)。

根据教育部对小学一年级入学新生的家庭用语调查，华族家庭已有61%小一新生，家庭主要用语是英语，比起1991年华族家庭讲英语的28%增高了一倍以上。不久的将来，更多在80年代出生的妇女将是幼儿园孩子的妈妈，以英语为家庭用语的百分比，很快就会激增到70%甚至80%左右。

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就读于私立和教会办的学前中心幼儿班的家长学历较高，但在与孩子沟通时使用华语的频率偏低。而且大部分幼儿多数以英语与兄弟姐妹和同伴交谈，这种情况在年纪较小的幼儿身上更为显著。习惯以英语与兄弟姐妹交谈的六岁儿童占24.5%，使用华语的只有14.7%。这一差距在三至四岁幼童更为明显，用英语的为29.8%，用华语的仅14.3%。

以上的调查结果，清楚地看到家长的担心与务实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试问，天下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子女，不担心自己子女的前途。但是，不一定每个父母都知道应该让孩子自小多学习一种以上的语文的好处。因为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不只一种语言的词库，它们会分清楚，不同的语言，存进不同的词库，不会混杂。让孩子自小避免产生对学习语言的障碍，以后，他要多学什么语言都不会有问题。我的孩子除了华、英两种语文能完全掌握外，还懂得说三种方言，其中一种还是他在国外留学时学的。所以，只要你肯学，都可以学会。我们的建国总理都说了，“要在新加坡生存，没有英语会很辛苦，没有华语则一定会后悔莫及。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崛起，是因为你自己要了解你自己的根。”所以，只要家长能正确的选择和处理，政府能做出适当的调整政策，新加坡就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只会说与写美国英语英文，而不会说与写华语华文的美国华裔。请深思。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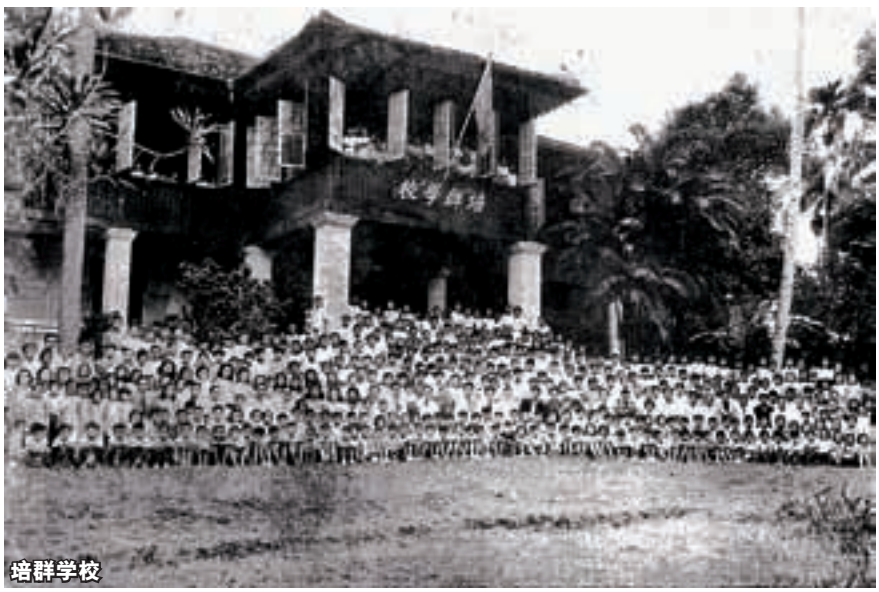
2013年11月15日

新加坡华校百年轮廓

文：周维介

1987年，新加坡全国中小学正式统一教学源流，所有学校一律以英语作为主流教学媒介语，国家教育体系不再有四种语文源流的称谓，传统华校因而正式走进历史，至今已经止息了24年。

华文教育，原先是一个以普通话与汉字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经过百年岁月的磨蹭，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价值观。受过它洗礼的华校生，与英校生的人生价值、行为特质明显不同。华校系统终结后，当今人们所言的“华文教育”，其实只涵盖“华文单一科目的教与学”，它不再是个完整独立、自成一格的语文源流教育体系。



培群学校

从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直到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这段140年漫长岁月里，新加坡一直是英国的全殖民地，英语的统治优势迅速让华族移民认知了它的实用价值与地位，华校要在这块土地寻求发展，必须加倍用心。

华校在这小岛萌芽，是19世纪初年的事。它的脐带胎血，源于中国；它的理念思维，自然地与母国的政经潮汐起落相伴。承接着中国文化母源，它在岛上绽放了百余年时光，

过程曲折起伏，光彩曾经照人。新加坡从英殖民统治、加入马来西亚，到独立当家作主，每个政治阶段华校都面对着不同的困难、挑战与冲击。华社曾经风雨同舟，曾经众志成城，但时代大潮现实冷酷，汗水砌造的城墙和信仰，几番风浪之后，终于水花归息。

一、20世纪上半叶(1900-1950)的华校概况

A. 私塾——华文教育的滥觞

19世纪之际，新马华人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把原本通行于母国的“私塾”概念移植南洋，私下聘人设馆授课，让孩子读书识字、根留传统。这些私塾，一般是以住宅或庙宇作为授课地点，它的设备简陋、环境恶劣、学生稀少，以方言为媒介反复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这类传统蒙学经书。这种简单的教育方式，成了本地华文教育的滥觞。

传统的私塾一般有三种类型。其一、富裕家庭自聘塾师到家中设馆教学，给自己或亲人的子女授课；其二、塾师在自家开馆授徒；其三、富者在外设馆，聘用塾师免费教导族人子弟或家境清贫者，故也称为“义学”。这三类私塾，以第三者为多。

华校在新加坡抽芽发轫阶段，便带着浓厚的方言族群色彩。从私塾开始，方言元素便嵌入当地的华文教育框架里。最初的私塾，全由方言主导，闽南语、潮语、粤语或客语私塾，像插旗抢滩般呼唤着各自方言群的认同意识，办学成了变相的比拼，它们同步竞争、互相激荡所带出的精神意义，形成了早期华校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1884年的《海峡殖民地年鉴》(Straits Settlement Annual Records)记录，当时新加坡共有51所华人方言学校，其中24所由福建帮设立，潮州帮、广东帮以及客帮各有9所。这些学校的学生总数为708人，学校人数介于4人至84人之间[1]。

道南学校

方言族群办学之外，教会是华文教育版图上的另一重要水源。教会创办的方言学校起步很早， 1951年的《南洋年鉴》显示，1819年伦敦传教团在新加坡设立三所私塾；1845年，位于奎因街(Queen Street)的天主教善牧堂(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开办以潮语教学的义学；两年后，位于克兰芝(Kranji)的教会开办另一所专收男生的私塾。这些私塾的名字已不可考，也欠缺具体内容供后人了解。

论及早期本土华文教育时，有学者认为1849年由侨领陈金声所创设，附属于庙宇天福宫的“崇文阁”是至今最早有具体资料可考查的华校，但本地学者庄钦永考证，崇文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单位，它只是一个宣讲圣谕的场所[2]。另一些学者认为，1854年由陈金声倡办的萃英书院更具条件称为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校。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同为私塾，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崇文阁附属于神庙，供奉的是梓潼帝君；萃英书院是独立的教育单位，供奉的是文昌帝君与紫阳夫子，它虽设有神位，但神位是书院的附属体。研究者比较认同萃英书院，主要是它具有两种现代学堂的特质：其一、它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一般私塾的规模，数据显示，它当时每天有百余名学生在校上课；其二，它定期举办考试以鉴定学生水准

肇青学校

宏文学校

新民中学

爱同学校

启发学校

义安女学校

的做法，已具现代学校的雏形，在当时绝无仅有。

19世纪中叶，中国面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东南沿海省份的中国人大量移居南洋，致使19世纪下半叶传统私塾义学纷纷成立，形成了发展高峰。崇文阁与萃英书院之外，1872年天主教徒在后港成立了道南学堂(与后来的道南学校无关)；1886年侨领颜永成在直落亚逸成立华英义学；1889年陈金钟诸人于麦根新路(Magazine Road)设立隶属陈氏祠堂保赤宫的毓兰书室、广肇华商创办了广肇义学、华侨会设立了乐英书室、广东帮于珍珠街(Chin Chew Street)开设进修书室、基督教长老会创立了马车路尾义学；1893年天主教会于武吉知马设立一所华文私塾……印证了华文教育的初阶便带着多元的方言与教会色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传播新思想的新式学堂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直接震撼了南洋方言私塾的教育地位。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推行的国语政策，强势颠覆了本地私塾。

私塾所受的挑战，不仅来自中国国内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它还面对本地非教会系统英文义学的强力竞争。清朝末年派往新马考察的大小官员在各自的报告中，普遍反映了对当地一些华人倾向于选择英文义学的忧虑。

19世纪中叶以后，方言私塾更要面对西方教会组织引进的现代英文学校的竞争。例如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美以美教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Mission)以及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haplains)于1852-1886年间先后到新马办学抢滩，获得不少华族人士的支持。以1901年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的现代英校学生人口为例，最多的是华族(4500名)，其次是印度人(1600名)，再次是欧亚混血人(900名)，最后是马来人(400名)[3]。

作为传统教育形式的方言私塾，最终还是经不起岁月轮轴前进的挑战，因为它缺乏现代教育的元素、没有完整的课程纲要、没有客观可靠的评鉴方式、没有符合儿童学习心理的教学法，也没有覆盖五育(德、智、体、群、美)的教育内容，整个课程几乎与现实脱钩，因此一进入20世纪，当新式学堂以崭新姿态登场，私塾便迅速撤出了教育舞台。

B. 新式学堂的兴起

兴起于20世纪初的新式学堂，课程完全根据中国清朝维新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理念而设置。它在新加坡崛起，与中国清朝末年的改革与派驻海外领事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新加坡是清朝在海外最早设置领事馆之地，它所派驻的总领事以左秉隆、黄遵宪与张弼士三人对当地文化教育推动所发挥的作用最大。除外驻人员之外，当时清廷也曾派遣地方知事、学部官员、钦差大臣前往南洋视察华教，鼓励侨民兴学、奖励华教人士、在南洋成立主导教育的“劝学所”等作为，都是20世纪初东南亚华文教育事业发展的有效发酵剂。

论述新式学校兴起的初阶，不能回避康有为与孙中山这两位曾经南下新加坡的政治人物。1898年，原为清朝光绪皇帝老师的康有为在中国推行维新运动，倡议教育改革，设立各种新式学堂以应付时势的变化。维新运动却不幸失败，康有为流亡日本，辗转来到新加坡，他的改革思想得到本地富商邱菽园等名流在财务与精神上鼎力支持，新式教育因而顺利引进，迅速取代了私塾。当时有的侨领索性把原有的私塾直接改为新式华校，有

的则另外创办新学堂。不过，这些学校都只开办小学课程，原因或与侨居心态、经济承担能力、师资短缺所形成的需求限制有关。

史料显示，康有为在新加坡期间，曾参与中华学校的创建，包括协助起草学校的章程、安排师资前来教学等事宜[4]。此后，康有为的弟子刘士骥也曾于1905年左右南来考察，与当地华社领袖倡办应新学校；1906年又鼓励华社建立端蒙学校。康有为南下几年间，他本人、弟子及其保皇党支持者积极于在南洋发展新式学堂，开创了一代风气。

康有为南来，主要与当地富商阶层交往，因此对知识阶层的感染力与影响力相对较小。革命党的孙中山也于1898年抵达新加坡，比康有为稍晚了6个月。他在新马没有涉及实际的办学工作，他对当地教育的贡献，主要在于向中下阶层宣传与灌输新思想，为社会营造了改革气氛，凝聚了办学能量。中华学校、南华学校与南洋女校的筹办，与孙中山的同德书报社都紧密关联。

在思潮激荡的年代，保皇党与革命党是势不两立的政治势力，流转到当时的新马，却能同时被华社所接纳，因此同个组织或委员会，同时容纳两种思维的现象颇为普遍。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和清朝政府一样，把发展与照顾海外华文教育视为己任，不时委派教育部或外交部官员视察侨教，给予适当的督导与协助。这些视察人员到某地巡视之后，通常都会呈交报告，以作为改进办学水平的参考。1929年，国民政府曾经颁布“海外华校条例”，委任“海外教育策划委员会”协助海外侨教的发展，当局还为此设立“海外教育基金”，鼓励海外华校生毕业后到中国的大学深造。

C. 新式小学的快速发展

1919年，中国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澎湃激情迅速感染南洋华社，新加坡华文教育因而明显跨步向前，华文小学迈进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轮文化与政治冲击波，迅速引起英殖民地政府的注意，它出台了“学校注册法令”，尝试以行政手段钳制华校，导致一些未遵守政府条例的学校被令停办，一些华教人士(例如庄希泉、余佩皋等)被驱逐出境。1925-1928年间，估计新马两地至少有315所华校因违反学校注册法令而遭关闭[5]。

中国成立国民政府之后，虽然此间殖民地政权加大管制力度，但华校却展现了坚韧的生存意志。根据郑良树博士的统计，民国建立前的1905到1911这6年间，新加坡的华校只有8所；民国建立后的1912到1939这27年间，新加坡华社所创立的学校计有243所，前后增加了235所。换言之，这阶段华校以平均每年9所的速度创建，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旺盛生命力。

这阶段创建的两百余所学校，以规模小者居多，学生超过千名者不及8所。其中以爱同(2000名)、肃街中华(1700名)、广福(1463名)、新生(约1250名)以及光洋、崇福、崇本、宏文(介于951－1150名)为大型学校。这些学生众多的学校，几乎都聚集于人口密集的市区；其他学校的人数大部分介于数十名至三百名之间。至于师资人数，爱同有41名老师，是当时的特大型学校；其他学校的教师人数，则介于一两位至10位之间[6]。

现存资料显示，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应是1905年创立的崇正学校(前身名为养正学堂)。从那年开始的10年间，新加坡出现了无数华文小学，这包括广肇学堂(1905)、应新学校(1906)、启发学校(1906)、端蒙学校(1906)、道南学校(1907)、育英学校(1910)、中华女校(1911)、爱同学校(1912)等。

这些由民间出资创办的华校，一般都冠上“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的字眼，所谓“公立”，并不与“官立”同义，它并非政府学校，而是指由民间出资创办，由董事会管理、监督的学校。独立后这类型学校得到政府的财务资助，被冠予“辅助学校”(government-aided school)之名，以区别于由政府全权负责财务与管理的政府学校(government school)。

D. 华文中学的起步

华文中学的创建，比小学晚了约14年。新加坡最早的华文中学，是陈嘉庚带头创立于1919年的华侨中学。华侨中学成立后，新加坡出现了小学增办初中部的模式，例如，1923年养正学校成立了初中部(于1936年

停办)；1929年南洋女学成立初中部；1933年端蒙学校增办初中部(于翌年熄火)。二战结束后，这种现象持续着，育英学校于1947年成立中学部；南华女校与圣尼格拉女校于1949年成立中学部。

教会主办的中学起步较晚，公教中学是最早的教会华文中学，成立于1935年。与小学相比，华文中学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即使到了战后数年，除了原有开办中学课程的华侨中学、南洋女中与中正中学(1938)等校之外，新成立的中学只有1948年的南侨女中。

E. 日治时期的华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新加坡长达三年八个月(1942－1945)，华校在这段期间完全被限制操作，学校数量锐减，学生也大量流失。根据许云樵主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的数据，新马沦陷前的1941年，华校有370所，英校有81所，马来学校29所，华校数量与人数都遥遥领先于英校和马来学校。沦陷后，华校严重萎缩，只剩下21所，英校剩36所，马来学校22所，这期间英校与马来学校一反常态，学校数量与学生人数都比华校为多(详见下表)。

1941－1945年语文源流学校与学生数量对比：

由于中国与本地华社积极反日抗日，致使占领期间华校遭受比较残酷的待遇，当时日军当局曾下令所有华校交出中文教科书审查，估计被烧毁的书本约20万册，遭捕杀的华校师生不计其数[7]。

F. 华校首创小学会考

1930年，福建会馆在新加坡首创了华校会考制度，专为福建会馆属下以及一些接受殖民地政府津贴的华校主办年度校际会考。这项会考主办两届之后，停办两年，1934年再由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接办，一年后又改由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华文教育局和中国总领事馆联办，直到1942年日本攻陷新马为止。

华文小学会考的筹办，由福建会馆的教育科主任林庆年博士主导，目的是整合当时各自为政的华校，尝试让小学毕业考试更具信度。主办华校会考的呼吁，当时获得十几所小学的支持。1930年“新加坡华侨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成立，拟定并通过了考试大纲、考试模式以及评分标准，并委任外埠学校负责各科出题工作[8]。这项统一考试的实行，无异于加速了华文小学的改革、强化了华社的办学凝聚力，使它朝着规范化、素质化的路向前进。

	1941年(日治前)	1942－1945(日治时)
华校数目(人数)	370所(38000人)	21所(2543人)
英校数目(人数)	81所(27000人)	36所(5000人)
巫校数目(人数)	29所(5800人)	22所(4572人)

G. 华校教科书的意识认同

19世纪新马成立华文学校以来，便以中国的政治作为认同对象，这种特点具体反映于当时的教科书上。尤其是孙中山等人以南洋为基地，积极于运作推翻中国旧王朝，各种新思潮的激荡涌现，直接燃起南洋创办新式华文小学的烈火。华校的学制、课程与教科书，几乎全盘自中国移植。这种情况维持了30余载，及至1939年，马来亚殖民地政府教育局成立了“马来亚教育部修改华校小学课程委员会”，讨论制定适合本地的课程标准，意味着殖民地政府对当地华人的意识认同已有不同的要求。

20世纪的前30年，殖民地对华校的管制相对宽松，之后因中国政局的变化，统治当局对华校的严格约束具体反映于对教科书的要求上——它明令凡是中国进口的教科书，若被判断含政治意味或排外思想，一律必须删除修订，否则不得采用。

那个年代的课本，确实反映了以中国为认同对象的强烈意识，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民学校课本春季第一册，便有“国旗飘飘，党旗飘飘，今天开学了，我上学校去”的课文，所灌输的意识与中国国民党有关；1947年出版的国文课本，也有“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也爱南洋”的句子，表达的是对中国的认同意识。

这种背景下，教科书内容的南洋化便被提上了议程。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的本地华校教科书虽然仍由中国出版商供应，但却是“南洋版”，主要是为了修订未符合当地环境要求的内容，强化它的马来亚色彩的缘故。

进入50年代，华校教科书的编写，更顺应当地与中国政治的演变而有了重大变化。战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5年，新马社会

响起了反殖民地声浪，提出自己当家作主的诉求，更加速了本地华校教科书改革的进程。1951年方卫廉(William P.Fenn)与吴德耀联手提呈的《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建议，“以现代化教育方式，以马来亚为焦点，同时充分保存中国背景”的原则与方式编写华校课本。

华校团体与殖民地当局之间为教科书问题的争论，持续了整个50年代。官方始终认为，华校课本虽经多次修订，却未臻理想。在讨论过程中，甚至有人提出教科书先以英文编写再翻译成华文的建议。殖民地政府与华校同仁之间的观点对立，始终甩不开政治与国家认同这个核心问题，教育的“马来亚化”，其实混杂了太多太复杂的政治内容。华社担心，“马来亚化”带有消灭中国文化的意图，因此积极争取，尝试力挽狂澜。在那个政治不稳定的年代，本土华社其实面对矛盾重重的“认同”困扰——他们生活在政治上仍是殖民化的土地，社会上酝酿着越来越强烈的反殖呼声，而母国的政治生态又发生重大变化，共产党在中国建政使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对当地华社有了新的看法，也使新马华人必须思考归根返国或落户他乡的选择题——这种复杂的背景对当地华人的政治、国家与文化认同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与干扰。

新加坡华校教科书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反映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演变现实。新加坡从殖民地、自治、加入马来西亚到独立建国，折射出华校由盛而衰的历程，也反映了华校的兴亡与当地政治的嬗变息息相关。根据一些老华校回忆，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反映于南洋华校的具体行动，便是有些华校升起了五星红旗。

二战前，新加坡华校直接使用编写与出版于中国的教科书；二战后，殖民地政府基于政治管制，要求华校教科书的内容与意识形态马来亚化，便有了由当地民间出版商参与课本编写的新做法。

1965年独立后，民选政府基于国家建设，除了明令出版社必须根据教育部规定的课程纲要编写课本之外，70年代更落实了由教育部自行编写教科书的做法，以确保国家意识的灌输能有效推行。

H. 殖民管治下初期华校的特色

1. 前十余年华校只办小学课程

新式学堂诞生的最初17年，新加坡华社所创办的华校约有26所，分布于小岛各角落，但这些新式学堂所开办的课程，都仅限于小学范围。学生念完高小，若想继续升学，便得回返中国，但多数人无法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只得辍学，因而直接影响了当地华校生的提升机会。1919年，慈善家陈嘉庚带动华社创立了南洋华侨中学，推出中学课程，使华校系统向前跨步，华侨中学成为当时南洋华文最高学府的地位因而确立。

2. 女校出现成为亮点

碍于社会观念保守， 20世纪初年新加坡的新式华文学堂只为男生而设，女生入学无门，这种局面约维持了十年光景。随后孙中山等人在中国的改革运动、提倡男女平等的新思维，给南洋华社带来了直接的冲击。1911年，本地潮籍人士潘兆鹏(Phua Choon Heang)与郑聘庭等人创立了中华女校[9]，成为新加坡社会华文教育发展上的新亮点。以后，南洋女校、静芳女学以及由教会创办的女校陆续成立，创造了女性同享平等教育的机会。1929年，南洋女校增办初中部，使它成为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女中。

3. 校舍简陋设备落后

华族以移民身份在新马落脚，筹办教育一开始便带着自发性的民间色彩，因此资金不免短缺，一切只能从简。华社全靠一腔热情转化为能量动力，所走的是筚路蓝缕、刻苦经营的

光华学校

南洋女子中学校

中华女子中学——尼文路校舍

南华女子中学校

道路，华校也因此积累了牢固的逆境求存价值观。当时乡郊区的华校，一般是简陋的锌板屋或亚答屋，钢骨水泥的校舍几乎绝迹；有些则利用杂货店，或借用戏台上课。市区的华校，则多半租赁店屋作为“校舍”，简直无校园可言。这个年代的华校，多数规模极小，学生数十人者有之，一两百人已属大型。

4. 浓厚的帮派色彩

在地域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办学无法摆脱浓厚的地域宗乡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创立的华校，方言群的旗帜至为鲜明。20世纪上半叶的会馆，以两种形式支持华校的发展，其一是直接由会馆创办学校；其二是由会馆财务资助某校的发展。方言群之间的竞争，使会馆参与学校的建设日趋激烈，直接促进了华校的繁荣。

作为新加坡最大的方言群，福建会馆不仅所创办的华校最多，资助的学校也最多。以1930年为例，福建会馆是年共资助了中华、丹诏、益励、光洋、崇德、彰德、振东、中南这8所学校，平均每校一年获得津贴八百余元，等于是政府资助一所学校津贴金的一半以上[10]。这个数额十分可观，印证了当时华社积极于华文教育的心态。

育英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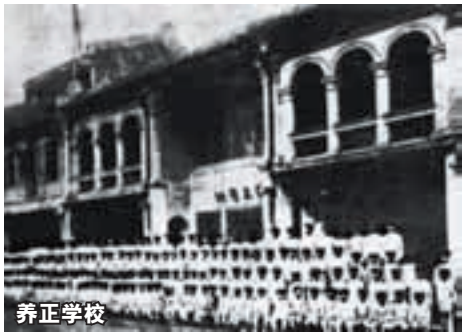
坐于金园街福清会馆内的校园

培群学校

端蒙学校

培青学校

中华女子中学


养正学校

中正中学总校

20世纪首30年由福建会馆主办或资助的华校有19所，其中以崇正、道南、爱同、崇文、崇福、兴亚等校广为人所知；由福州语系(包括福州、福清及兴化)创办的学校有培青(1918年福清会馆)、宏文(1921年兴安会馆)以及三山(1924年福州会馆)；广州语系会馆所创办的学校有：宁阳(1906年宁阳会馆)、东安(1922年东安会馆)、冈州(1930年冈州会馆)、南顺义学(1931年南顺会馆)；潮州语系所创设的学校有：端蒙(1906年)、义安女校(1935年)；客家语系创办的学校有应新(1906年应和会馆)、启发(1906年茶阳会馆)；海南语系所创办的学校有：育英(1910年)、培群(1933年)。

英殖民地管辖下的华族移民，一方面希望保有自身的母族文化，一方面又强烈感受到英文在当下社会的功能，因而发展出一种中庸心态，既掌握母文又兼备英语的想法，衍生出上半天唱“天佑女皇”(英国国歌)，下半天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中华民国国歌)的现象——半天念英校，半天读华校成了部分华人自我安排的非正式“双语体制”。

5. 一起步便与政治挂钩

英殖民地统治新加坡的年代，英文教育独尊杏坛，殖民地宗主着重培养的是一批在各方面都能与英国积极配合的本土精英，因此英文学校得到良好照顾，尤其是财政经费，官方支援充足。反观母语源流学校，必须依靠民间力量逆势发奋、自力更生，才能争取到若干呼吸空间。

20世纪初叶，中国清朝末年推出的维新运动，直接促使本地涌现新式学堂，自此以后，中国政局的晴雨变化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走势紧密相扣，时时牵动着华校的神经。

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直接刺激新加坡华社的思维。它提倡白话文的新思想，不但促使本地华文报章催生了倡导新文学的文艺副刊，也点燃了推展新式教育的火炬，为本地华校注入新动力。这种政治觉悟，

公教中学

在华校的董事、师长与学生之间凝聚成广泛共识，中国的政治新动态与海外华侨的政治认同因此焦不离孟，以后发生于中国的政治事件，必然在海外引起大反响，获得积极的支持与回应。

国民政府成立后，把华侨视为国家照顾的对象，它开始积极为海外华侨提供教育支援，甚至由教育部派员到海外视察校务，积极与华侨社会建立紧密联系。

中国政权的更替以及主动援手海外的做法，也使殖民地政府更为警戒，更积极关注华校对当地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首先聚焦于教科书所宣导的意识，觉得有必要通过制度控制华校的行为，于是开始琢磨给予华校津贴，尝试通过注册换取津贴以达致管制的目的。

1920年，殖民地政府改变了过去让华校自生自灭的放任态度，颁布了新的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管制各语文源流学校的行政举措。为了扼制中国成立中华民国对南洋华侨所带来的影响，它明言只有方言学校才有资格领取殖民地政府的津贴，以华语为教学媒介的学校则不能享受这项福利。殖民地政府宣布新法令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曾通过驻地领事要求本地华校豁免于新法令的管制。华校代表也向伦敦提呈请愿书，中国部长出面代为陈情，都不得要领。英政府拒绝妥协，反而解散了新加坡方面主导请愿的新加坡教育总会，并提控了该会的五名代表，把他们遣送出境[11]。

新注册法令落实后，只有愿意接受殖民地政府审查校务、愿意采用较为符合当地色彩的课本者，方能取得津贴。这个政策，造成许多华校被当局贴上“进行有害的政治活动”、“卫生条例不符合规定”等标签而注册被拒，1925至1928这三年间，新马申请注册遭拒的华校有315所。至1930年左右，大部分的华校仍无意向殖民地当局寻求经济援助。那些因经济极度困难而不得不提出津贴申请的学校，所得款项其实远不如英校、马来学校及淡米尔学校。一般所得津贴，只占开销的三分一。

二、20世纪下半叶(1951-1987)的华校

A. 战后、自治到独立前(1951－1964)的华校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殖民地政府重新掌握政权后，虽然新马的华校数量与学生人数迅速回升，但当局仍继续执行独厚英校的政策。资料显示，1948年政府教育开支中的75.3%用于发展英文小学、中学和大

卍慈学校

圣尼各拉女校

圣尼各拉女校

学教育，华校只得5.6%。

20世纪下半叶的前10年(50年代)，新加坡正经历战后至争取自治的阶段，华校的发展也来到了高峰。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变动，同时给华社带来美好的期盼与困扰，一方面久居新马的华人对移居地积累了深厚感情，心中燃起当家做主的愿望，于是反殖民地统治的旗帜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迎风飘扬；另一方面，共产党在中国成立政权深化了殖民地政府与中国的对立，当局多管齐下，在采取更强硬手段干预与管制华文教育之同时，也着手参与华校的创办，为华族家长提供更多的择校管道，这种背景直接扩大了华校的发展空间。

1954年，立法议会通过了新法令，允许政府关闭学校。政府也设法通过财政津贴、提高华校教师薪金等方式，尝试让华校交出管理权。这措施下，有84所华校交出了管理权；132所华校以有条件方式接受财政津贴；63所华校则拒绝这类附带条件的津贴方式。

50年代华校学运组织与左翼工会的势力不断扩大，殖民地当局最终选择以镇压手段对付学运与工运。1950年，殖民地政府出动大批警员到华中、南中学生宿舍搜查共产党文件、逮捕教师、开除学生、查封学校，严禁校方收容寄宿生等举措，引发了中学生大罢课；1951年，殖民地政府主导中学改制，推出初中会考，触发了轰动一时的全新华校初三生大罢考；1954年，殖民地当局公布“国民服务法案”，规定适龄青年参加军训，引起学生强力反弹，他们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提出免役请愿，结果爆发了五.一三警察镇压学生的严重局面；1955年华校生参与的福利巴士大工潮，与1956年华文中学学生会(中学联)遭查封诱发的学潮，更激化了政府与学生之间矛盾，华校的处境陷入了更艰难的状况。加上同个年代，华社领袖陈六使提出创办南洋大学的构想，燃起人们的热情，使华校在复杂的境地里呈现前所未有的动感与活力。

1955年之后，新创立的华文小学数量远少于战前，但新创办的华文中学则比战前明显增加，计有十余所之多，其中多数为政府所办。政府之所以在这期间推出华文中学，与发生于1954－1956年的华校学潮不无关系。成立于1956年初的立化中学，是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是年年底，政府开办华义中学，即刻吸纳了五百名来自中正中学的转学生。50年代期间成立的华文中学，还包括也是创立于1956年的德明政府中学与圣公会中学；1957年的新加坡女子职业中学；1958年的海星中学与圣婴中学。进入60年代，新中学明显锐减，这时期成立的中学只得两所，一是政府开办的黄埔中学(1961)；另一是教会所办的礼逊中学(1965)。礼逊中学是新加坡最后一所创建的华文中学，可说是华文中学的绝响。

总结70年代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共计26所[12]，为数不多，却对当地华人提供了掌握母语、认识民族文化的机会。它存在的岁月虽短，但光热无限。这26所中学中，在二战后创建或增设中学部的学校共有21所，足见新加坡华文教育史上，中学的成长是晚至战后的事。

南洋小学

B. 南洋大学的诞生——华校系统的完成

南洋大学创办的直接因素与中国大陆政局改变有关——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对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影响，反映于升学之路与华校师资来源遭断绝这两大方面。政治形势的改变，使中国的教师无法南下，而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也因意识形态对立，不让来自中国的教师入境，于是本地华文中学的师资即刻陷入无以为继的困境。当中学师资短缺，学校办不下去，便直接影响小学师资的来源。中国政局的改变，也使本地的华校中学毕业生失去前往中国升学的机会，尤其是政权更替的前几年，台湾社会仍欠稳定，也非海外华人升学的理想选择。此外，当时马来亚大学原本承诺开办中文系，却迟迟未兑现诺言，也是催生南洋大学的因素之一[13]。

为了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华社

萌生了成立华文大学的构想。1953年，华社领袖陈六使登高一呼，获得南洋社会热烈回应，各阶层民众积极捐款，八方汇流，南洋大学在这种形势下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方式投入运作，几经努力，多番挫折，它终于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它的诞生，也使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系统得以发展完整。1956年南洋大学在各方努力下正式开课，一条起自小学、中学而大学的华校链条终于完整连接。

谈及华文教育的高等学府，人们往往遗忘曾经惊鸿一瞥的义安学院(义安理工学院的前身)。1960年，南洋大学首届毕业生走向了市场，次年，潮州义安公司获得新加坡民选政府支持，决定筹办义安学院的议程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义安学院于1963年正式开课，推出中文、巫文、商业管理、会计、应用化学、电讯工程与家政七个学系，以华语为教学媒介。四年后，汤寿椐栢报告书建议改组义安学院，不再只以华语为教学媒介，决定了这所华校在教育史上昙花一现的命运。

华中学校

C. 独立后(1965－1987)的华校形势

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在凝聚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国家的前提下，除了明确英文、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是官方语文的法定地位，也确认了以英文作为行政语文，让它肩负沟通各种族的媒介任务。英文成为行政主导语文，使家长意识到英文在这个新兴国家的重要性，它是学生步入社会不可缺的一把钥匙，直接影响着学子的谋生现实。这种现实功能，给母语源流的教育运作带来严峻的挑战。

母语源流学校收生的退潮现象始于战后，自治邦(1959－1963)阶段进一步恶化。基于经济现实，越来越多家长选择把子女送往英校，即使是华校背景的家长、华文文教工作者，甚至华社精英，也倾向于把子女送进英校。虽然个人的决定背景因素有别，但所形成的效应是华校版图日渐萎缩，呼吸空间急速窄化。

1. 母语教育宣传月

1965年独立后，华校的发展与建国的朝气背向，呈现下倾逆势。华社面对华校式微的困境，努力寻求对策。1966年3月26日，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华校联合会以及学生家长联谊会聚首磋商，于5月2日联手推出“促进母语教育宣传月”，250所华校以及约300个华族社团宣誓支持这项行动，尝试挽狂澜于既倒[14]。

“母语月”呼吁华族家长重视母语，把孩子送往华校就读，让母语教育在建国的进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当时10万张宣传海报在250所华校、180间民众联络所以及全岛的咖啡店张贴；华社领袖通过报章、电台、电视台向华族家长发出强烈的挽救母语信息；通过演讲、征文比赛努力激发人们对母语的热情，却得不到本土华人热情的回应。华校生的报读人数没有明显反弹回升，母语教育宣传月显然收效甚微。

2. 华校新生急速锐减

已知的数据显示，自1950年开始，新加坡华校的学生人数比例与英文源流比较，出现了明显下降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7年华校系统终结为止。1954年浮现的另一个不利于华校发展的数据指标，是英校生首次超越华校，华校学生人口第一次低于英校生，只占49.1%。从这年开始到独立前的1964年，华校学生总数一直以每年约零点几到三之间的百分比下降。

华校人数的比率以超过10%大幅

度落后于英校，是1959年新加坡宣布成为自治邦的翌年，也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上市的隔年，以后这个差距迅速扩大，华校正式进入了风雨飘摇的阶段。

到了1967年，华校人数已锐减至只占全国学生人口的33.8%。1972年以后，华校几乎以每三年锐减10%的速度枯萎——1972年，华校生只占30%；1975年，华文小学新生只占约20%；1978年则仅剩11.2%。

1924－1987年华校学生人数所占比例表[15]

年度	华校生百分比
1924－1937	66%－82%
1946－1949	63%－66%
1950－1953	52%－59%
1954－1964	42%－49%
1965－1972	30%－33%
1973－1975	20%－21%
1976－	低于20%

70年代末以后，虽然政府在华校推出小学启蒙班(后改为“预备班)、特选学校，一度还确立华文的升学功能(例如：规定初中上高中、高中上大学，华文科必须及格)，尝试亡羊补牢，但狂澜已不可挽，因华校系统中后半截的大学与高中阶段已告废，前半截的中学与小学课程已难发挥作用。

1978至1987年，新加坡华校系统步入晚期。这十年间，华文小学、中学与大学先后面对不同阶段的断流现象：

◇ 1978年，南大校园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难以落实。这年开始，南大学生被安排到以英语为媒介的新加坡大学武吉知马校园上课，南大进入了“联合校园”时代。

◇ 1979年，华校最后一届高中生毕业，意味着此后华校只剩小学与初中课程。

◇ 1980年，南洋大学正式结束，意味着华校系统的大学课程告终。

◇ 1981年，华校不再招收小一新生，换言之，这年的全国小学一年级已无语文源流之分，意味着华文小学仅剩小二至小六的学生。同年，不少中一至中三华校生选择转流，余剩的华校中学生寥寥无几。

◇ 1987年，华校系统正式终结。

3. 一些华校开始转型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传统华校陷入极度困难的招生处境，一些学校因此酝酿转型，引进英文源流系统，在一校之内同时容纳两种语文源流的课程。这是华校结束前的过渡阶段。例如当时的蔡厝港、加冷、蒙巴登、立化等政府华文小学，加办了英文源流课程，以维持学校的学生人数。

以1980年为例，那一年已经没有纯华文源流的政府小学，中学则只剩育明中学一所。辅助学校(government-aided school)方面，90所华小，只有57所保留纯华文源流的状态，另37所已向华英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过渡。辅助中学方面，继续走单一华文源流的只剩4所，其余18所则已转型[16]。

4. 特选学校登场

1980年，华校人口严重滑坡之际，政府宣布了“特选学校”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chools)计划，尝试借助特选学校的概念，让华校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它挑选了9所具有华校历史背景的中学，为它们提供额外的财务支助，让小六离校会考中最优秀的百分之十毕业生到这类学校升学，修读同是第一语文水平的英文和母语，希望他们在这种文化背景里，能更好地掌握双语，也能传承优秀的华校价值观。这9所特选中学是：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德明政府中学、立化中学、公教中学、圣尼格拉女中、海星中学、圣公会中学和中正总校。

2000年，南华中学获甄选为第10所特选中学；2012年，南侨中学将成为第11所特选中学。

5. 华校系统解体前的末代岁月

华校发展至80年代，进入了最后阶段，1985年，华校几乎全数跨进历史的门槛，为曾经辉煌的教育事业告别。一些学校选择彻底走入历史，全面结束营业，画上句点；一些接受纳入政府学校系统，除华文科之外，各科皆以英语授课，原有华文校名得以保留，英文校名则以汉语拼音代替。

末代华校教师与华校生最后一段岁月的苦涩，不易对人说清楚讲明白。华校终结的后遗症之一，是许多华校数理教师直接面对事业前途的焦虑。倘若他们转到英校教导数理，便必须面对使用英文教学媒介语的庞大压力；要是转科教学华文，也得面对

崇福学校

南华学校

南洋女子中学校

重新受训的现实。即使当时在华校教导华文(第一语文)的教师，他们长期习惯于教导文言文，也得转换跑道，改教华文(第二语文)，重新适应教学环境。

华校系统正式终结的前几年，呈现的是班小不成气候的末代景象——1982年左右，从小学到中学，不少末代华校学生直接转流到英文部就读，薄弱的英文基础使他们遭遇了无法为外人道的心理压力与挫败，一些半路掉队，一些苦苦支撑，这种情境，一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联合校园时期的南洋大学在籍生，面对彻底改变的英语教学环境，无奈地过着乏味的查字典岁月，苦苦挣扎，默默承担转型的阵痛。

D. 华校式微的原因

1. 政治因素

华校式微，与错综复杂的政治有所关连。殖民地政府统治的年代，历届政府都有过镇压华文教育、歧视华社的记录。林有福当首席部长的半殖民政府，甚至为此遭遇反抗而失去政权。

殖民地全权主导政治的那些年，英文是唯一被认可的语言，各种族母语均被排除于主流之外。尽管华校生毕业后在就业市场出路窄小，但人数却远比英校生为多，反映了人们对母族教育的重视程度。随着本地与中国政治洪流的冲击，华校背景的华人成了一股不可漠视的社会力量。成立于1954年，由英文教育精英经营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意识到必须团结这股社会力量才能有所作为。当时整个社会以“反殖”为核心意识形态，因此它容纳了华校生、左翼份子以及共产党人，以便朝着“反殖”的共同目标争取政治利益。这种社会背景，使刚创立的人民行动党成份变得十分复杂[17]。

数据显示，1955年左右的人民行动党，约有党员两千名，华校生是它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年的市议会选举，30万合格选民中，华校生约占75%(约22.5万)，势力不容忽视，而成了政党力争的支持对象[18]。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但长期来社会上存在着“华校”等于“左翼”、“共产党”同情者或认同者的顽固偏见，却无法有效消除，这对一些华族家长的心理产生消极的影响，削弱了他们把孩子送往华校的意愿。

从殖民地过渡到自治邦的50年代，华校生成了支持新兴政党上台的主力，这短暂的十年光景，学潮、工潮等复杂的政局发展使华校涂抹上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1961年行动党内部的左翼力量集体出走，另起炉灶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之后，英校与华校在政治上形成了两股角力阵营，短兵相接之后，华校明显地居于下风。

培群学校

2. 经济因素

一直以来，华校生在新加坡职场上与英校生相比，叩门与擢升的机会相对困难许多。由于教学媒介语的关系，华校生的英语水平远远不及英校生。在一个百多年来以英语为职场主宰的社会，人事聘用对掌握英文者明显有利，强化了家长以出路为考量的思维而纷纷把子女送往英校。英文在移民社会的强大经济力量，有力地左右着家长的选择方向，这是客观的现实。当国家建设提上了议程，寻找多元种族的有效沟通管道成了建设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课题，殖民地埋下的英语种子因而成为移民社会各方共同认可的中性语言，它借势发挥了优势，在这个小岛上建立了巩固的地位。

华文教育走下坡，是家长的选择，还是政府政策产生的影响，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它互为因果，家长的选择是因是果，不同的取角答案自是不同，我们还等待更多的史料与数据浮现才能佐证分析。

三、结语

华校在20世纪初叶迈入新学堂阶段以后，英国殖民统治当局持着任其自生自灭的消极心态。数据显示，这种侨民环境下，新加坡华校生的人口远多于英校生，所占比率维持在七八成的水平。年代越早、殖民当局的干预越少，华校人口所占的比重就越高。

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与战后东南亚政治的变数导致殖民地政府强势干预华校发展，使华英两大教育系统的人数迅速拉近，数年间英校人口便赶上了华校。50年代末，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英校人口稳健领先。1965年岛国独立，华校人口进入萎缩期，70年代严重枯萎，最终凋零于80年代。

尽管华校系统已经走进历史，但它曾经的辉煌，曾经对岛国的奉献，仍牢记在人们心里。它逆境求存，激励着几代华校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求进，衍生成一种坚忍不屈的精神特质，随着大环境的消失，这种价值正在现社会中隐去。

百多年来，华校在新加坡走的是一条曲折艰辛道路，倘若缺乏“武训兴学”式的办学热忱，不可能在殖民地政府任其自生自灭的心态下抽芽茁长，在无数的风风雨雨中一步一脚印，逐步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华校系统。在民风封闭的百年前，在经济落后的热带，面对严重缺乏的资金，许多华校透过精神的支持力量为教育奠基，以简陋的校舍起步。尽管良莠不齐的师资削弱了教学效果，微薄的薪金使良师难寻，落后的学校管理观念让主事者有志难伸，但是一所所华校就这样伫立在岛国的土地上，人们以热忱化解困境，以惊人的意志筑起教育的长城。随着星移斗转，这个系统最终还是关闭，历史必然留住这个画面，因为执著的精神追求，是人类赖以为继的原生动力。泉

2011年4月14日

注解：

[1] 见黄佟葆《1900-1941年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收于《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页2
[2] 见庄钦永《新加坡崇文阁非学校考辨》一文，收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预言文化中心,南大学人》页231-244页
[3] 数据引自Philip Loh Fook Seng《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 - 1940》页51
[4] 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 页118-120
[5] 见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31
[6] 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 页170-178
[7] 见Shu Yun-Tsiao & Chua Ser-Koon 《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页53
[8] 见叶钟铃《福建会馆首倡新加坡华校小学会考纪实》，收于《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 页19－34
[9] 见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25
[10] 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 页197
[11] 见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28
[12] 见吴华《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页210
[13] 见吴元华《华语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访问原南大秘书长潘国渠(潘受)之记录页164。
[14] 见1966年3月30日海峡时报第八页；198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80周年纪念特刊》页398-399
[15] 此表由笔者根据所掌握到的数据整理。
[16] 见教育部出版《List of Schools & Educations》1980
[17] 见吴元华《华语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页13
[18] 见吴元华《华语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页16

主要参考书目：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 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 1998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柯嘉逊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1991
《华语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吴元华 创意圈出版社 2004
《海外华人史研究》颜清湟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1992
《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 叶钟铃、黄佟葆合编 新加坡华裔馆 2005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80周年纪念特刊》 中华总商会 1986
《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吴华 教育出版社 1976

从“儒家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谈儒家与宗教的文明对话

文：**陈荣照博士**
新加坡儒学会会长

这次新加坡于2013年11月23日及24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厅举行儒学研讨大会的主题是“儒家与宗教：互动和对话”。请让我简单的解释选择这个课题的目的与意义。

儒学的产生晚于宗教，并受到中国殷周以来，尤其是周公宗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儒学又对早期宗教加以世俗化的改造，采取了重人事、轻天命，“敬鬼神而远之”的立场以与原始宗教思想区别开来，形成了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既有别于宗教，又不排斥宗教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中国及西方宗教有别。我们如何把儒学积极有为的入世态度与宗教提携人心向上的超越精神，结合起来，为人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理念基础，是一项新时代的挑战！

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并称世界三大文明，都曾辉煌于世，并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凡是外来的宗教文化，如果不能与具有本土意识的儒家文化相适应，就难以在中国扎下根来。儒家与各宗教都是对于一种价值理念的追求，一种是以思想文化的方式呈现(也有人致力于将儒家发展为儒教)；一种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呈现，但是所提供和

右起：林祥雄教授、王庚武教授、杜维明教授、陈荣照教授在研讨会上留影。

展现的价值理想境界、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都为人类所共有。因此总体而言，儒家对待各宗教，大体是采取一种宽容和开放、海纳百川的态度。然而有时也产生一些差异和冲突，因此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儒学与各宗教之间的深入对话和交流，以求同存异，共存共荣。

展望新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应是东方文化、儒家文明崛起的时代，是从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走向多元文化并存共荣的世界，也是东西文化进一步交融的时代。各民族文化及其宗教、精神文明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儒家‘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新加坡的发展就吸取了儒学及其他各种文明的价值，提倡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语言与语言的和谐，使占人口多数的华族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应加强彼此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相互吸取优长而共同发展，同时应把现代文化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并加强国际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培养能贯通东西方文化的通才，以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通与发展。

近年来，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已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而宗教极端主义往往妨碍新时期人类社会各文明的和谐友好相处。所以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应进行交往，除信奉自己的宗教教义外，也应尊重其他文明和宗教信仰。如果坚持以自己的宗教观念去排斥其他宗教和文明，就会产生狂热态度，诱发种种极端行为。儒学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和谐相处，没有排他性，这是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儒学的人文精神所体现的贯通于各文明、各教派之中的普世性在于：儒学适应了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灌输和强加的，而是出于人类社会道德生活自身的内在需求。所以它在千百年后，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价值，不因人为的排斥和批判而失去其活力和存在的价值。

儒学与各宗教除存在着差异外，也有共同之处，其相近之处表现在，它们都讲爱，这具有普世价值。如儒家讲仁爱，仁者爱人，其仁包括忠恕之道、恻隐之心；基督教讲博爱，以善意和情感平等对待他人；伊斯兰教讲仁慈，行善惩恶；道家讲慈爱，包容性强；佛教讲慈悲，主动去关爱或怜悯所有的人乃至一切生物。

总之，爱是全人类的共同情感和追求，也是人类的普遍本性而贯通于世界各文明和宗教之中。可以说，以仁慈友爱之心做人做事，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

因此，以仁爱为核心价值的儒学在新时代全球化的今天，仍可成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和人类道德的基础，因其人类自身及其和平发展的需要，而具有超越的、普遍的适用性。它将有助于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进步、繁荣、和谐、文明的新时代。通过开展文明、宗教之间的对话，使儒学发挥出更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一步体现出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我们认为，文明与宗教的对话是正确的选择。对此，儒家文明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儒家历来主张“和为贵”，崇尚和谐，求同存异。在文明与宗教的对话中，应提倡“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儒家所体现的这种人文精神，可以为全球社群建立和谐的普世价值提供丰富的资源。世界各文明、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相互对立，而应是和而不同，跨文化交流。从本质上讲，跨文化交流就是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对话，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说，各种文明教化和宗教信仰的人，不仅要欣赏和尊重自己的文明和宗教传统，培育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之根，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和赞美其他的宗教和文化，并广泛吸取各文明和宗教的优点，这样就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博采众长，建设“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美好世界。泉

2013年11月23日

80年代作品何和应

我所认识的何和应学长

文：**曾炽豪**

何和应先生，何许人也？

如果你经常读报，而又关心本地的文化、艺术，相信对“何和应”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首先，他是琼籍人士的精英。再者，他是我国二〇一二年文化奖的得奖人。政府肯定他半个世纪以来对我国视觉艺术方面的杰出贡献。他是致力于抽象，半抽象绘画的知名画家，艺术理论家，艺术活动的积极“推手”，同时也是好几本文艺、艺术著作的作者。总之，何和应是个多面手。

早期云南园“神驹”骑士

对我本人而言，他是我大学时代多年来日夕相见的同班同学，每天相见于讲堂，相见于礼堂，相见于食堂，相见于走廊，真是如影随形。如今岁月不饶人，大家都年逾古稀，早生华发了。想当年(五十多年前的当年)，和应兄雄姿英发，骑着一辆“士古打”(Scooter)穿梭于云南园青山绿水(南大湖也)之间，好不潇洒。用现代的词语来描绘，就是“酷”(Cool)。叭叭叭叭，当“叭”声响起来，你就会明白：和应兄就在你左右。当年在南大校园中，穷学生占大多数，能弄得一辆“士古打”代步的，绝无仅有。和应兄骑着这匹“神驹”在云南园不同的角落穿梭奔驰，就成了他独一无二的活标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在南大由于谊属同系(中文系)，跟和应兄相识于云南园。有一段日子，每天午餐、晚餐，都跟和应兄在食堂同桌共食(一桌八人)。课间空节，也常到餐厅喝咖啡，摆龙门阵，抬杠，天南地北，大聊一通。开始的印象是：和应兄话不多，略形低调，眉头深锁。何兄原本是能言善道，口若悬河的名嘴啊！何以噤若寒蝉如此？想必是背负着不少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难题，心情并

不舒畅吧。虽然如此，若是谈起他感兴趣的话题如绘画，他就欲罢不能，而愁眉苦脸的阴云，也就烟消云散了。

文艺是“初恋情人”

和应兄推崇抽象绘画，总觉得写实的具象画大大地束缚了艺术的创造性。可是那个“远古”年代，文化闭塞，风气未开，对什么新鲜事物都大惊小怪，抽象画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毒草。和应兄不惜冒犯众怒，在报上为抽象画奋力辩护，使他“声名大噪”。基本上，我十分认同他的艺术观，但在品味，理念，价值观，人生观上，我跟何兄有着大大的大同、小小的小异。我想，作为同道，这已经很难得了，根本不足为憾。目前，我国高唱包容，我赞成。但愿人们包容我的包容。

对绘画艺术虽然痴迷如此，可是和应兄却曾坦言：文艺才是他的“初恋情人”。无怪为了写好一篇小说，何兄曾废寝忘食，不眠不休。其实，文艺跟绘画不也是相通的吗？都是追求“美”，也追求“完美”。和应兄仿佛也蛮喜欢古诗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人征战几人回？”这是他时常朗诵的七绝。此外，对文字学中的钟鼎文、甲骨文等古字体的字形，他也满着迷的。那是个“洪荒时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他似乎颇有兴趣发明一具携带方便的中文打字机。方法是操作一些不同的基本偏旁或结构成份，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方块字。这种构思，是行得通的。这种纯机械式、复杂精巧的中文打字机，后来林语堂花了多年的心思和为数不菲的金钱，真的给制造出来了。林博士靠它发了大财吗？吾未之前闻。大概很快就被电脑取代了，出师未捷，以致沦为一具有趣的玩具。

共同兴趣是看电影

和应兄跟我有个共同的兴趣：看电影。我们都算得上是大影迷。尤其是叫好又叫座的西片，更是如数家珍。而当时的帅哥、美女、天皇巨星、性格演员，都成了我们崇拜的偶像。诸如尤伯连纳，里察威麦，威廉荷顿，“玉女”伊丽莎白泰莱，“性感的小猫”碧姬芭杜，艳星苏菲亚罗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都成了我们热门的话题。偶而言不及义，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于大雅何伤？

很快的，和应兄就找到半工半读的机会，解决了经济拮据的难题，心情也略见好转。那是在严元章博士主持的教育系当助理，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严博士。严博士不苟言笑，规行矩步，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很多人都受不了。和应兄有一段日子，还跟博士两人共进早餐，对严博士正襟危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拘束样子，应该不大习惯吧；但对严博士温故而知新的实践——每天都念一点古诗词，和应兄也亲自见证了。

从当年大学的日子，我就察觉到和应兄有不少美德，譬如：谨守诺言，和颜悦色，认识大体，却坚守原则，据理力争，娴于说服，对责任当仁不让。但别看他那温、文、谦、恭、让的“尖头鳗”(gentleman)形象，若碰到整人为快乐之本、不识好歹的嚣张之徒，他也会毅然决然地设法令此徒知难而退。这事后来传到严博士的耳中，博士觉得这事有违“以和为贵”的原则，劝和应兄大方地道歉，和应兄从善如流，化干戈为玉帛。此后嚣张之徒也就不敢再招惹他了。

在大学里，要学的东西很多，但和应兄最感兴趣的，除了美术之外，还是美术。也不知道他怎么样结识了许多美术界的朋友，我也沾了光。先驱画家陈文希前辈是名满画坛的长者，我也曾随和应兄造访这位画坛巨匠，向他就教请益。黄明宗先生是艺坛的多面手，集画家、雕塑家、篆刻家、书法家于一身，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奖的得奖人，曾为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制作塑像，后来这具形、神兼具的塑像，就安置在南大的学生楼。黄明宗先生，和应兄和我，当年是在南大认识的。知名的雕塑家陈錄记先生亦然。从前多米哥狮城大厦门前广场上的巨大抽象雕塑：参天的巨形钢管组合，就是出自陈錄记之手。而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在多米哥国泰大厦前的小园地中，看到一座巨形的抽象雕塑，也出自陈氏之手。当年錄记先生远赴香港，负笈于中文大学，趁回新度假之便，特地上来南大跟和应、我，盘桓了几天，综谈美术，好不畅快！此事可待成追忆。

“在大学里，要学的东西很多，但和应兄最感兴趣的，除了美术之外，还是美术。也不知道他怎么样结识了许多美术界的朋友，我也沾了光。先驱画家陈文希前辈是名满画坛的长者，我也曾随和应兄造访这位画坛巨匠，向他就教请益。黄明宗先生是艺坛的多面手，集画家、雕塑家、篆刻家、书法家于一身，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奖的得奖人，曾为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制作塑像，后来这具形、神兼具的塑像，就安置在南大的学生楼。”

1960年‘南大生活’文学院礼堂壁画

不是空想理论家

既然心心念念，都是美术，美术，美术，何不搞个“美术协会”呢？和应兄不是个空想的理论家，而是个实行家，于是“蠢蠢欲动”，坐而言，起而行。马上招兵买马，创立“南大美术协会”。草创时期，不成气候，惨淡经营，所有会务，事无巨细，都由大家“一脚踢”。既是发起人，和应先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自任会长。而林怀碧学长，吴秀珍学长，和我区区在下，就充当执委。这样的一个团体，一开始时，不可讳言，是有点寒酸的。这事我在《逍遥于相思树丛中》一文已有详述(见《一九六二年南大中文系毕业班纪念文集》一书)，在此，我就一笔带过。虽说“不成气候”，但当时在短短两三年间，以有限的资源，微薄的人力，确实也搞了不少美术活动，亦堪告慰，应该引以为荣。

约略地说，那两三年，南大美术协会在和应兄的领导下推动了一些会员习作活动，办了一些会员习作的观摩展，和一些美术方面的讲座。最值得一提的是：曾特请先驱画家刘抗前辈上南大讲述“五十年来的新加坡美术”。为了筹募基金，曾在坡底国家图书馆开了一次画展。此外，协会还出版过几期的美术刊物(大概三、四期吧)，我也曾凑热闹，写过一些文章。记得其中一篇，有句云：“不仅不是多余，而且是必需的。”蒙和应兄指出：这样的表达方式，倒蛮特别。惭愧，惭愧。从中也可看出：何兄心细如发。

五十多年前，在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博士的眼中，诺大的一座文学院建筑物，空空荡荡，除了办公室、课室、自修室、讲堂之外，一无所有，简朴有余，情调不足，似宜加以美化。于是从学生中，物色一些绘画高手，给文学院制作壁画，以增添姿彩，披上新装。受邀的有刘坚詠学长，李福喜学长，刘凌聪学长，徐靖沂学长，当然少不了何和应学长，我也有幸名列其中。壁画是每位学长独立设计，独立绘制的。说到何兄跟我的部份，则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我们各自完成两幅约十多呎见方的壁画。何兄的作品就在文学院正门两侧，内容是“大学生活”，以半抽象的形式出之。我本人的，则在大堂二楼长廊正中，左右两壁各一幅。左边的是“海底风光”，右边的是“森林风光”，亦属半抽象之作，都花了我们两、三个月的时间。完成后，严博士曾告诉我们，前辈画家刘抗、陈人浩两位先生曾上南大观看，颇有好评，勉励有加。

绘制最大壁画

至于第二阶段，则是由和应兄、李福喜学长和我三人，分别绘制三幅硕大无朋的巨幅壁画，以五十三年前那个“洪荒时代”的标准而言，那都是新加坡面积最大的壁画。文学院是南大所有学院最巍峨，最壮观的建筑物。后方与之平行的，是三座独立的建筑物：大讲堂(左)，大礼堂(中)，大讲堂(右)。壁画各别绘在“三堂”后面的墙壁。南大师生穿梭其间，举目游观，就是这三幅巨画，每幅都高十呎开外，长约五十呎，可谓南大的巨龙。和应兄绘的是左边那幅，福喜学长绘的是中间那幅，至于在下我则绘制右边那幅。这是南大的大事，也是我们生命史中的大事。这事我在拙作《逍遥于相思树丛中》有很详细的叙述，这里我就略为提及，就不多说了。

大学的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依依不舍也不能死赖着不走啊。但和应兄跟我似乎缘份不浅。当时人浮于事，反正还未找到工作，除了画画外，有的是时间。我们经常相约，乘坐他的士古打，风驰电掣于一些地点：于咖啡店，于大树下，于植物园，于戏院，或观赏电影，或高谈阔论，其中亦碰撞出不少灵感的火花，不亦快哉？有一次还远赴联邦柔佛州，到陈錄记兄的老家：万木丛中的一座阴凉的浮脚楼，盘桓数日，听西洋古典音乐，猎杀蝙蝠，

烹而食之。更一不做二不休，西进笨珍渔港龟咯(kukup)。适逢当地学校假期，在渔民子弟小学校舍中，小住数日，游目瞩怀，观渔民捕鱼作业，赏渔港别致风情，任海风吹拂，看漫天彩霞，一乐也。

很快的，和应兄就找到工作了。在“青年领袖训练学院”担任讲师。工余之暇，仍然勤于绘事。没多久，结婚，成家，生活趋于安定，心无旁骛，于是，伙同一批志同道合的画家如黄明宗、黄奕全、董长英等等诸位高手，发起“现代画会”，标榜创新，主张突破。两三年后，我亦加入，成为会员。会址是在尼文律，靠近丽士戏院，一个闹中带静的理想地点。那儿原本是黄明宗先生的画室，后来黄兄负笈巴黎，再求深造，就先后由陈贻僮君(已故)与画虎专家陈悟迟君接手。很快的，这地方就变成画家的联络中心，尤其是周末中午，都把它当做中途站，总爱习惯性地到那儿休息，聊天，抬杠，喝咖啡，何兄亦不例外。

当时画会有个绘画班，由陈悟迟兄主持。有一段时间，我的邻居——一个不显眼的李姓年轻人，经常到画会学画，我也偶而替他改画。数年后从事设计的行业，后来举国人人熟悉的新加坡国家标志——狮子头，就是那年轻人的杰作。可见“现代画会”地灵人杰啊。

“现代画会”自从60年代创办以来，一直非常活跃，展出频繁，引人注目。在开风气方面，建立过不小的功勋，希望新加坡不会忘记它在我国绘画史上开创之功，不让这段斑斑史迹烟没不彰。而和应兄等诸君子，正是那些功臣。

还记得那时，每次画展过后，同道们总会近便到实利基路横街的张洪记菜馆楼上雅座聚餐，打牙祭，高谈阔论。豪情胜慨，俱往矣，往事只能回味。

从艺术专题主讲人到美总会长

从七、八十年代以降，我国艺术团体渐多，艺坛活动纷起，各种画风亦如百花之齐放，人们不再大惊小怪，而是“见怪不怪”了。和应兄除了领导会务、创作不辍之外，还多了不少社交的活动；出席本地或外来画展的开幕礼。作为主宾，少不了受邀即席演讲。这可是和应兄的强项啊。于是滔滔不绝，或赞赏，或勉励，或畅述画坛趋势，或指示创作的方向，都极其得体，想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他如出席研讨会，与国内外画家交流，参加讲座，充当艺术专题的主讲人，凡此种种，对交游广阔又性格外向的和应兄来说，更是胜任愉快而优为之的事了。诸画家都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如果你没本事，他们会服你才怪。然而和应兄在美术界却似乎颇得人心，可不简单，无怪后来当了“新加坡美术总会”的会长，大家都乐得让他领导，而何兄也没有辜负大家。因为在他的任内，“美总”颇多建树，除了推出各种美术方面的讲座，研讨会，习画活动(譬如“裸体画”，后来成为每周的长期例常活动)之外，当然少不了各类的联合展出(如“加隆咕里”展)。还有一件“大手笔”：曾在中国四川成都，物色得一栋幽雅小筑，作为“美总”会员旅华时的活动中心，给画家提供诸多方便。

从他退休前到他退休后，花掉他大半生漫长的岁月和无可估量的精力，这都是无偿无私的奉献。文化奖不颁给他，颁给谁啊？何况何兄本人在艺海中长年孜孜不倦，不断钻研，不断尝试，不乏心得，不乏成果，如提倡“创意书法”，而单单个展(包括书法展)就有五六个之多，硕果累累。

退休后，何兄还再接再厉，成功申请到“艺理会”的奖学金，远赴中国杭州艺术学院，深造艺术理论经年。学无止境嘛。

大家都是退休人士。有一段日子，大概是从2001年到2007年间吧，何兄喜欢“呼朋引类”，每周或隔一周，就主动约三、五位同道，到坡底书城的“食阁”，或奎因街的“荣亮阁”相聚品茶，聊天，抬杠，交换讯息，这是轻松写意的聚会。何兄充当义务的召集人，功德无量也。

2012年荣获新加坡文化奖

古稀之龄早已度过，何兄亦达望八之龄，不再像青、壮年代那样精力充沛，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兄曾诉说如今记忆力大不如前了。我曾劝慰他说：凡事看开，听其自然。处之泰然可也，放宽心怀，无需耿耿于怀，不必给自己增添压力，奇迹有时也会出现，记忆力说不定也会恢复的。

去年(2012)年底，何兄荣获文化奖，几位南大同班同学和我，特地到何兄府上恭贺。喜见何兄气色甚佳，心情愉快，我们都替他高兴，分享他的喜悦。但愿人长久。泉

2013/08/19写完

“从七、八十年代以降，我国艺术团体渐多，艺坛活动纷起，各种画风亦如百花之齐放，人们不再大惊小怪，而是“见怪不怪”了。和应兄除了领导会务、创作不辍之外，还多了不少社交的活动；出席本地或外来画展的开幕礼。”

新加坡琼剧概况与未来发展途径

文：王永炳博士

新加坡琼剧概况

清代以来，中国时局不靖，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沿海一带的穷乡僻壤，人民生活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求生计，纷纷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南来谋生。鸦片战争(1840-1842)以后至20世纪初，华南移民蜂拥而来。当时移民可分两类：一是契约劳工(俗称猪仔)。这些劳工等同卖身给雇主，受尽凌辱，苦不堪言，因此病死累死者众多。19世纪60至70年代，是猪仔买卖的鼎盛时期；另一类是自由移民。他们自费前来，行动自由，不受限制。20世纪初多属自由移民。

早期华南移民赤手空拳南来，首先所碰到的共同问题是寻找一个栖身之所与生计。为解决这个难题，来自同一区域、操共同方言的移民，便凝聚在一起，团结互助。因此，基于地缘性的组织，便应运而生。19世纪的地缘性组织，多称为“会馆”，如福建会馆、琼州会馆等。

进入20世纪，华人社团组织大事扩充，在20至30年代，更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那时期的社团，不仅数量大增，类型也形形色色，多姿多彩，除了原有的地缘、血缘与业缘的组织外，更有文化教育、消闲娱乐、宗教慈善，乃至于代表广大工人利益的工会出现。

琼剧在琼州会馆成立(1854)之前已在新加坡演出了。根据《中国戏曲志·海南卷》记载：“咸丰(1851-1861)以后，海南戏曲流播东南亚各地渐多。咸丰二年(1852)冬，安定县、万宁县艺人共同组建‘琼顺班’，应新加坡、泰国华侨的邀请出国演出。咸丰四年春，会同县‘凤兰班’，又到新加坡、暹罗、槟城等地旅演。华侨盛赞正旦李凤兰为‘盖世名花’、‘名花一枝’、赠武生卢彩文‘武甲五洲’”。[1]所以说，琼剧传入新加坡少说已有150年以上了。

20世纪初，南来的琼剧班日多。海南岛内的名角如陈成桂、汪桂生、十五仔、三升半也都纷纷南下，加强了琼剧队伍的阵容，丰富了新加坡海南人的精神粮食。

日本统治时期(1942-1945)，为了安抚人心，日军“便把所有艺人召集起来，编为日军宣传部队，强逼艺人登场粉饰太平。至于正常的琼剧演出，则必须取得日军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在这段东南亚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琼剧艺人完全失去了艺术自由，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反抗日军，以演出不带现实政治色彩的传统剧目进

行无声的抗议。在坚持南洋琼剧演出的艺人中，不少人惨遭日军毒手。”[2]根据记载，惨遭日军杀害的著名琼剧艺人有李积锦(靓仔锦)、金狗仔、新十五仔、潘月波、陈少秋、郑慰真、王永文(车大炮)等多人。

日军投降后，百废待兴，人民虽重获自由，但生活困苦依然。琼剧演出情况未见好转，直至50年代以后，琼剧发展有了转机。本地艺人热情重燃，再加上来自海南岛优秀的资深演员组团巡回演出，并举办琼剧训练班，培养新人。50至60年代，琼剧团如琼州青年会、琼联声、琼南、二南、艺光、明天、琼联华等剧团纷纷出现，新旧艺人同台演出，热闹异常。资深报人王振春在《老辈耕耘新辈继一一新加坡百年琼剧史》中说：“这时期，出了不少琼剧新人，如明天剧团的郭文山、范希文；琼联友剧社的吴秋娥、卢江波、黎丽英；琼南剧社的韩桐英、符祥克、张家声、翁书泮、黄文申、小凤梅以及掌板韩萱元；艺光的符青云；琼联声剧社的王能、王涛等。”[3]

1960年及1962年，琼南、明天、琼联声、琼联友等剧团热烈响应马来亚琼州会馆联合会“发动星马琼剧团义演筹募大学讲学基金”义举，积极参加“琼联剧社巡回东海岸义演”及“琼联剧社西海岸巡回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支持，筹款获得极大成功。琼剧各团班衷心团结地落力演出，圆了社会贫困子弟的大学梦，意义非凡。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正处在一场惊天动地、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惨遭破坏或摒弃，从业人员人人自危，与海外关系骤然中断。不过这期间，凡有庙宇酬神、社团庆典或为筹款义演，新加坡各琼剧团还是落力参与演出。

“文革”结束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双方来往逐渐频繁。1982年10至11月，广东琼剧团访问泰国和新加坡，并公演29场。他们精炼娴熟的表演艺术技巧，令观众大开眼界。“惊喜之余，我国几个活跃的琼剧团如琼南剧社、海南协会及琼联声剧社都毅然追随，改善演出模式，培养新血，纷纷打起向专业同行看齐的旗帜。我国琼剧的水平终于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4]1987年，广东琼剧团第二次访问新加坡，并带来一批中青优秀演员，他们的舞台艺术依然令观众叹服。这二次访问，令本地琼剧界大受启发与反思。琼州会馆、琼州青年会及其他业余剧团和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合作，于1988年7月开办“琼剧艺术研究班”，以提高琼剧表演艺术及栽培新人。这方向是正确的，但整体而言，琼剧与其他地方戏曲还是举步维艰，而且是日走下坡。何也?

从90年代至21世纪，新加坡人基本上丰衣足食、生活安定，照理应是追求与享受传统文化盛餐时刻，怎奈理想与现实无法接轨。原因大略如下：一、新加坡琼剧演员都是业余者，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凭着一股热爱参与演出，无暇顾及训练接班人，等到他们退休时，琼剧演员正走上青黄不接之路。二、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广讲华语运动，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卓有成效，相反的，方言没有成长机会，在80年后的年轻人，已经失去欣赏以方言演出的地方戏曲的兴趣与能力。三，80年代以后，教育部推行双语教育，母语成为单科教学科目，英文除本科外，也是数理化史地等科目的教学媒介语，成为强势语文，母语水平大幅度降低，中学课文已经不收浅近文言文，当然更不存在《窦娥冤》、《长亭送别》等教材，学生自然不知中国戏曲为何物？四、随着新加坡城市化计划，各地村落都整个儿在人间蒸发，地方戏曲的大本营华人庙宇和义山也不得不迁移与消失，每年热闹的酬神戏也就没了声息。五、琼剧演员都是业余的，缺少资金与市场，单凭着热爱是无法长久地坚持下去的。六、当代科技传媒发展瞬息万变，各种娱乐事业丰富多彩，广泛地通过电脑手机传播，时下年轻人再也无法欣赏慢节拍的地方戏曲了。

未来发展途径

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传扬传统文化成为发展重点项目之一。目前，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昆曲”和“南音”已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而琼剧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显见地方戏曲已深受重视。与此同时，新加坡为赶搭中国经济腾飞的顺风车，教育部已调整了母语教育尺度，放宽修读高级母语条例，让更多有能力和兴趣的学生修读高级母语，也扩展了“华文特选课程”以及在特选中学开设“双文化课程”。这些利好信息无疑给走向式微的地方戏曲重燃希望之火。因此，琼剧从业者应借此契机找出一些有用的发展途径，继往开来，让这块文化瑰宝继续发光。我不顾谫陋，浅见如下：

一、整合资源推动琼剧

(一) **人力资源：**每个剧团都有不同的人才，但数量毕竟有限。以有限人才资源要搞大型演出，肯定会疲于奔命，成效不大。如果整合调度不同剧团中的演员，大家摒弃成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为海南族群文化努力，成果肯定比单独行动来得好。新加坡国小，要容纳众多琼剧团谈何容易？如果整合收编成少数几个，阵容更强大，人才更集中，作用更大，对琼剧发展更为有利。

(二) **物力资源：**相对而言，排练与筹备演出时，最令人感到焦虑不安的是经费欠缺。新加坡有不少著名基金会，如中华语言文化基金会、国家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会等，但据知申请足够基金赞助并不太容易。为达成发展琼剧使命，勿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今之计，除了继续向各基金会求助外，作为领导与维系海南各宗乡社团组织的海南会馆，实应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设法解决有关的各种困难。

(三) **组织资源：**政府机构、民间社团、各地方戏曲团体或学院都应开放资源，互通声息，互相扶持，提供有关协助途径。各琼剧团在公演前，应互相知会关照，以免重叠碰撞，造成损失。

(四) **资讯资源：**当今世界，网络资讯铺天盖地，无远弗届，各剧团组织必须与时并进，设立网页，以便及时获得最新信息和有关或友好剧团进行学习交流，从中获益。

二、发展优质琼剧

宁缺毋滥，是优质戏曲不可或缺的原则。以昆曲为例，在众多地方剧种之中，昆曲被美称为“百戏之母，百戏之师”，绝非过誉。陈士争全本昆曲《牡丹亭》(55出)曾在2003年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演出四天六场，轰动一时。昆曲的细腻柔婉，帮腔对感情的表达、渲染，明传奇唱念作打的综合统一，宾白音调的铿锵婉转美听，文细正场的雅丽，群戏同场的热闹，都一一呈现眼前，许多观众观赏后都认为有一种有说不出的享受。两年前，白先勇带《青春版牡丹亭》团队演出，同样造成轰动。沉寂一时的昆曲，不但再发光芒，同时被选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原因无他，纯在“优质”二字。昆曲的舞台艺术、剧本、演员、唱腔、身段等，都是构成优质的条件。我想，琼剧从剧本、唱腔、演员等方面着手，改进改良，必能取得优质成果。1977年，琼剧《红叶题诗》一改过去提纲式演出方式，开始“定腔定谱”排戏，结果大获成功。《红叶题诗》就是因为剧本好，唱腔美听、演员演技一流而风靡海内外观众。所以，只要是优质戏曲，必广受欢迎。

三、开办琼剧研习中心

为培育琼剧新苗，使琼剧不至于后继乏人，开办琼剧培训中心，乃是正确途径。这方面新加坡琼剧团曾有过辉煌纪录，1981年，琼州青年会为了发掘和培养琼剧新秀，以及积极发展琼剧舞台艺术，开设“琼剧训练班”。因感于势单力薄，困难重重，因此1988年扩大组织范围，由国家剧场信托局联合琼州会馆、琼州青年会及琼侨咖啡西餐商公会开办“琼剧艺术研

究班”，七个业余剧团即琼州青年会、新兴港琼南剧社、琼联声剧社、后港琼崖同乡会艺光剧团、琼联友剧社、漳宜琼侨同乡会明天剧团及二南剧团参与工作，课程受到琼、潮、闽、粤及京剧演员及戏曲爱好者的热烈反应，共有大约70多位学员报名参加各班的训练，使新加坡五大剧种的老中青演员，不分疆域，打成一片，为地方戏曲演员集体学艺创下先河。[5]此情此景，如今思之，依然感奋不已。当时的影响至今犹在，当今一些老戏骨都是当时“研究班”的学员，但是，他们都已垂垂老矣。此时，如果再不开办延师传授技艺，恐怕为时晚矣。海南协会戏剧主任林师灏的呼吁值得注意：“在这方面，希望海南会馆能起来领头做‘大哥’，长期开办训练班。”[6]

四、加强琼剧研究与设立琼剧资料库

戏曲是一种载歌载舞、说、演并重的艺术。它综合了诗词歌赋、话本、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多方面的因素，全面运用唱、念、做、打等各种艺术来演示故事，可说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戏剧体系。从这层面看，戏曲值得研究的地方实在太多。概括而言，有二：一、表演情况方面，二、案头阅读方面。譬如，琼剧与潮剧源于江西弋阳腔。弋阳腔的特点是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帮腔具有增加戏曲效果的功能：台上主角唱至凄婉欲绝的当儿，再由台后帮腔，主角配合歌唱表演各种舞蹈动作，往往震撼人心，赚人热泪。琼剧后来没了帮腔，而潮剧则无戏无之，原因何在？琼剧有所谓提纲戏，它产生背景及对琼剧发展有何利弊？这些都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需要有足够的资料方能为之。换言之，有质量的研究探讨，对琼剧价值将起着无可估计的作用。

在新加坡地方戏曲发展史上，这二方面的资料都非常欠缺，特别是案头阅读资料。就譬如琼剧剧本，能拿到手的往往是即兴演出的提纲本或未成书的手抄脚本或影印本，很难作为课题研究的根据。故此，有志于研究琼剧课题的学者往往因欠缺足够资料不是举笔维艰就是裹足不前。[7]反观《牡丹亭》、《琵琶记》、《长生殿》、《桃花扇》虽然靠昆曲完美演出而传世，但完好无损的剧本却留下各种值得研究课题或项目的瑰宝，例如：主题、结构、手法、排场、词采(曲文、宾白、科诨、造语用字)、格律、形象等。从“造语用字”上，又可以探讨海南人在语言运用、社会生活与礼俗上的真实面貌。因此，为了弘扬琼剧，加强琼剧研究与设立琼剧资料库是琼剧发展必不可少的途径。

结语

琼剧南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过去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从事于琼剧的先辈们，前赴后继地在极端不利的生活条件下，无怨无悔地为海南乡亲们提供了丰厚的精神粮食。但是，由于时移势变，客观环境的局限使主观愿望难于实现，琼剧在东南亚的发展始终波折重重。所幸到目前为止，新加坡的业余琼剧演员依然有昂扬斗志，配合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海南省的琼剧界互相联系，采取“走出去，请进来”[8]策略，共同为琼剧前景努力。泉

(写于2011年新加坡戏曲学院主办海南会馆协办琼剧国际研讨会暨狮城琼剧大汇演，2013年修订)

[1] 杨志杰主编：《中国戏曲志》（海南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8年。页11-12。

[2] 林春兰：《琼剧在新加坡的发展》（硕士研究论文，影印本），2005年4月22日。页17。

[3] 载《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13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琼州会馆出版，1989年。页315。

[4] 符青云：《借鉴过去、策划未来》，载于《新加坡琼联声剧社庆祝成立五十四周年特刊》，2011年4月。页5。

[5] 引自林春兰《琼剧在新加坡的发展》，页24。

[6] 引自林春兰《琼剧在新加坡的发展》，页108。

[7] 林春兰在研究《琼剧在新加坡的发展》时，偶遇海协副理事长林端利，惊知其已故父亲林禄三留下所编著的73本琼剧本。经过林春兰的详尽的研究分析，引起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文化遗产与亚洲处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将这些剧本及一些有关文物和照片，列为新加坡民俗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作为永久的珍藏。要不是林春兰的研究与偶遇，林禄三为琼剧所做的贡献岂不是被淹没？从而可见，资料库的重要性。

[8] 新加坡琼联声的口号。

从泰国海南作家的作品中
理解乡亲多元
生活思潮及对待人生

文：烈浦

我今年(2013)六月三十日，同乡亲王永炳博士飞往泰国曼谷出席第13届亚洲华文作家大会假中华会馆中山纪念堂。出席的作家们皆来自亚洲各国及地区的华文作家近八十名之多。

在亚洲国家或地区里也见到有海南作家。亚洲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符兆祥就是海南乡亲，他来自台湾并且是台湾土生海南籍作家。马来西亚的李忆著女士(大马作协副会长)是文昌乡亲；来自柬埔寨的王潭与陈嘉红也是文昌乡亲；在泰国已认识或新知或

柬埔寨2位陈嘉红和王潭(左1和6)泰国5位陈爱妹、王家丁、范基山、符传文与符绩忠(左2、3、4、5和右3)台北符兆祥秘书长(右4)新加坡两位陈川强和王永炳(右2、1)

知道是海南乡亲作家，就有：岭南人(符绩忠)、符征(符传文)、范基山、符致炳、林明儒、陈爱妹(陈安玲)、王家丁、周星光、思维(莫蓝玉)、韦云、郭元勋、韩元钦、陈庶华及姚奇义……。

泰国海南作家或热爱华文文艺创作的乡亲，我知道至少有六十名以上。在年长的泰国作家群中，有不少除了能讲泰语之外，在日常生活与乡亲交流中还能以海南话相互沟通。像我与王永炳乡亲同岭南人(符绩忠)、符征(符传文)、范基山和陈爱妹等等乡亲，仍不忘以“祖籍海南语言”进行交流，双方都感到亲切得多!

这群老中年作家，他们在十六年前(1997年)特别成立了“泰国海南文友联谊会”；作为集聚海南作家的中心，共同致力推动中华文化及出版华文文艺丛书的火车头。

在曼谷这三天来，我同永炳乡亲特别争取机会与泰国几名海南作家相处，知悉海南作家对泰国华文文坛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小。因为，海南籍作家每年都有推出好作品。

依据符致炳乡亲在《泰国海南文友作品选集》的第14集中的《序》文中说：泰国海南文友联谊会在2012年8月间出版并在泰国全国发行《泰国海南作家文选》。这么看来，仅不到一年的时光；该联谊会就推出了第14集的《泰国海南文友作品选集》。由此可见，其出版速度真是惊人呀!

对泰国华人史颇有认识的范基山乡亲，他说：泰国的资深华文作家们，对热爱中华文化和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热忱是令泰国华人感到鼓舞的。他只担心与顾虑年轻一代，不爱去学习华文和中华人文社会的文化历史。因此，泰国华人尤其海南乡亲都渴望自己的儿女或子孙后代，都肯去学习华文和去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

我知道岭南人(符绩忠)和符征(符传文)是泰国湄南华文散文八大家之一。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认识岭南人与符征两位乡亲作家，开始有机会阅读两人的文章。尤其岭南人的诗作，曾在我主编的《椰乡》的其中一期发表，(《椰乡》为新加坡海南会馆早期出版的馆讯)，该首诗作当时受到馆员与海南知识界人士的赞赏。

岭南人本名符绩忠，原籍是海南海口市人。今年(2013)已是81岁高龄了。我今年先后于3月和6月飞往泰国曼谷开会，两次都见到了岭南人乡亲并受到他的盛情接待与引荐乡亲作家友好相互认识。我们不论在狮城或在泰国见面，至少都会使用纯正的海南话交谈之后，接着才使用华语谈论两地华文文艺的发展趋势与文友的生活和写作状况。

在我记忆中，岭南人乡亲曾告诉我：他早年毕业于中国山西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便到泰国谋生，后来经营珠宝行业。写诗撰文是他业余生活的爱好。渐渐的，诗便是他‘膜拜的神’。因此，他向泰国和世界华文文坛宣称：“诗，是他的最爱，也是他的神”。岭南人有一首新诗：《历史老人扔下的担子》就曾在《椰乡》发表。这首诗，已入选《泰国新诗三百首》的诗卷中。无疑的，这首诗将永远被泰国华文诗坛传诵，也被世人传诵。

岭南人的散文写得很丽；很真；很诚；很韵；很化。就以他的《横在湄南河，一条红头船》和《海滩上的诗人画家》这两篇散文为例，你就会同意我对岭南人的散文勾出上述五大特点：“丽、真、诚、韵、化”会给予认同。

我就从《……红头船》一文中摘录岭南人对‘红头船’的陈情短句一节：“四尊古炮后面，赫然横着一条红头船，搁浅在河边。船身上斑斑的痕迹，看了令人顿生沧海桑田之叹!苦觅，以画家的眼光，观赏之后，他说：要是建在河里，该多好!我说：好是好，如建在水中，可能早就逐流漂走了，不会搁浅在岸上了”。从作者运笔，用字、用情，就感觉它具富：优美、真挚、纯诚、韵味和生活化。令人读之信服，无限愉快。

再读岭南人的《海滩上的诗人画家》一文，他在开头这么说：“踩着浪花、涛声，昨夜，一个温馨的路上，焕彰与我，走马看花，一连浏览了三家临海的五星级宾馆：皇家花园……雕塑及花园里一花一木都牵情依依，不忍离去。焕彰兄，早已身为祖父，但童心未泯，在他诗人、画家的眼里，处处都能见到真，发现美”。像上述这样的

生长在泰国的华人，与各地的华人一样重视“端午节”，在林明儒的《端午节与屈原》一文说，一般人会问：“何必等过节才吃粽子？”但作者却写道：“平时吃粽子，没有过节趣味，一定要在过节那天，才能吃出乡土人情味，才能应景情生”。我深信众多人都有如此体会和想法。

笔调，我始终觉得岭南人对写事、写景、写人都能紧紧地扣住在一条管带上，落笔十分自然，丝毫没有夸张，只有真挚的情感相互交织。

我认识符征与岭南人是同个年代。符征也是文昌人。原名符传文，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今年也已七十六岁以上高龄的作家之一。

符征擅长写散文和长、短篇小说。他的主要短篇小说集《学成归来》是早期完成。长篇小说有：《东风与西湖》和《春天的浪花》，都对泰国华文文坛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奠定了他在泰国华文文坛的名气。

在散文方面，符征曾同岭南人合著：《三月天》和《看山》。其实，他先后在《世界日报》湄南河副刊辟了“游尘漫笔”和“春旭闲笔”专栏，已写了不少的随笔，备受泰国华文报读者的喜爱。

符征和岭南人的许多作品，都爱写泰国或以泰国为背景的散文与小说。像《曼谷的魅力》、《象国》、《人间吉祥天地》、《斗鱼奇谭》等等篇章都离不了泰国。且读符征怎样写泰国有魅力：“几百年来赖以维生的湄南河流域之间，论百平方公里井井有条的稻田围绕着大曼谷，它是名传遐迩，世界著名的鱼米之乡”。我今年(2013)的三月和六月到访泰国曼谷，真的感觉泰国是象国，因为，象很热爱劳动，泰国的朝野和人民都非常尊崇象。

泰国资深与年长或中年的海南作家群中，没有一位不识泰语泰文的。像岭南人与符征对泰语泰文都能掌握得蛮好的。其他许多海南文友群，一样悠游地生活在泰语的环境中。

从第14集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窥视泰国半百位的海南作者的知识文化观、社会观与人文价值观是相当可取的。作家思维向海内外读者指出：泰国的海南文友，他们的作品都有谈论传统；谈论幸福；谈论节庆；谈论尊师重道；谈论故国山河……不仅能坚守，还能发扬。韦云更面对生命并强调：“只有在每个‘现在’里勤谨、奋斗，才有美好与真实的‘现在’”。我看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美好的。值得人们共同追求。

郭元勋在《漫谈教育》一文，特别提醒：“泰国人民代表或专家之流，勿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悲剧”。这‘提醒’是带给世人一同去深思廉耻的课题。

生长在泰国的华人，与各地的华人一样重视“端午节”，在林明儒的《端午节与屈原》一文说，一般人会问：“何必等过节才吃粽子？”但作者却写道：“平时吃粽子，没有过节趣味，一定要在过节那天，才能吃出乡土人情味，才能应景情生”。我深信众多人都有如此体会和想法。

新加坡人最近的一些日子，都在讨论：如何生活才算是幸福？我的前同事陈福希告诉我：她慢慢地享受生活，那才叫幸福。报界的张从兴乡亲却指出：生活要‘自足’才能找到幸福。泰国陈爱妹宗亲对人们说：“如果能持有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那么，自然就少了很多很多烦忧心事，便会保持着微笑，幸福感自然也会常驻”。而韦云乡亲却指出：“生活是以自由和平安为主，但要求得简单，人生就愈幸福”。我深深去思索四人的说法都觉得可取。

我们虽然都住在地球上，但对地球或宇宙的了解不多，也很少去谈论。可是，泰国周星光乡亲却在《宇宙》篇上向我们指出：东南西北上下四周的空间和无边无限的时间，便是宇宙了。宇宙的时间究竟于何时开始？于何时结束？至今人类没有答案。

从这篇《宇宙》一文中，我发觉周星光乡亲对宇宙的了解和认识，远比我们一般市民深而广。因为，周乡亲对地球、太阳、星星和月亮的‘走势’与之间的关系，能说出一番科学道理来。我想，宇宙既然是无限且广远的，我们就得用一代接一代的智慧去拥抱它和探究它。

王家丁乡亲又对我们说些什么呢？他说：“婚前婚后，是两个世纪，两个世界。婚礼是一座桥，是一座里程碑。那是一段历史的结束，和另一段历史的开始”。我想，如果读者们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必定会同意王家丁乡亲的说法。

从陈爱妹宗亲的《龙，象征吉祥》、《子孙的榜样》、《桂河桥游踪》等篇章中，使我知道泰国华人也是尊崇‘龙’，认为‘龙年’是带来吉祥，在泰国的艺术品和建筑造型，都爱刻上龙纹。在《子孙的榜样》一文，也给我们深一层地了解作者父亲的一生是非常勤奋和自乐，并叮咛孙儿们：“要节俭过细水长流的日子”。

我接着读他的随笔或散文：《中秋节》、《臆玫瑰花》、《悲秋》、《水仙花》和《拥有现在》及《时间》。我觉得王家丁乡亲的随笔内容写得蛮实在的，情感很真、很纯，是吐露心声；也是唤醒自己要努力向上。

从陈爱妹宗亲的《龙，象征吉祥》、《子孙的榜样》、《桂河桥游踪》等篇章中，使我知道泰国华人也是尊崇‘龙’，认为‘龙年’是带来吉祥，在泰国的艺术品和建筑造型，都爱刻上龙纹。在《子孙的榜样》一文，也给我们深一层地了解作者父亲的一生是非常勤奋和自乐，并叮咛孙儿们：“要节俭过细水长流的日子”。同时，反映了她家严的‘爱无言、爱无边’的教诲，‘给了子孙留下了勤俭持家的传家宝’。作者很坚实地描绘她严父的这副刻苦诚信的精神，也代表了海内外先贤的生前传统精神。

我没有游览泰国桂河桥的经验。然而，从陈爱妹宗亲的游踪中，她指出：它是由十多万人在日军的掌打脚踢和营养失调的情况下，为建造这条桂河铁桥付出生命。今日看来，桥的两岸即使山水美丽，作者但愿世人不会忘却兴建这条河桥的死难历史并且要珍惜和平。

陈爱妹宗亲也能写诗，她亲口告诉笔者，她没有机会念多少书；写文与作诗，都是靠自学的。且读她的短诗《醒悟》句：“瞻望优美的远山近水，告辞过往；让憔悴的心扬帆启航。……卸下包袱，轻松漫步在仪态万千的世外桃源”。由这诗行中，可反映诗作者与世无争；心胸豁达、宽放开怀。爱妹宗亲也搜集了些珍贵的海南民谣，像：《亲戚》：“婶嫂碗换碗，亲戚担换担；来来去去俩家败，不来不去不相知”。这则海南民谣，是吟出‘亲戚宜来往才有意义’。而《缺粮》这一则民谣：“奶奶煮饭稠浮浮，侬吃三碗不用箸，一到田坡肚饿去，目恍三巡不见牛”，是反映了农村村民当时欠缺谷粮而吃不饱，到了田地没力工作。今天，中国海南社会已大大改观，但我们能从泰国华侨的文集中，罗致到“海南民谣”，不能不说是多么珍贵的文化遗产呀！

“做为人总是顾家念乡的，没有哪一位不想与自己的亲人朋友一起享受团圆的幸福，解开思念的情怀……”。“过年了！游子想回家！”这是多么沉重的呼唤与声音呀！

从报章上知道，泰国在近年来不时遭遇水患；一度令曼谷快变成水国了。陈庶华乡亲写的《总理的眼泪》篇，正是描述泰国当前首任女总理英叻‘涉水访灾民，泪流满腮’。通过陈庶华这篇短文，令海内外华人对泰国华人族群以及泰国人民对泰国女总理的亲民和抗洪救灾的工作表示敬仰。深信海外世人都祈望泰国的地理环境能日益改善。

泰国的年长乡亲，无疑是从海南岛移民到泰国谋生而定居下来。陈安玲(亚妹)宗亲写的《过年了》，是吐露对原故乡的亲人的思念。在本篇文章这么写道：“做为人总是顾家念乡的，没有哪一位不想与自己的亲人朋友一起享受团圆的幸福，解开思念的情怀……”。“过年了！游子想回家！”这是多么沉重的呼唤与声音呀！

生活始终是不能停下脚步的。王家玉乡亲的《岁月催人》吐露了自己已步入‘中年’，并认为中年人已经过了“看透世事惊破胆”的阶段，这个见解其实是见仁见智的。但愿度过四十年头的海外乡亲，都能珍惜人生，真正开始认识人生而使人生过得更具实在和富有意义。

在泰国数十位男女海南乡亲作家当中，听称近期有三两位移居他处工作与生活。目前居住深圳的何良乡亲，他的《关于作家与做人》一文，是特别强调：作家对社会务必有〈社会使命〉和〈社会良知〉。并且不可忽视人文社会的自由情怀……。

从何良乡亲的表述中，可以察觉：作者(何良)是位具有正直个性并要求作家得达完美社会人格的写作人。他的见解和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愿我们所有乡亲的作家们，一起朝向〈良知〉使命而努力，好让有志成为作家者可为人生留下完好的句号。

在人文社会史上，作为一名华侨为宗祖国怀有高度情怀是难免的。在泰国海南作家群中的姚奇义乡亲，在他的《中国人的光荣》这一篇文章里，高度赞颂中国；如果从狭隘上来说，作者为宗祖国的科学进步感到欢欣与骄傲；从本质上说是不为过的。

若是从广义上来阐述，作者乃以〈亚洲人的智慧〉来看亚洲的中国在科学领域里；成功发射〈天宫一号〉，又在太空中顺利迎接〈神八〉！作者姚奇义乡亲强调：“这成功正是亚洲人的光荣和自豪”，我想：作者的这个见解不是狭隘的，而是具有宽阔豁达的胸怀。

我续读陈颖杜乡亲的《一鸣惊人》一文，它是赞许中国在世界各地区(包括泰国在内)已力办了无数孔子学院在当地社会积极推广汉语和中国儒家文化。

陈颖杜乡亲也批评中国某学者对孔子不敬的言论著作；他认为：这类书籍，“不读也罢”。可见，陈颖杜乡亲是非常敬仰孔子这位圣贤。泉

~待续~

乡亲情谊

文：陈爱妹(泰国)

——泰国海南文友联谊会成立十六周年怀思

天南地北
一字字一行行
众志成城
汇成文选十六册
谈何容易

行囊空空
前辈们登门造访
分分毫毫
侨领乡贤们慷慨解囊
聚沙成塔

十六个春秋
每册负责策划的主编
不辞劳苦的编委及作者
无求回报的付出
功不可没

耄耋文友
每接到徵稿通知
立即来电说要捐款
他们为出版文集奉献的精神
难能可贵

文集的诗词善美
小说 逼真
散文 游记 小品以及各类文章
绽放出多彩多姿的
文学之花

文友会工作的乐趣来自乡谊的倾诉
文集的成功出版与分发
心中有了写作的渴望
友谊就随心启航
梦想才会绵长

长江后浪推前浪
青出于蓝胜于蓝
为传承中华文化
为海南人争光
继续加油

创办文友会的前辈们
跨过困顿的征途
树起薪传文化的旗帜
部分前辈虽已别离　但
他们的文人风范千古流芳

为了《海南文友作品选集》
以文会友笔耕十六载
爱护支持文友会的
侨领乡贤和众位写作文友
您们辛苦了。

2013年11月5日完成

梁文福《新加坡派》：族群与国家的建构

文：汪来昇、黄韵仪 、陈文慧

引言：诗或词配乐吟唱，自古已然。由《诗经》至《唐诗宋词》，早已屡见不鲜。现代华语歌词，依然由文字所组成，要求其精简、意象突出，更近于写(现代)诗。[1]既然现代华语歌词承袭了以(汉)文字作为载体，大体而言是能够被当作文本来解读。而这个“阅读”过程，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下，配合读者所处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就能产生一种特定的意义。[2]而新谣作为新加坡独特的文化与社会现象，收录了80年代国人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探索。梁文福作为新谣时期的代表作家，影响力甚远，深受官方与民间的认同。本文将透过梁文福新谣专辑《新加坡派》，试论新加坡族群与国家的建构。

一、 新谣

i. 源头：诗乐与台湾校园民歌

源头(一)：大学校园内的诗乐活动。[3]1978年到1981年，南洋大学学生进行了一连串的“诗乐”运动。诗乐即指“将新诗谱曲”，并以“不论风格，我们唱我们的歌”为基本理念；其“场景非常校园，情节颇为学生”。[4]1978年，南大诗社在文学院举办了一场“诗乐”，发表的一些歌曲甚至成为新加坡校园内的“名歌”。[5]

源头(二)：1980年代初期，台湾校园民歌的出现。其参与者（青年学子）远胜70年代，且“借由歌曲表达心声”的特色上，增加了“在歌曲中表达对社会的批判”的特征。[6]这股校园民歌风亦吹来了新马。[7]

随着诗乐会员们“初出社会，个人事业待展，(经)一番沉思，决定由“动”转“静”，专心于文学刊物《同温层》季刊及《同温层业书》的出版”，“诗乐沉默了”。[8]本来弹唱着台湾民歌、香港粤语歌，60、70年代美国民谣，还听起日文歌的新加坡青年学子在此时，也不禁开始思考“我们的歌在哪里？难道就永远唱些别人唱过的歌吗？”。

ii. 本土化初探：我们的歌在哪里？

80年代初，新加坡青年，尤其工艺与初级学院的学生纷纷组成小组。[9] 随之，各学府学生开始唱起“新谣”。据“地下铁小组”的刘瑞政，“在裕廊初级学院就读高一时，(巫)启贤、(陈)佳明、(许)裕福、(黄)謴赧和我在校内的各种比赛及活动中开始认识”，并且决定组织起来唱歌。他也表示，当启贤(1982)创作了第一首歌曲《梦湖》，才开始发现我们也可以创作自己的歌曲，这便激发了其他成员的创作与发表欲。[10]

随着1983年初黄謴赧与巫启贤写的《邂逅》成为了众人的焦点，许多报馆、传媒与文化团体纷纷举办有关歌曲创作的座谈会。[11]“新谣”一词

则于1982年9月4日《南洋商报》副刊《南洋学生》主催的“我们唱着的歌”座谈会上被最早被提出。经过讨论，水草三重唱的许环良、和风小组的颜黎明、《南洋学生》通讯员陈健良等众出席者决定从创作者身份的角度为新谣定位，同意以“新加坡年轻人创作的歌谣”为“新谣”的广义，而往后“新谣”的缩写也一直被普遍沿用。[12]于是他们为“属于自己的歌曲”定了一个名份。[13]

iii. 新谣：走出国门

1983年，“鱼尾狮小组”开始附属于金文泰联络所，把发展空间延伸至民间，成为第一支附属联络所的新谣小组。至1986年，由联络所成立的新谣小组已达30多个。而“新谣俱乐部”也为联系这些小组而产生。在全国职工总会的推动下，新谣也与社会不同领域的民众感情结合。[14]

80年代中期至尾声，开始有不少新谣创作被海外歌手选唱，成为走出国界，向外传播的本地歌曲。随之，新谣逐渐得到港台乐坛所认同，唱片公司、唱片制作人或海外歌手直接向新加坡创作人邀约写歌。有鉴于此，新谣开始走向大众商业化。而到了1990年左右，新谣的界定原则也只剩下新加坡国籍的定义，只要是新加坡人写的歌皆被称为新谣。[15]

iv. 新谣：意义与身份认同

然而，新谣在新加坡音乐史上，意义与成就超然。其不仅奠下了新加坡自创歌曲的基础，更承载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16]据江莉莉博士，新谣之所以广受年轻人欢迎，与当时新加坡新生代的身份认同有关。不仅是新谣的创作者，连新谣的听众也在塑造自身的文化，通过歌词内容和活动的参与，建构了新加坡年轻华语族群的认同意识、新加坡华人、新加坡人等，不同层次的身份认同。[17]

二、《新加坡派》是“歌史”？

新谣作为本土创作，大量撰写了新加坡的族群与国家于歌词之中，从而体现出作家的不同想望。游俊豪认为，华文作家(本文包括词人)有三种想望：文学、族群与国家。[18]任何华文作家基本要有文学想望；至于族群与国家想望则因人而异。

梁文福专辑名称为《新加坡派》，已吐露了他是有意图书写他对于国家与族群的想望。美国威斯康大学的周策纵教授认为，唐诗中杜甫的既诗有 ‘诗史’之称，那么梁文福的〈新加坡派〉也能被称作是 (新加坡) ‘歌史’。[19]

李元瑾对国家与族群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梳理，认为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20]按照这个说法，梁文福身处在新加坡国家与族群的框架里，他不免通过阅读、想象和记忆，重新整理与展现他对于国家的一种想象和想望。[21]梁文福的〈新加坡派〉这首歌，对读者或听众所处的环境及其意识形态，尤其是接触或生活于歌词中所描述的60-90年代，更能产生想象与意义。

以下透过梁文福《新加坡派》专辑里的四首作品〈新加坡派〉、〈老张的三个女儿〉〈紫竹吹新调〉与〈麻雀衔竹枝〉，试图整理出作者作品里展现的族群与国家想望。

三、作品试析

i. 〈新加坡派〉[22]：国家认同

如果〈新加坡派〉被誉为是“歌史”，其必然记载了新加坡历史。然而，〈新加坡派〉并不是一味的符合官方对于历史的论述。王德威教授认为，梁文福更多是要建构一种庶民对于国家的想象。[23]梁文福在〈新加坡派〉的歌词中提到了“裕廊烟囱”(Jurong Industrial Park) 和“地铁”(Mass Rapid Transit) 分别在70和80年代的建设，巧妙地结合了他个人作为庶民的成长经验，以逗趣幽默的方式书写新加坡发展史。

〈新加坡派〉歌词中对于新加坡变迁中的文化，及其符号更感兴趣。歌词中大量运用互文 (intertextuality) 和典故 (allusion) 来勾勒出国人的集体记忆。例如，歌词选用了“林青霞的电影最卖”、“凤飞飞的抒情歌曲”，甚至台湾群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作为隐喻台湾娱乐文化自70-80年代的蓬勃发展，对世界华人圈子的影响，包括新加坡。此外，新加坡自80年代以来，为了吸引外资，不断与欧美建立邦交。这也使西方文化，在新加坡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梁文福歌词里安排“别人将苹果派都送过来”，以“苹果派”作为隐喻西方的文化符号。歌词里也出现了Michael Jackson “We are the World” 以及Stevie Wonders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比较轻松的大众文化。这对于庶民的想象与回忆，比正史的力量更有号召力。

歌词中阐述了国人在建国时期充满的不确定和忧虑感，说60年代“还有人移民海外”，反衬了90年代国人历经努力后，繁荣的新加坡“别人纷纷移民前来”的自豪感。再来，梁文福透过国产亚运会金牌得主 (1978) “孙宝玲赢了一串金牌回来 / 我一夜兴奋难捺”、“没人相信新加坡牌”所以要“创造新加坡派 ”、还有“大家都忽然要向自己交代 / 将新谣唱起来 ”，足以看出梁文福歌词里的爱国意识和对于一个新兴国家的憧憬。歌词中的最后一句“I LIKE IT SINGAPORE PIE / 我最爱新加坡派 ”更高度地总结作者对新加坡本位意识的确认。

ii. 〈老张的三个女儿〉[24]：文化纠结

〈老张的三个女儿〉透过老张与三个女儿的对话，叙述新加坡新旧两代的隔阂，吐露出对于华族文化的焦虑感。歌词的开场口白回环复问，老张的三个女儿“在家吗？”，而菲佣皆不耐烦以英文回答“不在家”，预示三个女儿拒绝接纳华族文化的情景。歌词里出现的另一位女性是张妈妈，作为传统华族女性的代表。作者借此与三个逐渐西化的女儿进行对比，新加坡社会随着西方文化入侵，华族文化逐渐逝去的悲凉局面。

大女儿张纯华作为高学历知识分子，具有迟婚、男女平等现代观念，与老张的传统婚姻观有明显分歧；明显是个女性主义 (Feminism) 者[25]。80年代女性主义传入新加坡，得到新一代女性支持，追求与男性公平竞争与平行的机会，华族的传统婚姻观受到了冲击。

二女儿张巧花是位享乐主义 (Hedonism) 者[26]。她崇尚物质与生活享受，认为“没享受过就出嫁”的妈妈是可怜的女人。她不断强调“青春握在手里 / 我要尽情享受它”。自认“坏女孩“也有她的代价，然而顽固的爸爸却无法认同她。这种西方价值观与华族所强调的辛勤耕耘，先苦后甜之说，形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巧妙运用谐音，唱出三女儿的英文名字珍妮花 (Jennifer)，和姐姐们对比，展现出更浓厚的西方价值观。她认为“我学校功课为你考得顶呱呱，你 (爸爸) 得让我去玩耍”，这里突显了国人在80年代经济转型后，逐渐进入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27]社会。如电话的普及化、快餐业迅速崛起和双语政策等都是新加坡社会的变迁与整合所导致。

〈老张的三个女儿〉里再现了新旧两代间，存在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文化鸿沟，构成第一种文化纠结的族群想望。

iii. 〈紫竹吹新调〉[28]：民族文化情怀

〈紫竹吹新调〉改编自上海沪剧曲牌《紫竹调》。[29]自古竹子作为中国士大夫理想人格的精神符号，象征着华族文化不随意弯腰，正面及志气的价值。[30]作者借由这首耳熟能详的中国民谣抒发自身，对于新加坡的民族文化情怀。“吹箫的人已走了 / 紫竹调已渐渐吹成岁月的笑”隐喻着以往“吹箫的人”华族文化已不在，而昔日那“紫竹调”经不起岁月的侵袭，变成岁月的笑。歌词的“笑”可理解为淡然的笑、一笑置之或取笑之意。作者把厚望给予下一代，希望新生代能继承紫竹树的志气、耿直、不曲不拗，任由这“西风”吹不动摇。

梁文福以抒情手法，缅怀逝去的民族文化，试图唤起国人 (华族) 的族群想望。

iv. 〈麻雀衔竹枝〉[31]：国族身份认同

〈麻雀衔竹枝〉源自广东儿歌，作者改编后以广东话、福建话和华语重新诠释歌曲作为文化传承。作者回忆80年代，因歌曲出现两句广东歌词和一句福建歌词而遭禁播，不见天日。[32]执政者1979年推崇“讲华语运动”[33]，使方言遭受严重打压。作者认为这首广东歌谣承载了家族三代人的记忆，说：“我的爷爷在中国学唱，后来南来成为第一代南洋华人，他教我爸爸，我爸爸在新加坡出世，小时候住在海山街，是第二代华人。”[34]

歌词里出现的新加坡古早符号，如：海山街[35]、Tekka[36]、女皇镇和四马路等，建构新加坡的成长与记忆，记载新加坡人的共同记忆。透过记录时光流逝后的新加坡，作者产生以新加坡为本位的乡愁。歌曲最后：“小小麻雀衔竹枝/都系衔番屋企好得多”透露了作者对于新加坡的国族身份认同，无论小麻雀飞多远，还是觉得自己的家(新加坡)最好。因而“最后我在歌曲里安排给小麻雀的结局是回家。人应该有自己的根，有自己的家。生命有归宿，对我来说我很早已经认定了。我有自己的国，自己的家。”[37]

四、小结

梁文福在80年代的时代意义里，取代了老一辈新华作家发出的“中国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的声音”。这一股声音更贴近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与新加坡几十年来建国历史息息相关。[38]新谣与《新加坡派》在时代契机里，成为新加坡历史的见证者、叙述者、(文学)建构者与参与者，从庶民的视角参与了国家与民族的建构。21世纪的新加坡，或许仍在等待着另一个时代契机，继续谱写国家与族群的历史曲子，延续与传承新谣的精神。泉

演讲

王德威 (演讲)《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的经验：十个关键词》于2012年10月28日《传承文化 作育英才：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

网页

梁文福《重逢》演唱会，2004; http://www.tcrmusic.com/xinyao/34.html(见于18/11/2012)

参考资料:

书目

[1] 陈清侨 主编《感情的实践: 香港流行歌词研究》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页1

[2] 柯思仁、陈乐《文学批评关键词: 概念·理论·中文文本解读》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中心、八方创作室, 2008; 页33

[3] 梁文福 主编《新谣: 我们的歌在这里》新加坡: 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出版, 2004; 页4

[4] 同上; 页5

[5] 颜如艳、杨金峯著《梁文福歌词作品中的文化情结与新加坡社会现象》台湾东南亚学刊, 6卷2期, 台湾: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2009; 页 48-49

[6] 同上; 页49

[7] 同上; 页43

[8] 同上; 页49

[9] 同上; 页49-50

[10] 梁文福主编《新谣: 我们的歌在这里》; 页26-27

[11] 颜如艳、杨金峯著《梁文福歌词作品中的文化情结与新加坡社会现象》; 页50

[12] 梁文福主编《新谣: 我们的歌在这里》; 页26

[13] 颜如艳、杨金峯著《梁文福歌词作品中的文化情结与新加坡社会现象》; 页50

[14] 梁文福主编《新谣: 我们的歌在这里》; 页29

[15] 同上; 页70

[16] 同上; 页73

[17] 同上; 页113、114

[18] 游俊豪〈族群与国家: 20世纪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 见李元瑾 主编 《新马印华人: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2006; 页180-181

[19] 韩劳达 主编《写一首歌给你: 梁文福词曲精选》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04; 页89

[20] 李元瑾〈导论: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新、马、印华人三种模式〉, 见李元瑾 主编 《新马印华人: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2006; 页1

[21] 安德逊〈想象的共同体〉, 见廖炳惠《关键词200》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11; 页138

[22] 见〈新加坡派〉歌词

[23] 王德威 (演讲)《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的经验: 十个关键词》 于2012年10月28日 《传承文化 作育英才: 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 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

[24] 见〈老张的三个女儿〉歌词

[25] 胡月宝〈新加坡女性和女性主义〉, 见荒林主编《中国女性主义5》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页151

[26] 宋明顺《新加坡青年的意识结构》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1980; 页4-5

[27] 同上; 页6-7

[28] 见〈紫竹吹新调〉 歌词

[29] 姜彬《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页919

[30] 例如: 郑板桥、晁补之、苏轼 等

[31] 见〈麻雀衔竹枝〉 歌词

[32] 梁文福《重逢》演唱会, 2004; http://www.tcrmusic.com/xinyao/34.html 见于18/11/2012

[33] 周清海《变动中的语言》新加坡: 玲子传媒, 2009; 页156-165

[34] 梁文福《重逢》演唱会, 2004; http://www.tcrmusic.com/xinyao/34.html (见于18/11/2012)

[35] 今克罗士街上段 (Upper Cross Street)

[36] 旧竹脚医院

[37] 梁文福《重逢》演唱会

[38] 王德威 (演讲)

Annex A

《新加坡派》

作词: 梁文福　作曲: 梁文福

爸爸说我出世在六十年代
一岁多国家才算诞生出来
那时候没人相信新加坡牌
还有人移民海外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how much I care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让我们期待，我们虔诚的祈祷

一晃眼已经来到九十年代
爸爸你再唱一遍往日情怀
我们的故事我们自己记载
未来就看下一代

旧家的戏院建在六十年代
我钻在人群里看明星剪彩
那时候粤语片是一片黑白
有些来新加坡拍

当我们不觉到了八十年代
地铁将这个传奇讲得更快
大家都忽然要向自己交代
将新谣唱起来

别人将苹果派都送过来
我们也可以创造新加坡派
现在是别人纷纷移民前来
谁不爱新加坡牌

渐渐地我们进入七十年代
一穿上校服我就神气起来
裕廊镇烟囱个个有气派
比我长高得更快

我们已搬家住得舒服自在
旧戏院变成教堂做礼拜
有时我独自回到旧地感怀
惦记那昔日小孩

I like it Singapore pie
我最爱新加坡派

那时候林青霞的电影最卖
凤飞飞抒情歌曲全班都爱
孙宝玲赢了一串金牌回来
我一夜兴奋难捺

朋友们说我越活越不赖
像岛国一样实在
到底是它给了我胸怀
还是我给了它爱

Annex B

《老张的三个女儿》

作词：梁文福　作曲：梁文福

男声：老张的大女儿在家吗?
女声：She is not in.
男声：老张的二女儿在家吗?
女声：Also not in!
男生：老张的三女儿在家吗?
女声：All not in!

老张的大女儿叫张纯华
是张家硕士花
研究社会学的专家
虽然戴着一副眼镜模样还不差
可是不爱化妆不爱跳舞也不多话

老张的纯华已经二十八
还不想要出嫁
提起电脑媒人她就怕
也不是没有男士给她送过鲜花
可是等到现在还没一个骑着白马

嘟嘟嘟踧踧踧她说爸爸爸爸
我真的是没有辨法
你叫所有阿姨姑妈不要再麻烦啦
总得要让我等到一个满意的他
我才愿意披婚纱

嘟嘟嘟踧踧她说爸爸爸爸
你也不要太过牵挂
我这单身贵族讲究的是高级文化
有钱的他又不懂一点莎士比亚
没钱难道我贴给他?

老张的二女儿叫张巧花
果然眉目如画
只是眉毛有点日本化
她认识书本书本从来不认识她
中三读到一半自己就放老师的假

她二十出头男友换过一打
最喜欢染头发
人称工厂新潮一朵花
蝉联迪士高公主周末飞车少不了她
老爸说她一句　她就暂时离家

嘟嘟嘟踧踧她说爸爸爸爸
我真的是没有辨法
青春握在手里我总得要享受它
我不要学习我们可怜的妈妈
没享受过就出嫁

嘟嘟嘟踧踧她说爸爸爸爸
你也不要太过牵挂
反正我也不是淑女何必太过优雅
坏女孩也有她的付出和代价
现在我很快乐嘛

对着家中三朵花
就想起她们的妈妈
她勤俭又持家
吃苦又不多话
怎么没有一个像她?

老张的小女儿叫珍妮花 (Jennifer)
才不过十七八
就已经决定嫁给电话
她从小就跟快餐族们一起长大
谈的初恋就像雪糕圣代易溶易化

她除了校服就没裙子啦
喜欢穿牛仔裤嘛
露营爱去圣淘沙
她华语英语都可用来和人吵架
可是写起文章就头痛咬着指甲

嘟嘟嘟踧踧她说爸爸爸爸
我真的是没有辨法
我们新的一代总有自己的想法
我学校功课为你考得顶呱呱
你得让我去玩耍

嘟嘟嘟踧踧她说爸爸爸爸
你也不要太过牵挂
我觉得我还可以风花雪月一下
我们的社会太平将会更优雅
你还啰嗦什么嘛?

Annex C

《紫竹吹新调》

作词：梁文福　作曲：梁文福
唱：梁文福、黄德赧、赖向华

吹起你熟悉的紫竹调
一首紫色的旧童谣
吹一条瘦瘦的记忆的路迢遥
一管往日的梦缥缈
昨日的管箫还完好
吹箫的人已走了
紫竹调已渐渐吹成岁月的笑
像风吹过竹林梢

好一根紫竹直苗苗
送给宝宝作管箫
管箫要耐心才吹得好
就像紫竹慢慢长高
做人要学那竹树志气高
耿直又不曲不拗
宝宝你要继承紫竹性格骨子里傲
任西风吹不动摇

Annex D

《麻雀街竹枝》

作词：梁文福　作曲：梁文福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阿爹系海山街住过 (广东)
1941年轰炸机经过
一枚炸弹在街头降落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阿妈在Tekka生我 (广东)
虽然那时霸王车很多
她却依然骑单车去工作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的童年在女皇镇过
一房半厅的组屋背后
小小的林子里
曾经是孩子们的窝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的小学从前在小坡
平时不读书考试之前
跑到四马路前的庙前
说声哦阿弥陀佛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们都曾一无所有过
现在拥有的不算什么
但是比别人珍惜得多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表兄金山回来啰(福建)
小小麻雀街竹枝
都系街番屋企好得多

《蝉声处处》的陈忆

文：莫河

新华海南籍写作人之中，持续顽强的作家，并不多见。

打从七十年代末，我常在《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以及马、新的期刊杂志上，见过与读过陈忆的作品。

七十年代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展望》、《新加坡文艺》、《学生文艺》等期刊，也都有读到昌忆的文艺作品。追溯五十年代中，在马来西亚发行的《教与学》月刊，也有发表他的小说是参加创作比赛而获得优异奖的作品。倘若我没有记错，在那个年代，他创作的文艺作品最多，并引起了文坛与读者的垂注。

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彼此认识了。不知是谁牵引的线，但这并不重要。也许是我们都喜爱写散文，在尚未认识前，彼此都慕名了。

在模糊的记忆里，是海南省作家朱逸辉来新时，大家在佘街的海南青年会一起拍过纪念照。直到1991年，海南会馆的“海南文学会”成立时，我们又有相聚的机会。

陈忆原名是陈昌忆，于1944年出生在马来亚的丁加奴州的甘码挽，五岁时随父母回返海南岛，并在海南岛接受小学教育。难怪他一年半载常回乡下，寻觅乡居生活的脚迹。乡情对他是欢愉的，美丽的。

祖籍海南省文昌县蓬莱镇朝塘村的陈忆，于六十年代在中正中学受到华文老师刘瑜(莽特)的栽培与鼓励，渐渐走上文学的道路。

驰名作家莽特在中正中学任教期间，孕育了不少学生成为新华著名作家。当中包括知名诗人杜红和杂文家陈凡等。可惜的是，莽特已于1986年12月3日去世。

昌忆的处女著《蝉声处处》是他于1996年将报刊与杂志上发表的28篇散文，收录成书并取名：《蝉声处处》。这些散文令人追回当代许多生活陈迹。

我特别偏爱昌忆的散文，尤其是集子中的《蓝天下的欢笑》、《风铃声里》、《窗外》、《昙花的故事》、《秋之画》、《蝉声处处》以及《昨夜高楼伴雨眠》等。

我在序文里这么说道：“散文创作，需要抒真情，说真话。……散文不仅是个人抒情之作，也是反映时代与生活的侧影，有感而发，有物可描，有情可咏作。”

陈忆的散文，是心灵内心世界赤裸裸的解剖，不卖弄技巧文字，老老实实地把创伤、不平与欢欣，逐一描绘出来。同时把内心的积郁统统发泄得干干净净，切切实实地陈述，抚今追昔。给

我们带来诸多真美真实的画面，这就是陈忆可贵的散文风骨。

对艺术具有多边的兴趣

陈忆他在教育界服务了三十多年，除了繁琐的教学生活，剩余的时间除了执笔创作之外，还参与话剧团与合唱团的活动。近日又多参与乡团的文教活动，生活算是多姿多彩。

在1989年的戏剧节，他参加了新加坡艺联剧团公演“家”的演出，1991年方氏总会四月集锦《笑浪·泪花·人儿心酸》的演出，2003年育英校友会与新山歌乐协会联办《黄河大合唱歌舞晚会》的大会司仪及曲首朗诵员等等文娱活动，是位能写能演，又能唱的多面手，生活阅历非常丰富的作家。

今年较少执笔

新华文坛近二十年来，耕耘的园圃并不欠缺，但很多资深的作家似乎封笔了。坚持写作的作家是非常的少，除了中了文艺“毒瘾”的作者之外。希望昌忆继续握紧笔杆或按键，让文坛更加生气起来。

七十和八十年代，经常见他以静森、野雁、香谛、陈忆、陈思等笔名，在不同的文艺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

作品曾收集在许多文选中。陈忆偶尔以陈逸或其他笔名，在《锡山文艺》和《新加坡文艺》发表诗文而受到垂询。

海南籍族群作家，不是每个人对文化传统都热心和积极投入，甚至是以“冷漠”的心态避而远之。然而也有颇多作者在冰块里加热，精神可敬。

像陈忆，他一路来对文化的关注、拥护是不在话下。他的积极表现是我最为羡佩的。

我写陈忆是想给他些点点热能，唤起他重新振作，为读者多写些触动心弦的散文，更期望他第二本新书能在不久的未来可与读者见面。

去年尾，在风雨交加的一天，在一个文学活动的场合，昌忆带来海南省学者林明仁著的《文昌华侨文化》一书给我，本书记载了一段有关我从事文化工作的报导，在冷风大雨季节里，正烫热我被风雨吹冻的心。

写于2012年12月16日

海南族群问答

文：三弓

问：海南岛(海南省)是中国第几大岛？今日全省的人口约有多少？

答：它是中国第二大岛。全省目前拥有800万人口。

问：海南岛(海南省)有哪些历史名胜地？

答：有，海口市的五公祠、东坡书院、海瑞碑墓；万宁县有：东山岭、潮音寺、净土寺等古建筑；三亚市有：大东海海滩及鹿回头风景区；其最南端的“天涯海角”海滩为中外闻名。

问：〈海南〉这名称最早出现于哪个时期？前后有几个称谓？

答：海南这称谓最早出现于中国南北朝。它的前后称谓有：琼州、琼管、琼台、琼崖。较后(唐宋以后)便一直称之海南岛并稳定下来。

问：在海南最早开讲中原文化的教化工作是谁？

答：是唐代学贯经术的官吏：王一方。

问：海南自何时何人开始建立文教制度？

答：于宋代宋太祖开始，海南建立中原文化传扬制度；特别重视文教与科试。

问：海南最早期的官学有哪三所？

答：海南最早的三所官学是：琼州州学、琼州小学、东坡书院。后来也设有私人书馆。

问：海南人的先祖大抵来自哪一方？今日可查考的入琼始祖姓氏有几个？

答：海南人先祖大多数来自福建省莆田县。今日入琼始祖可查考的姓氏共有103个。当中陈姓是文昌县分布最广的姓氏。

问：近代中国海南名人有谁？请统述三名。

答：1903年出生于琼山县的冯白驹。他曾任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曾获中国政府颁赐一级勋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将领之一。1866年出生于文昌县的宋耀如，曾扮演革命者角色。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父亲”的称号。一家培育了“三子三女”的名人。1900年出生于琼海县的周士第。他曾任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兼成都市市长。

问：海南人眼中称誉的“五公”是指何人？

答：是指被政敌贬到海南琼山县的宰相李德裕；也曾当过宰相而被流放在万宁的李纲；当过两度宰相而被贬到琼州的赵鼎以及曾任副宰相的李光与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这‘五公’都分别死于海南宝岛。如今的“五公祠”就是纪念这五公了。

周树生大师父

着手推展 海南武术与中华武术 并驾齐驱的时候

文：川强·讯

林鸿龙主席(右)颁赠纪念品给王博士

在新加坡诸多武术团体当中，“光武国术团”是唯一属海南武术团体。它正在走入第七十八个年头。“光武”的光阴岁月虽然不短，但在推动海南武术运动或中华武术这方面，自海南武术师傅先后作古和政府征用樟宜会址以后，设班教导与练习海南武术的活动经中断近三十年了。2013年11月10日星期天下午二时，“光武”藉年庆之际，特假新加坡海南会馆礼堂举办：“海南武术与中华文化”讲座正是掀起海南社会回忆起：新加坡在独立前；海南武术在几个海南村庄里，是扬起阵阵学习海南拳的热浪。

光武国术团当天的讲座邀请哪三位武坛人士到场讲演呢？原来其中一名是教育界与文学界知名人士：王永炳博士。哦，王博士早在五十年代曾向海南武术承传人冯安邦师傅习武。今天虽然没有继续练武，但，王博士指出：当年他练“马步”的功力尚在。

王博士以回忆的口吻称：自己虽然只学了三年的海南拳，但每次练功站马时，师傅要习武者至少“烧掉多支香”为准；如果意志不坚者，自然难于接受站马的训练。

王博士称：学习海南拳和其他拳术一样，每当开始练拳，首先要学“抱拳礼仪”以示与各宗派兄弟情谊。在三年的习武中，使他练就了坚而忍的志气。自然也不会以武去凌欺弱势者。王博士强调：不论学习哪一宗派武术，都能使习武者健身；更能助习武者培养生活纪律和友爱与互助的美德。

应邀到场讲解“中华传统武术”是周树生大师。周师傅今年74岁但精神奕奕，声量充沛；行步走马稳健扎实，不愧是个老武者。

周大师傅原籍是广东南海人，非海南人也。周师傅向听众与晚辈指出：今天或明天习武者，都不宜抱有“以武凌人” 的想法。周师傅强调：习武或练武的正确目标是：健身与防身。再深入一点看，就是自己练有了武艺；除了具备防卫之技而壮胆之外，修身与净化自己的内心也是习武练艺给生活发挥了个人实在的效用。周大师自13岁开始练武，一身回绕了“南拳北腿”。因此，使他活到今年七十四岁仍健步如飞。周师傅还在台示范自己的 立马功力和手腕的力度。

> **“海南拳的特色究竟在哪一点？李秀副教授很明确地说明：海南拳一向是重视实用，艺法多变；但腰马务必扎实稳健。这和王永炳博士在当时练习海南拳的情景吻合。”**

说到中华传统武术的历史，周大师指出：据他知道是从青铜时代就有：“谋生之艺”了。在师傅自己的了解中，它自唐宋时代兴起；于明清时期进入完善。师傅说：为配合生活环境的新改变，武艺自然结合了多元社会元素；不只同中医学和社会科学也相联系和挂钩起来。后来更包括了同生物学、工程学以及古代易经等等的思维；结合出各种武艺技巧，诚如：鹰爪拳、达摩拳……纷纷呈现不同的武功招式，适合不同年龄层人士学习。

周大师傅称：他这一生以来结识了来自不同区域的武术高手。当中包括海南武术界的同道。师傅说：近十八年来，他似乎每年都到海南一趟同多元武术友好交流。他希望新加坡再掀起学习海南拳的热潮。

来自海南大学体育部李秀副教授向大家指出：海南拳其实是地方拳种之一。因此可以说：学习或推广海南拳，便是发扬传统海南文化。

李秀副教授更指出：海南拳是融合广东、广西、福建等等的洪拳、蔡家拳、莫家拳、儒拳以及五行拳等拳术的影响和揉合而成并流行于海南武术文化之中。

海南拳的特色究竟在哪一点？李秀副教授很明确地说明：海南拳一向是重视实用，艺法多变；但腰马务必扎实稳健。这和王永炳博士在当时练习海南拳的情景吻合。

李秀副教授也指出：在进行练习海南拳时常常使用的兵器，像长棍、叉粑和板凳等等。王博士亲身练习海南拳时，也一样使用长棍等兵器。王永炳博士在讲述时有做了小小的手腕力的示范，这印证了李秀副教授称：在拳术气势上是表现刚烈和勇猛的。

说到海南拳在中国武术界是有一定的影响，李秀副教授称：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有两位海南乡亲：庞熙建和黄上兴，曾代表海南区参加广东省武术观摩邀请赛荣获金奖。还有一位海南乡亲：林强，他曾于1978年，代表海南昌江县参加海南行政区第一届武术比赛；也在激烈的争夺中夺冠。

谈到新加坡光武国术团如何重新推动海南拳或中华武术呢？这是“光武”今日首要的任务。个人想：“光武”只有会所，没有场地；要怎样展开练武班级呢？可行的办法之一，便是在“座谈会”之后，积极同海南华社开办的：公立培群小学及育英中学讨论如何联办武术班的探讨工作；接着“如何找钱”邀请海南省武术高手前来任教。新加坡当前还有海南拳师傅吗？我是不甚清楚。

对于李秀副教授在讲演中；建议：新加坡光武国术团设立 该团史料展览馆，虽然意义非常好，如何去做呢？谁去做呢？不妨领导人在理事会会议上做进一步探讨。

当天下午的“海南武术文化”的讲座会是成功的。美中不足是主持人欠缺经验，没有提供听众发言交流。因为，在座的有许多老者，可能是当年的练武者。可以藉此交流机会，让老者向“光武”提出宝贵的意见。

今天，“光武”的楼梯重响了，看看今后“光武”有没有新动向，这才是今日座谈会的最终新目标。泉

周树生大师父

李秀副教授

通过艺术与设计看事物的普世方法

A Universal Way of seeing through Art and Design

文：王汉逸 By Roy Wang Han Yi • E: roy@factory1611.com • W: www.factory1611.com

我们如何看这世界的有形物和无形物构成了我们对生活细节的看法和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强大的外来影响力将会对我们固有对个人、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看法产生冲击。这就对于寻根和认识自己越来越有关联。我是受华族传统思想影响和在亚洲格局下拚弃外来理想下写这篇文章，我的原意是要叩问和探讨华族美学价值观融入全球文化的地位与可能性，从而引发从新加坡的格局通过艺术和设计来看事物的普世方法。

首先让我阐明我对艺术和设计的看法。对我来说，艺术是描述与表达某种经验，而设计则是要传达一个信息。好的艺术吸收好的设计原理，而好的设计可用强烈的艺术语言来表达。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我相信艺术和设计是普世表达最基本的方式，据此界定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即观看事物的方法；我们把世界看成有形的方法以及把一物体看成无形的方法。

用西方普遍理想作出发点来谈。让我们首先审阅马劳士(Malraux)的一段话，他说：“西方用科学的客观方法看事物，艺术史以及它的原始目标、符合透视学的绘画等都是西方文化的一部份，而它们在历史渊源和认知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当人们企图用这一套去观察其他事物时，谬误便会产生。”住在新加坡，我们不时要创发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我们采取高姿态接纳西方思维和概念为建国手段。同样地，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视觉美学是受西方思想所影响，归根究底即是以西方观点看事物。然而，基本上我们毕竟是个亚洲社会。从我本身具备的华族传统价值观出发，我不时要面对我身边所看到和经历过的美学语言不同的诠释。我3岁便学纯西洋美术诸如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最近我从事平面设计工作。我觉察到新加坡社会已习惯在一些西方设计和美学模型里缺乏华族元素的事实。这种现存的对事物的看法能否允许在社会上的人彻底洞察他们所看到事物的深度和广度，抑或因为对世界看法的不同而遗漏一大部份呢？再引用马劳士，他说：“这好比爪哇人评述街戏和电视，两者有截然不同的原则。”当某种对事物的看法在外国社会行之有效，是否能全盘不动搬到另一社会配套呢？

要找出这个分岐的根源，也许首先应检视人类和社会操作的基本体制。政治是一种划清界线、特征、自由、空间与美学的体制；它的存在基本上不但是治理社会，亦是管辖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体制。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耶俅朗舍(Jacques Ranciere)诠释政治时认为“它暗中把参与者和局外人分开，因此便能预置美学分水岭于可见和不可见、可听和不可听以及可说和不可说之间。”政治的领域，正和艺术与设计的领域一样难解难分，因为它们都具有可能影响思维的共同理由。

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亚洲经历了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是因为全球化的结果，世界的重心整个向西半球倾斜之故。新加坡是其中一个国家，源于西方民主制度。它经历了英殖民统治与对外开放的影响，可说是个受西方观点影响最深的亚洲社会。继续审视此论述有必要参阅历史上同样的论述。

特别是中国，多年来经历了文化和社会动乱。著名的五四运动与类似的运动，都触及核心课题，普遍的诉求是传统的观点必须重新审定以及为了要国家富强必须优先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科技、文化遗产等。虽然如此，强势的政治领袖或个人如孙中山曾经辩说欧洲的政治模式与思想或许缺乏亚洲社会与哲学固有的价值观和概念；而西方的价值观诸如着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和亚洲社会格格不入，这就导至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概念的产生。

“泛亚洲主义概念在冷战时期靠边站。”罗德洛(Lothrop)语。但某些国家如印度、柬浦寨和印尼创导与亚洲内外发展中国家加强连系，而其他的国家则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向其中一个超级强国靠拢。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创导新加坡社会应有亚洲价值观的概念而有所复苏。这种泛亚洲主义涵盖一套特殊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反映该区域的文化和历史，创造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以融合国家内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的国民。同时也是建立一种思想，实际上是以自己而不是西方观点来看问题，有别于传统的观点和自由民主主义。

因而，这里的问题是：是否有普世看事物的方法？人们是否可以将传统资产当为优势来融合全球化和固有之间不同观点？在今天的社会或未来的社会是否真的需要一套普世看事物的方法？对于现存制度的质疑并非藐视，而是出自热忱，希望基于个人和外来以及西方价值观构成新一代视觉语言以迈向视觉现代化。

(本馆2013年大学组奖助学金得奖者)

Likewise,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how our visual aesthetics are too influenced by western ideas, and fundamentally, the western way of seeing.

How we see the tangibles and the intangibles of this world constitutes the way of seeing, influencing and affecting the minutest details of our lives.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external influences increasingly create a state of flux in regards to our pre-conceived way of seeing the self, society, world, and universe at large. This therefore increases the relevancy of the 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of one's self-identity. Influenced by my Chinese heritage and my disengagement of foreign ideals in relation to the Asian context, this essay seeks to question and explore the place and possibilities of infusing Chinese aesthetic values in tandem with global culture in order to present a universal way of seeing through Art and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Singapore.

First of all, let me define what does art and design stand for me. To me, art is a depiction and expression of an experience, whereas design serves to convey a message. Good art absorbs good design principles, whereas good design can be conveyed through striking artistic values. Both are closely linked. I believe that art and design are fundamental forms of universal expression, and with it, defines the key area of discussion in this essay: the way of seeing;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being tangibles, and the way we see a subject being the intangibles.

Using western ideals at large as a case in point, we can first examine a statement from Malraux, who writes, “Western scientific, objective ways of seeing, art history, and its primary object, perspectival painting, are all par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are historically and epistemologically closely related. When one tries to see other things through this apparatus, distortions emerge.” 1 Living in Singapore, we always had to invent our own society and culture. Since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we have taken a strong stance in adopting western ideas and concepts as tools for nation building. Likewise,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how our visual aesthetics are too influenced by western ideas, and fundamentally, the western way of seeing. However, we are still fundamentally an Asian society, and drawing from my own Chinese heritage, I've always encountered a discourse towards the language of aesthetics I see and experience around me. Having been trained in fine arts since a young age of three in western modes of expression such as painting, sculpture and installation genres and practicing visual communication as a graphic designer during recent years, it is keenly observed that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Chinese values in the western design and aesthetics models we have been familiar with in the Singapore society. Can this existing way of seeing entirely allow one living in this society to fully perceive the depth and richness of what one sees, or is it the case that much is left out due to a

differenc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one perceives the world. To quote Malraux again, "this is comparable to what Javanese observers sat about Wayang and television meet, because television and Wayang have different principles." 1 While a way of seeing may work to a large ext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can it be applied seamlessly in its entirety from one social package to another?

To identity the roots for this discourse, it is perhaps fair to start by examining the primal systems humans and society operate by. Politics, being systems creating lines and borders and characterization and freedom and space and aesthetics, exists fundamentally as systems that govern not only societies, but human minds and actions as well. More importantly, it influences the way of seeing. As Jacques Ranciere puts forth about politics, "it implicitly separates those who take part from those who are excluded, and it therefore presupposes a prior aesthetic division between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the audible and the inaudible, the sayable and the unsayable".2 The field of politics, much like the fields of art and design,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as all of them possess the common ground of possibilities to shape perceptions.

Since the earlier twentieth century, Asia itself has undergone a massive influx of western influences, society, culture etc as the world itself experienced a power paradigm shift toward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part of an ongoing globalization phenomena. Singapore, being one of these nations is a state governed under the systems of democracy, an essentially western origin mode of governance aimed to create balance in society, and having undergone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years of openness toward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Asian society that has been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ways of seeing. To carry on with this examination of this discourse, it is hence important to reference history for instances whereby similar discourses have taken place.

China, in particular was undergoing decades of major cultural and societal upheaval. Significant events such a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ointed at the same core issues, of the widespread notion that China's traditionalist views need to be re-examined, as well as the urgent priority rapidly modernize by accepting western values,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etc., as superior concep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 In spite of these views, powerful political leaders and intellects like Dr Sun Yat-Sen have argued that perhaps the political models and ideologies of Europe lack values and concepts found in Asian societies and philosophies, and that these western values such as individual rights and freedoms would not be suited for Asian societies, leading to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Pan-Asianism.

"The concept of Pan-Asianism took a back seat during the Cold War"3, whereby several countries like India, Cambodia and Indonesia advocated for greater ties with the rest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within and beyond Asia, while others were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more orientated towards either one of the superpowers. It has however, encountered a sort of resurgence in recent decades with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Lee Kuan Yew, whom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 Asian values in the Singapore society. This sort of Pan-Asianism contains a unique set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which reflected the region's culture and history, creating a sense of common value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in the countries, as well as forming an ideology, and essentially a way of seeing that they could call their ow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and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ist views and liberal democr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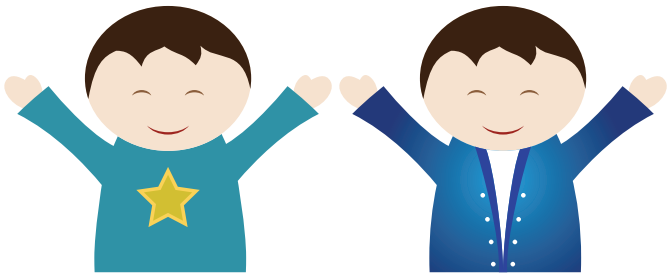
Thus, the question here is, can there be a universal way of seeing? Can one's heritage be taken as a vantage point for a fusion between the globalized and innate way of seeing? Is there even a need for a universal way of seeing at all in the society of today or in the future? Inquisition in regards to the existing system is not one of defiance, but out of fascination, in hope for a generation of a visual language that is based on both the individualistic and external and western values towards the stride for visual modernity. 泉

[1] Mrazek, Jan, and Morgan Pitelka. What's the Use of Art?: Asian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Contex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8. 294. Print.

[2] Ranciere, Jacques.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 3. Print.

[3] Stoddard, Lothrop. The Rising Tide of Colour: Against White World-supremacy. Brighton: Historical Review, 1981. Print.

谈动画艺术



Anima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文：**冯静微** 撰文(英)
何　良 译文(中)

艺术最早出现在原始人的石洞的墙上。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的石像，让艺术达到另一高峰。世界最大的艺术作品，是由我们许多代的华人创作的，在晴朗的日子里，从月球上也能看到，那就是万里长城。

我们所谓的第八艺术就是电影，动画也是电影的一种。以前动画也称卡通片，是许多儿童的最爱。卡通片是将许多画面以每秒二十四帧的速度播放，这样看起来就成了动画，而每一个画面都是由画工用手绘出。迪斯尼乐园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卡通片制作公司，它制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卡通片和卡通人物，像白雪公主，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卡通片不止是另类的艺术，它同时也包含了娱乐与教育的成分。

电脑科技让三维动画横空出世，动画进入了三度空间，也再无需用手在纸上绘画，电脑制做的高清画质，惟妙惟肖的画面，真人加上动画，让虚幻顿时成真，电影也就进入了高科技的时代。三维电影《阿凡达》卖个满堂红，看电影有了更高层次的视觉享受！从此神怪电影更传神，武侠电影更精邃，科幻电影更真实。

动画电影《花木兰》讲述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它让全世界不同种族的人民，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孝道，全球票房超过三亿美元。将来的动画必定会有更多更精彩的中华元素！

动画电影是新兴的高科技工业，也是无烟工业，回报率也很高。新加坡政府也正在大力发展这一行业，希望这一新兴工业，也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现在新加坡也有了知名跨国公司到这里投资动画业，我们的大专学府也开办了许多和动画有关的课程。

在不久的将来，4K数字电影即将登场，进入寻常百姓家。它将比现在的全高清电影还要清晰四倍。以后我们都能看的更仔细，听的更明白！有人说以后要你好看，也有人说以后你能看好！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等着瞧吧！

我还在大学修读动画，在这里以简单的描述，希望您能大略明白动画是什么？和动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希望我毕业后，也能为动画出力！

(本馆2013年大学组奖助学金得奖者)

Art has exis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constantly evolving. From the prehistoric caveman drawings to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sculptures, to the Renaissance and all the way up to post-modernism, new mediums such as photography were discovered. One

relatively new medium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early 1900s would become a well-known source of entertainment in today's age, known as animation.

So what is animation? To put in layman's terms, animation is a series of still images sequenced one after another to give the illusion of movement. Each image is called a frame. For each second of animation a typical 24 frames are required for smooth movement, although the number can be altered accordingly to get different results. This means that for traditional hand-drawn animation, 24 drawings are required per second, although 12 drawings, each shot twice, will suffice.

Animation need not be 2D (hand-drawn). Today, as technology progresses, 3D animation is arguably the most marketable and hence the most widely viewed, with successes such as Pixar Studios and Dreamworks Animation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heatres. 3D is generated by computer programs so there is no need to draw every image. With Studio Laika's release of "Coraline" (2009) and "Paranorman" (2012), however, stop-motion may be gaining popularity as well. Stop-motion relies on objects, usually puppets on an environmental set, shifted bit by bit and shot continuously to create a series of movement. Each method of animating has its own pros and cons, and will produce very different effects for the look of the film. A stop-motion film can probably depict realistic textures better while a 2D film allows for greater flexibility using different materials like watercolour or charcoal in the drawings. Different methods can also be combined for interesting results. "Enchanted" (2007) mixes 2D animation with live-action footage to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orlds in the story.

Animation is not just about technical skills. To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general coursework, good drawing skills and understanding design fundamentals are requirements, as is the ability to tell a coherent story. This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it sounds, as major studios usually take a few years to tackle the creative process and develop ideas before heading into production. And while some people say that animation is merely cartoons for children, it is not true at all. Adults can find themselves caught up in a good story and enjoy its message as much. Moreover, a lot of story ideas can be traced back to sources of old, with plenty of research done into the setting's history and culture. Disney's "Mulan" (1998) is widely popular within China for their inspiring take on her well-known legendary heroine for this reason, as is Dreamworks' "Kung Fu Panda" (2008)'s China-inspired settings. Although many liberties are taken during development, such details can allow the audience to glimpse a bit of its cultural roots while enjoying the show at the same time.

The animation industry in Singapore is something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vesting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institutions are offering courses related to media, such as Nanyang Polytechnic's School of Interactive and Digital Media, and the school of Art, Design and Media from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For learning very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animation process, CG Protégé Animation School has a list of coursework available to choose, from storyboarding to 3D modeling.

The industry is very young and still in development stage. Competition is tight due to animation being a small industry and a lot of studios outsourcing to other countries at lower costs. However, there is definitely a market. Lucas film recently set up a branch in Singapore and we do have a few known local studios – Tiny Island Productions, One Animation, etc. There are also grants available from places such as the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for those who wish to deal with independent projects, and I would encourage doing research into funding if interested.

On a final note, the media industry is varied, but all aspects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 person can study animation and still have a career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and vice-versa. Thus I am positive that the media-related market in Singapore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泉

Animation need not be 2D (hand-drawn). Today, as technology progresses, 3D animation is arguably the most marketable and hence the most widely viewed, with successes such as Pixar Studios and Dreamworks Animation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heatres.

桥牌简介

Introduction to Bridge

文：**许禄文**
By Koh Lu Wen

桥牌是使用扑克牌来玩的吃墩型游戏。桥牌1866年源自俄国，当时名称为卫斯特。1904年桥牌在美国和英国取代了卫斯特的地位而开始流行。今日，桥牌成为了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扑克牌游戏，并于1995年得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公认。桥牌也有自己的锦标赛，在新加坡，大多数的俱乐部每星期都有举行桥牌活动。

著名企业家如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都有打桥牌，巴菲特并且有说过著名的一言：“如果可以和三人一起打桥牌，我不介意坐牢！”有此可见，桥牌的名声宣扬天下，魅力无法抵挡。

其实，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于扑克牌有错误意识。桥牌是利用扑克牌的智力型游戏，和象棋属于同一类，并不是赌博。桥牌能够锻炼和提高个人的逻辑、思考和分析能力并且促进大局观和合作精神。打桥牌靠的是双人协同作战，搭档要相互补台和配合，不能单枪匹马地随心所欲。桥牌也有助培养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尤其是参加锦标赛的选手)。最后，桥牌可以丰富个人的业余生活并且提供一个消闲的途径。现在开始学桥牌吧！它的益处多多，何乐而不为呢！

桥牌能够锻炼和提高个人的逻辑、思考和分析能力并且促进大局观和合作精神。打桥牌靠的是双人协同作战，搭档要相互补台和配合，不能单枪匹马地随心所欲。桥牌也有助培养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尤其是参加锦标赛的选手)

(本馆2013年大学组奖助学金得奖者)

Bridge is a trick-taking game which originated in Russia in 1866 as ‘whist’. It became popular in the US and UK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day, Bridge is not only a popular activity around the world, it also gained recogni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 1995 as a ‘mind-sport’, therefore giving it eligibility to be considered as a sport in the Olympics. There are also many Bridge competitions held locally and worldwide for one to participate in.

Famous figures such as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and Deng Xiaoping plays Bridge and recognizes it as a sport with great value to offer. In fact, Warren Buffett once said ‘I wouldn’t mind going to jail if I had three cellmates who played bridge’. Bridge has become a popular sport for everyone regardless of their net worth or social position.

Many Singaporeans have misconceptions about Bridge, relating any games which uses poker cards to gambling in nature. In fact, Bridge is far from gambling and is under the same category as other popular mind-sports like Chess. Due to its requirement to count as well as calculate, Bridge helps to hone one’s logical and analytical thinking skills to sharpen one’s mind in other things that a person does. It also promotes cooperation among teammates to gain the most desired result. Bridge is also a game which hones one’s ability to control his/her temper as well as remain emotionally stable in trying situations. Finally, unlike competitive extreme sports, one can also play Bridge for recreation and fun for a lifetime. So pick up Bridge today! It is a great sport and you won’t regret it. 泉

天佑的人生三爱

美学思想上，孔子主张“真”、“美”必须建立在“善”的基础上，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显示孔子是从善的途径去审美和从事艺术的。从善出发，则能择善而从，择善固执，孜孜不倦，以至完美。个人认为我国著名艺术家姚天佑走的正是这条路子。
在艺术与为人处世方面，我归纳之谓天佑人生有“三爱”。

文：**王永炳博士**

爱艺术♡

天佑热爱艺术，自1953年(时23岁)始至今日，为之练之不厌、绘之不倦。他是个多元艺术家，擅长油画、水彩、胶彩及混合媒介。作品均具独特风格；抽象与具象兼备，表现手法多样化。如今，年届82高龄的他，依然兴致勃勃地为即将举行的“金婚纪念暨艺术创作60花甲回顾展”(12月14日至18日)，筹划奔波，足证他在艺术工作上已达神驰(flow)状态。这种状态可使人进入孔子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境界。

纵观天佑画作，构图新奇，主用纵横与斜线分割画面，有时虽重叠交错，但讲求均衡，气势有变化而统一，使得整个画面充满美感。如混合媒介画作“成长”，构图奇特，两株高矮不同的新苗在苍绿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象征美好的未来，寓意深刻。何和应赞曰：“这是技术与艺术灵感的巧妙结合，是创作过程中可遇不可求的优秀作品。”他用色果敢，但非常关注调和与对照，两相辉映，使得整个画面有时气势磅礴，有时秀丽潇洒。天佑重视生活感受与人生历练，从生活中取材，诸如《甘榜》、《渔村》、《马来乡村》、《小巷》、《浮脚屋》、《陋屋》、《河边》等，洋溢着强烈的时代视觉冲击力，弥漫着浓浓的南洋风味。观赏天佑作品，便可了解他的笔法大胆而细致。概括而言，他的笔触自然天成，雄健、刚劲、沉实兼而有之，刀笔兼用，却无斧凿痕迹。

天佑的艺术作品屡次获大奖，已多为国内外私人、各机构及团体分别珍藏。其艺术造诣与成就，深得国内外名家如何家良、何和应、黄建斌、沈雁、刘国、翁翼、玛戈等称颂赞誉，佳评如潮。天佑在艺术界奠定其地位，一言以蔽之曰：热爱艺术。

爱家庭

令人感到羡慕的是，天佑事业有成，同时家庭美满。他和夫人育有三男一女，学业事业各有所成。长子道艺是心理学博士，现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学生辅导中心主任，次子道统是美术广告设计员，三女姚敏在一家机构担任执行秘书，幼子道荣考获澳洲海外大学硕士学位。夫人陈如珠，贤惠和蔼，相夫教子，家庭和乐融洽。天佑之无后顾之忧，专心致志于艺术与社会工作，夫人功不可没。

从道艺《献给最敬爱的爸爸妈妈》信中，便可了解天佑治家梗概。道艺中学时，天佑早出晚归，平时难得见面，但只要孩子有需要，他总是站在身后，给予最有力的支持。道艺中学毕业时，想出国深造，但家境并不富裕，他在考虑再三之后才向父亲提出要求，没想到即刻得到父亲极大的热情反应，说：“好好争取吧，爸爸会帮助你。”简单至极的话语，充分表现出父亲那颗朴素纯真的爱心，对道艺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动力，造就了道艺学业和事业的成功。

为了使天佑专心于事业，孩子们的起居饮食，陈如珠毅然辞掉所喜爱的工作，一心一意照顾家庭。道艺走上心理学专业，与母亲的潜移默化大有关系。因为无论孩子遇到什么问题，她都能耐心开导，细心解析，使孩子们过着身心健康的生活，养成在逆境中克服重重难关与力争上游精神。

陈如珠对于家庭无私奉献，天佑有太多的感激，就在他们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特别举办“金婚纪念暨艺术创作60花甲回顾展”，目的之一就是献给太太的一份礼物，感谢她多年来的默默付出，堪称特具意义。

爱社会♡

天佑热爱社会。他以积极态度回馈社会，真心诚意地为社会服务。

天佑为人庄重，平日起居规规矩矩，待人诚信。新加坡美术总会前会长何和应说：“姚天佑为人踏实、朴素、诚恳、坦直，办事认真敢于负责，持之以恒和有条不紊；虽不善辞令，却平易近人的亲和态度待人接物，秉公处事，所以不论在社区服务，或美术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上，他的优良品质起了积极作用，领导有方，效率高，深受同行敬重。”(《姚天佑透视人生与艺术》)何和应这段话十分真实地概括了天佑的品德，极为准确。

他宽厚待人，以恕处世。他一向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对待人事，体现极大包容心。他在出任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时，吁请美术界应该打破画派的藩篱，大家共同用画笔来建设我们的社会。词诚意切，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天佑之所以慷慨陈词，乃本性宽厚使然。因为宽厚，所以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既不失言，也不失人。因此，他在“画坛上广结善缘，是艺术家中人缘最好的一个。”(何家良语)此言不虚。

天佑回馈社会的努力令人佩服。对儿童美术教育，他不遗余力。这里有个充满爱心的故事：1988年，黄金辉总统召见天佑，问他能否指导一名马来族残疾女孩哈蒂玛作画，他一口答应并亲自上门指导。期间，他发现尚有一些残疾人士对美术是有兴趣与天分的，决定在汤申民众俱乐部开设残疾人士美术班，结果有15名学员报名。洪炎光是其中之一，他全身瘫痪，只能口衔笔作画。为了使他免受往返劳顿之苦，天佑连续三年，风雨不改地到医院去耐心指导他，并且为他调色、递笔、收拾画具、清洗画笔。此种耗时费力的工作，若无爱心与耐力，何能至此?

自1953年至今日，天佑积极参与社会团体活动，几无中断时候。在社团中承当的重要任务屈指难数，例如，他担任十多个艺术团体与十多个机构、团体和会馆要职，极力推动与发展艺术活动。他认真负责、任劳任怨、谦虚稳重、公正不阿，专心踏实地投入工作，以完成工作目标为己任。

为了表扬天佑献身于艺术与社区工作，1986年，荣膺新加坡黄金辉总统公共服务奖章(PBM)；1998年，荣膺新加坡王鼎昌总统颁赐公共服务星章(BBM)，此外，还获得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的卓越贡献奖章；新加坡人民协会长期服务奖章；新加坡美术总会长期服务银奖章等。实至名归，得奖宜也。

在“金婚纪念暨艺术创作60花甲回顾展”前夕，我虔诚地祝愿天佑善人。泉

♡♡♡

林秋雅牵动了“海南南洋机工”的情缘

文：侯公

想起70年前或70年后，“南洋机工回国抗战”的那段血泪交织的史迹，几乎是有意无意的被埋没在历史的尘泥里，见不得天日。但是在历史滚滚长流中，70年后遭受泥沙封没的人与事，又被许多有心人，在良知，在正义的驱使之际；不间断的以茧厚的双手，在沉甸甸的泥沙中；挖掘寻觅被埋葬的史迹，一丝丝，一缕缕；点点滴滴的使它重见天日，是一页可歌可泣的史诗。

1. 使历史重回原位的林秋雅

“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史迹”，前后已超越一个世纪，现今能真正了解，真正晓得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的人，已是若凤毛如麟角，几乎是无迹可寻；更是跟随着无情岁月的流远，早被淘洗得干干净净。尤其是新生的一代，更是无法想像得到在70年前，曾发生过轰轰烈烈，是鲜血和生命谱写出这段抗日战争和抗拒法西斯战争侵略的历史，是赤裸裸的，活生生的；铁般的事实记载，是不容许抹煞的。

时间的潮流，是日以继夜；永不会停歇它的脚步，只顾向前迈进。虽然许多人事都暗然的消失；悠悠岁月，使记忆模糊不清。但没有了往昔，哪会可能拥有今朝？没有了以前的苦难，哪会有幸福的明天？今夕的幸福乐园，是人类以血肉去换取的代价。遗忘历史，也就是遗忘了自己……。

许多数不尽的历史真相事实，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忽视而流失无迹。人们往往用尽了脑筋，挖空了心思，是再也无法寻回一些蛛丝马迹，是永远成为历史里的历史了。

“南洋机工”的历史，前后仅仅不过是70年的历史历程，70年在历史滔滔长河里，是短促的；更是瞬息间的过往吧了，但一切都云飞烟散，倘若是再没有人去捕捉，去挖掘这段历史的故事真相的话，最终将被埋没在厚厚的尘土里。它连记忆都被湮灭了，都淘空了。

直至目前为止，参与“南洋机工”的义工，共计三千多余人，硕果仅存的；人数寥寥可数，前后不超过20人，而且年华都超越九十多岁高龄了，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参与者也会归土的一天。现时倘不及时的去发掘他们亲身经历的“口述历史”的话，历史工作者又再次的遗憾了。

寻觅历史的真相，是件非常吃力且不讨好的“差事”。在缝合、弥补，修勘“南洋机工”的历史过程中，热衷于这项历史工程的巾帼英豪林秋雅女士，她马不停蹄，日以夜继的争取时光，走南闯北，到处寻觅“机工”的踪迹。她不畏艰辛，不退缩言败或是放弃追寻的目标。这些年以来，她不间断地把这段匿隐的历史，一丝一缕；一点一滴的把它寻回，像是巧手轻快的裁缝师，一针针；一线线的把散乱，把遗失的历史碎片；重新的，小心翼翼的加工缝合，制作成一件亮丽的历史新衣。因此我说，林秋雅是位历史的衔接者，制作者；寻觅者；发掘者；弘扬者；缝合者，使失散的历史片断；使之完好无损的回到真实，并公诸于世。当归还了历史真脸谱的时刻，扭曲历史者，定会被历史巨轮辗烂无余。

只有那些目光似鼠，鸡肠鸭肚的人，才会对这项历史工程，怀有敌意与异议。但大家谈起，都竖起大拇指说：“林秋雅，真好样的”(京腔)。

2. 有关“南洋机工”的一些人事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法西斯的铁蹄，蹂躏着每一片中华大地，沿海口岸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时由侨领陈嘉庚号召组织下，在南洋征募三千两百多名“南侨机工”远赴滇缅公路，用生命与泪水，把军事战备物资，安全输送到前线、直至到抗日胜利，挽救了中华被欺凌，被蹂躏的困境。“南侨机工”在中国抗日历史上，记下一笔伟大赫赫功绩。

3. 海南人参与“南侨机工”

中华民族溢满了一腔爱国爱民的激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前提下，往往把个人的生命死活抛置于脑后。撒热血，抛头颅，也在所不惜。在许多革命的伟大事业中，有无数的客籍人与海南人，不顾一切的把生命牺牲，毅然的投入爱国革命的洪流里，与黑势力抗御到底。就以争取马来亚的自由、平等、独立，参与了马共游击队，而昂然走入森林。在这众多的革命党员当中，客人与海南人，为数可观。

在当时“南侨机工”征募三千两百多名机工，当时占有“南侨机工”总人数四分之一的八百多名是海南人。陈嘉庚先生当时赞扬说：“海南地方不大嘛，但参加的人数多，这说明海南华侨是对祖国(马来亚尚未独立前，祖国是指中国。)最关心的，是最爱国的，是最革命的。”这是海南人最引以为荣和被称颂的。

4. 海南“南侨机工”的踪迹

历史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息的。它愈走愈远，也就愈模糊不清。为了偿还历史的真相，我们在困难重叠中，把消逝的史迹，重新一一收拾弥补，追寻它的踪迹，返璞归真。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05年，华侨机工后代林晓昌会长捐资三百五十万人民币予云南畹町森林公园兴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公园，公园内设有纪念碑(碑体下端用石刻着「华之魂、侨之光」6个特大字，来彰显海外华人华侨的历史功绩。碑后是记述南侨机工抗战的浮雕长廊。左侧是南侨机工英名录，李月美(当时花木兰李月美出生于槟城，穿上军装当上司机，执行拖运任务，不幸在急转弯处不慎翻车，幸好被来自缅甸的海南籍机工杨维铨抢救，帮助受重伤的李月美，过后才知道月美原是女儿身，彼此的善良和真挚互相欣赏，最后结为夫妇，成为中国英雄的海南媳妇。)

“益群俱乐部里的墙上挂着陈宗兴和覃国传两位机工，林日波、朱华、王冠时、许福鸿、符和则、符鸿庆、陈献江、王集贵、陈正、陈日初、邢保和、陈大华、符鸿发、陈英往、邢绍鋆、林猷川、许书传、林树榕、吴永光、林猷汉等名字。槟城共有358人参加机工的运作，还有其他30人及新加坡的海南人。在2013年初，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公园里，竖立一座纪念南侨机工雕塑，海口市滨海公园内也耸立了南洋机工雕塑，纪念着这批无名英魂。

人们想要进一步去了解南侨机工的这段历史，可从云南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拍摄，制作南侨机工的纪录片获取资料。也可从《海南南侨机工回国抗战资料汇编》、《海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回忆》等书籍中，捕捉历史遗漏的一些真人真事。

5. 历史的遗憾

2009年11月1日，在新加坡琼崖联谊会举办的“南侨机工抗日七十周年交流会上”，95岁的邢谷凯乡亲，亲自讲叙在1939年在新加坡“达开尔像馆”工作时，为从不同地区到新加坡怡和轩集中的回国服务机工拍照留影。也曾为回中国服务的每位机工拍过照片。云南昆明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导播，想要拍摄这段历史，但后来都无法联系到邢谷凯老乡，让这段历史留白，更是历史的遗漏与遗憾。……

“南洋机工”不曾断层，不曾在人间蒸发，我们怎能轻易地遗忘发掘、衔接这段历史的有心人——林秋雅?

是的；抹杀历史的人，会被滔滔巨涛，淹没和卷走。我们都不是掩盖历史的罪人。而林秋雅更是默默地像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去追寻、去寻梦、去筑梦、去圆梦……，去挖掘“南侨机工”历史的有心人。她不让历史埋没在泥石洞坑里而隐没，她的精神和意志，应记下第一功。对她进行非议，讥讽、说三道四者，应会自感卑微、不自量及耻辱，不如一位女辈之流。我常觉得世间无“全”人，更无十全十美底事，只要扪心无愧，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去苦干，去圆满理想的美梦，也就不后悔此生了。你不去做，谁会去做? 秋雅，你做的好。

现今的社会与人，大多数都怀有妒嫉，心怀叵测，居心不良者多。“吃不到葡萄总是酸涩的！”自己没有能力去做，当他人去完成任务时，心底涌现了一股酸溜溜的心理现象作祟，阻挠和破坏中伤他人，是比起“小人”还不如的“阿Q”。……

“邪”不胜“正”。正义真理是禁锢不住的，它必定会获得伸张。让铁般的事实，让历史的真相，证实一切，“谗言”将是不攻自破的。

“南洋机工”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不能使它无声无息的在瞬息间消失得无迹可循，追溯历史空白是要付出代价。更是这代人的使命。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的良知。

林秋雅，你不去做，谁又会做? 肯去做是傻子吗?

世间诸事，并不是你喜欢做就能达致的。

你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增添了幸福感与自豪感，我们会永远惦记着你。这是海外海南人的傲事，记载了海南族群历史的长河史册上，辉煌不朽。林秋雅牵动了“海南机工”的情缘。泉

(稿于2013年7月7日
新加坡联邦衙・望星楼)

王家财一家四口摄于海南岛三亚

与峇淡岛一同成长的年轻企业家——王家财

文：**符慧平**(印尼 · 峇淡)

峇淡(BATAM)占地面积为415平方公里，是印尼最靠近新加坡的一个城市，距离新加坡只有二十公里，搭乘观光渡船只需40分钟便可到达。1971年开埠成立国企(Persero)发展工业和贸易。1978成为特区，致力发展工业、旅游和自由贸易。80年代初增建为自由港，政府规划发展为多元化的工商业中心及旅游城市。

1984年，21岁的王家财，正在印尼各处寻求发展机会。他辗转来到了峇淡岛，发现这个小岛具有无限的发展潜能，便开始来往于峇淡和新加坡两地，1988年定居峇淡，从事贸易、旅游、建筑及房地产等生意。

王家财，1963年生于印尼廖省摩洛(MORO)镇埠劳奘岛，祖籍海南琼海加积市。由于家境宽裕，9岁那年祖父将他送往新加坡读书，由于已超过入学年龄，因此虽未进过学堂，但却被安排插班读三年级，半年后升四年级。小学毕业后继续升读中学。初中三那年，祖父不幸过世，他便回到出生地埠劳奘岛小渔村，帮父亲打理祖父留下的渔业。那段时间，他有时还得跟着渔船队出海，负责给渔船提供补给的工作。丰收时，渔船几天就回港，但也曾在渔船上呆过个把月，尝尽了在大海上摇晃的滋味。三年后因为与父亲在管理上意见分歧，他再度回到新加坡，以

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未完成的学业。两年后又回到印尼，开始他创业、立业的人生旅途。

91年峇淡特区印尼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王家财任外交主任。精通华文的他负责中华文化圈的事务。这段不一般的经验，同时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良好基础。

89年到97年正是峇淡岛特区的发展势头，当时的峇淡可说遍地是黄金，敢闯敢拼搏的他正好搭上这趟经济发展的便车，所以很快也很轻易地就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98年，少年得志的他却在事业上遭受到极大的挫折——可怕的金融风暴及印尼的政治动乱，几乎夺走了他所有的一切，泡沫式的成功，如海市蜃楼般虚幻。

一切恢复原点后，个性坚毅的他却没有放弃战斗，仍旧继续努力奋斗。1999年重新出发，建设电子厂，从初时的30名工友一直发展到今天拥有300多名员工。2010年又再开创打火机工厂，目前正筹划在印尼其他省市设厂。

王家财虽然忙于个人的事业发展，但从不吝于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曾是1998年成立的峇淡百家姓协会中的活跃分子，同时也是2007年成立的峇淡海南公会的创始人之一。

王家财与妻子结婚17年，育有一对儿女，两个孩子目前都在新加坡接受教育。新加坡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让他在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对人有益，对己无损，对事圆满”是王家财一向来处事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人的一生中除了追求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美满外，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而立之年时王家财已想好退休生活，便于94年在民丹岛(BINTAN)购买一块约700米长，面向南中国海的海滨土地，计划慢慢将那里发展为休闲度假旅游村。人生短促，他不愿把时间掷于是非之上，也许轰轰烈烈成就一番大事业后，就会留在那片碧海蓝天的地方，平平静静地安度闲逸逍遥的晚年时光。泉

王家财与妻子儿女及父亲摄于海南祖屋

我在国大当义工经验的反思

Reflections of my volunteering experiences in NUS

文：王大铨
By Wong Daquan

这问题是我的一位协调新生营的朋友问我的，他负责招徕新生参加研讨。我不晓得国大CSC代表甚么，更不必说Ethelonter了。那是一个英文字吗？但我不少朋友都已报名参加了，而我刚在一间物流公司做了三个月无日无夜的短工，任何与同龄学友的户外活动听起来充满乐趣，同时我也觉得对我自己内向和有点笨拙的性格有些帮助，于是我也报名参加了。

我完全不晓得这是一个紧张、流汗但最终充满乐趣和个人受益的义工旅程的起点。

我是到了新生营后才晓得国大CSC是代表国大社区服务俱乐部，而Ethelonter是希腊文，意思是‘义工精神’。这就挺有意思了。但在当时，我又有了新的疑问。很多人都不会把一个成功新生营特有的玩游戏和快乐时光和义务工作挂钩。义务工作对我以及同龄学友来说是要在老人院、家庭服务中心和民众联络所从事长时间枯燥的工作，而义工给人的印象是不懂得乐趣和刻板的人。

后来的一切证明了我的无知。新生营空前成功，大家都交了新朋友，交换了电话号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新生营的协调员都是俱乐部的义工，除了展现出惊人的精力与热忱外，还锲而不舍的对新生照顾得无微不至。我能感受到这些协调员都以国大社区服务俱乐部为荣，并倾全力把工作做得最好。在新生营里，俱乐部会员与新生分享了义务工作的要义，以及俱乐部引以为荣的例常义务工作和特殊的义务项目。由于睡眠不足，我第一个承认我有点心不在焉。但俱乐部动员的庞大义工数目和项目的广泛使新生取消打退堂鼓的念头。新生营一结束后，我们新生便开始参与义务工作。虽然这些义务工作林林总总，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我们现有的资源为弱势族群服务。

新生营曲终人散后，国大繁忙的新学年开始了。对于我来说，暂时将义务工作置于脑后。但当俱乐部协调员来叫我参加下一届Ethelonter组织委员会时，我一口答应了。我的职称是‘圣淘沙助理主管’，职务是为新生和协调员策划与执行新生营最后一天在圣淘沙的游戏节目。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为这是新生营的压轴项目。各组的新生来作最后的决赛，以选出优胜者为整个新生营的总冠军。这个游戏项目要设计到需要团员们有充沛的体力，但又不失有娱乐成份和新鲜感，同时也要测试各组的团队精神。

在圣淘沙这项活动是我初尝组织这么庞大活动的滋味，令我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我现在才明白筹划一项活动是需要周全考虑很多事项，诸如雨天的应急安排、安全防范、物流处理以及新生和协调员的交通安排等等。我也明白凡事不能假定是理所当然的，必须想到活动可能失败的情况和应变措施以及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当天连绵大雨迫使我们多于预算地在室内玩游戏，以维持新生的热情和气氛。最后一分钟对安全的考量意味着我们要修订我们原先的计划，同时要以最短的时间通知协调员。我也认识到没有团队，任何事都做不成。这可从新生玩游戏，协调员、组织委员以及项目总长一起协作使到新生尽情与愉快地嬉戏得以印证。我也了解新生营的目的是要培养一批新的核心

义工，以便延续国大社区服务俱乐部的工作，同时也鼓励学生们在社区服务的大环境底下参与义务工作。

另一项我参与的义务工作得到完全不同的体验。代号C.A.N.VII是很传统的义务工作。那是向公众人士募集罐头食物和干粮，然后分发给社会上弱势人士。和大多数的义务工作一样，是需要长时间刻苦地工作，而坚定不移参与工作是义工重要的特质。这项工作的筹划不亚于新生营的筹划，我们要认定受益者、与青年执行委员会合作、物色赞助人以及募集和管理义工等。这项义务工作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减轻弱势人士的负担，也让更多新加坡人了解弱势人士的处境。

这项义工的另一半是探访受益人，我们得挨家挨户探访他们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记录下他们最适用的食品。由于我是初出茅庐，我这趟跟随一位资深义工。我们看到许多情景让我很难和新加坡的清洁、有效率和富裕生活挂钩。

这些弱势居民有许多是居住狭窄和肮脏的一房式组屋，是亟需要大扫除的。他们大多数不谙英语，我的同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他们用肤浅的潮州话、海南话和广东话和他们交谈。他们大多数家里都没有电话。有一名妇人用很长时间走到门口，我们来回三趟她才开到门。我们后来发现她有听障也不良于行。幸亏我们没有假定她不在家，否则她就错过我们的援助品。他们大多数都获得政府和非盈利团体的救济，但似乎这些物品杯水车薪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我们还普遍看到有些门被泼漆，还写上OP(意即欠钱还钱)字样。这经验是令人难过和震撼的，也使我深深地感觉到虽然大多数新加坡人都安居乐业，还有一大群无声无息默默生活的弱势群体。

这些弱势居民有许多是居住狭窄和肮脏的一房式组屋，是亟需要大扫除的。他们大多数不谙英语，我的同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他们用肤浅的潮州话、海南话和广东话和他们交谈。

还好，公众人士的反应颇热烈。我们收到排山倒海捐赠来的罐头和干粮。遇到居民家里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把家里可找到的东西来捐赠，诸如衣服、书本和旧报纸甚至浴室用品。我们广受欢迎，也博得居民的赞语并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有些居民不晓得原来这些弱势群体就住在离他们不远的组屋，他们也感谢我们让他们知道这些国人也住在同一社区里。我们当然也听到一些冷言冷语，所幸属于少数，也被公众人士超热烈的反应和热情所覆盖。义工们都非常感动，但也惊讶一般国人所展现的善心和热忱。我们也许有时被人批评为自私的一群，只会向媒体投诉东投诉西，但轮到要帮助弱势群体时，我们是不落人后的。

由于得到公众人士和众多义工的热烈支持，我们的项目获得空前成功。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完成把所需食品发送到需要帮助的家庭。我也目睹一群有决心和意志坚定的人，既使遇到挫折和阻碍，也会完成任务的。

经历过多次的历炼，我要纠正我在还未参加国大社区服务俱乐部前对义务工作错误的看法。是的，长时间的工作和忙碌的周末有时会使人在心理和生理上感到疲惫。但义务工作从来不会枯燥，如果你抱定为社区服务的决心，你感觉到那是一种乐趣。我本身从义务工作中学到许多东西，诸如团队精神、献身精神和组织技巧等。我也学会走出自我，自我检讨和改进，以及动员人们向同一目标看齐。我也目睹义工的强大力量，以及多数国人没觉察到某一些人也会出来协助。我也十分尊敬日以继夜无偿工作的义工们，为的是让弱势群体能在新加坡安居。

您还等甚麽呢？开始做个义工吧！

(本馆2013年大学组奖助学金得奖者)

向公众请求捐款 Approaching the public for donations

"Hey, would you like to join this upcoming freshman orientation camp organized by NUS CSC? It's called Ethelonter!"

This question was posed to me by a friend who was one of the facilitators of this camp, and was tasked to approach freshmen for the upcoming semester, or "freshies" as they would call it, to participate. I did not know what NUS CSC stood for, much less "Ethelonter". Was it even an English word? But several of my friends already agreed to join this camp, and coming off a tough 3 months working insane hours at a logistics company, any time spent outdoors with similarly-aged peers sounded like a lot of fun. And I figured it would help with my introverted, slightly awkward personality. So I agreed to join rather readily.

Little did I know that it was the start to an intense, sweat-filled but ultimately fun and immensely rewarding personal journey in volunteering.

It was only at the camp that I knew that NUS CSC stood for the NUS Community Service Club, and "Ethelonter" was Greek for the "spirit of volunteerism". Now it all made sense! But at that time, fresh doubts emerged in my head. Most people would not associate volunteerism with fun and games and having a good time, the very characteristics of a successful freshman orientation camp. Volunteering to me, and many of peers my age, meant long and boring hours spent in places like old age homes, family service centres and community centres. It meant lots of sweat and hard work, early mornings and burnt weekends. And volunteers were not were not exactly well-known for being fun-loving and exciting people.

And boy was I proved hopelessly ignorant. The camp was a resounding success; friendships were formed, numbers were exchanged, memories were shared. The camp facilitators, most of whom were volunteers with the club, apart from putting on an astounding display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make sure that each freshie was cared for thoroughly, and all our needs were met. It was plain to see that every one of these facilitators was proud of NUS CSC, and was determined to represent it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During the camp, members of NUS CSC's various volunteering projects and regular programmes shared passionately about each of their projects, and volunteering in general, which NUS CSC so proudly represents. Being deprived of sleep throughout the camp, I would be the first to admit I did not pay as much attention as I should have; but the sheer number of volunteers and range of programmes that CSC offered never failed to boggle the mind of us freshies. Many of us freshies started joining these activities not long after camp ended, which were diverse in nature but singular in purpose: to serve the needy and disadvantaged in Singapore, through whatever resources we had.

After the excitement of the camp died down,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freshman year in NUS began and for me, volunteering was placed on the backburner. But when a call came from my camp facilitators to join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next Ethelonter, I readily agreed. It was for the role of Sentosa Assistant IC, and with the Sentosa IC, we had to plan and execute games for the last day of camp at Sentosa, for the freshmen and facilitators. It was a huge responsibility, as Sentosa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the main highlight of the annual camp; it was where orientation groups came together to do battle one last time, to determine who was the ultimate victor and best orientation group of the entire camp. The games had to be physically intense yet fun and refreshing, and had to test the teamwork of these orientation groups to the limit.

Sentosa was my first taste of organizing a programme on such a scale, and I learnt much from the experience. I learnt that there was so much that ha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planning an event, such as wet-weather contingencies, safety precautions, as well as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freshmen and facilitators. I learnt that nothing could be taken for granted,

Busy sorting canned food!

to think of all possibilities that the event could fail and to think of contingencies, and that surprises could spring up anywhere at any moment. Sustained wet weather on the day of the event forced us to come up with more indoorgames than originally planned, to keep up the mood and energy levels of the freshies. Last-minute safety concerns meant that we had to make revisions to our original plans, and to inform the facilitators in double-quick time. I learnt that nothing could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teamwork, not only from the freshies playing the games, but also the facilitators, organizing committee members, as well as the project directors to make the games as fun and as exciting for the freshies. I also understood the purpose of a freshman orientation camp, to build up a core of new volunteers and to sustain NUS CSC's purpose, to encourage a spirit of volunteerism in students in an environment which fosters community service.

The other project I was involved in w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xperience. Project C.A.N. VII was a far more traditional volunteering project, which involved the collection of canned food and dried rations from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benefit the needy and disadvantaged people living in our society. As with most volunteering projects, it involved much hard work and long hours, and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the caus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rait one could ask for in a volunteer. The planning required in this project was no less than that of the freshman orientation camp, and involv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uitable beneficiaries, the collaboration with Youth Executive Committees and searching of sponsors, as well as the recruitment and management of volunteers. And the objectives of all this work were simple: to ease the difficult lives that many needy and disadvantaged people in Singapore were going through, and to spread awareness of the situation of these people in Singapore among the public.

Part of the project involved a 2-day beneficiary visit, where we had to conduct door-to-door visits of our selected beneficiar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s well as note down the type of food that could be suitably consumed by them. Being relatively new to these experiences, I was attached to a senior volunteer for this visit. And we saw many things that I would never associate as being part of the clean, efficient, affluent Singapore.

Many of these needy residents stayed in cramped, crusty one-room flats that were in desperate need of cleaning. Most of these residents could not converse in English, and the experience of my partner helped as he effortlessly bantered with them in a smattering of Teochew, Hokkien and Cantonese. Most of them did not own phones at home as well. There was a lady who took a long time to get to the door, and only opened the door to us after we had left and returned for the

third time. We discovered that she was hard of hearing, and could barely walk, and had shuddered at the thought that if we assumed she was not at home, she might have been conveniently overlooked by our project. Many of them were already receiving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som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ut it seemed like barely enough for them to sustain themselves. We saw doors splashed with paint, and the words "OP" had never been more commonly seen. The experience was mildly distressing and hard-hitting, and made me deeply realize that despite the comfortable lives that most Singaporeans are used to, there is a large group of needy people, who go unheard and unseen every day.

Nevertheless, the response of the public was amazing. We received overwhelming donations of canned food and dried, and where residents did not have these items at home, they offered whatever they could find at home, such as used items of clothing, books and newspaper, and even toiletries! We were greeted with kind words from many, praising us for our efforts and encouraging us to keep up the spirit. Some were unaware that many of these needy residents were only living a few blocks away from them, and thanked us for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se Singaporeans residing in the community. We did have our cynics, but they were thankfully in the minority, and took nothing away from the immense support and goodwill shown from the members of the public. The volunteers were not only touched, but also surprised at the kindness of the average Singaporean. We could be portrayed as self-centred individuals who like to complain about this and that in the media, but when it comes down to helping those in need, we could be quite a generous lot.

Many of these needy residents stayed in cramped, crusty one-room flats that were in desperate need of cleaning. Most of these residents could not converse in English, and the experience of my partner helped as he effortlessly bantered with them in a smattering of Teochew, Hokkien and Cantonese.

Thanks to the great help of the public and hundreds of enthusiastic volunteers, the project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we managed to deliver the required amounts of food to the hundreds of needy residents that we pledged help to. It also opened my eyes to what a group of committed, single-minded people could accomplish, if we stuck to our guns despite encountering setbacks and obstacles.

Thanks to these experiences and many more, I stand corrected on my views towards volunteering, views which I had cynically harboured prior to joining NUS CSC. Yes, long hours and burnt weekends are expected, and it can be emotionally and physically exhausting at times. But it is never boring, and can even be fun, if you have a singular purpose to help and to serve the community. I have learnt so much from my experiences in volunteering, such as teamwork, commitment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I have learnt to break out from my shell, acknowledge and improve on my weaknesses, and and engage people to align to a common purpose. I have seen how dynamic volunteers can be, and how much help is needed from a sector of people that most Singaporeans are not aware of, and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I have gained much respect for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it day in, day out, without monetary reward, in order to make Singapore a better place to live in for the needy.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Start volunteering now! 泉

文：**吴先皓** (本馆2013年大学组奖助学金得奖者)

作者是一名在南大修读历史的大学生。作者之前在淡马锡理工学院修智能建筑，并代表学校参加辩论比赛。作者对罗马历史非常感兴趣，特别研究罗马帝国与汉朝的共同点。

我们现代文化中的西方影响

Western Influences In Our Modern Culture

满清末年，清政府为了跟上西方的科技进展，派送了许多秀才出国去专研西方理科。这些到西方国家的学者不但更深入了解西方的科技， 就连他们对于社会与民生课题的看法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虽然这些学生是由清政府资助出国读书的， 但是他们却因为长时间在西方国家生活而产生了反清想法。西方国家的思想哲学，譬如民主、宪法等都摄入在许多中国政治与思想家的脑海里。他们在回到中国后短短半个世纪内，就开始推广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给华人社会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可惜这些革命家却因为无法和保守派达成共识，在建立政府时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这些学者因为长期在外地生活而不能亲自体验当时中国民间的意见和看法，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背景质疑。这群被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华学生在对于建立新政府的困难与他们对自己背景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在一个国际化的社会里，我们必须探讨中西文化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的可能性。

这课题对新加坡而言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我国有许许多多去西方国家留学的大学生。我们需要了解如何让这群学生了解东方文化对于我国的重要性，并如何避免强行把西方文化灌输到那些比较传统的国民。

他们必须在推广西方文化时探讨怎么把这些思想妥当地利用在一个

重视东方文化的小岛国，他们也必须要稍稍调整西方思想以便能更好地利用它来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来。就如历史家迈克尔·嘎斯特教授所说，中国革命家所遇到的困难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许多西方的思想是针对西方国家而不是东方国家的问题而造成的。[1]

我们能利用历史来了解新加坡人是如何给自己的文化定义的。是以从小就学习英文而把自己看成一个西方国家的吗？还是以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把自己定为一个东方国家？ 这是我们在阅读对近代华人社会有大量影响的历史人物时必须思考的问题。孙中山，宋嘉树与蔡元培等人物都是从年轻时就到西方国家念书。如果我们没法把他们看成土生土长的东方人，那我们必须重新以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也必须了解今天的文化与未来的转变，年轻一代必须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文化史。

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纤细的了解文化改变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这让我们更加能面对国际化所带来的困难。我们是不能忽略历史的。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Qing government began sending numerous scholars to western nations to try and catch up with the western world technologically. However, the impact of these “westernised” scholars not only gained western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ut were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ideals.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whereby Chinese began to learn about western ideas such as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 In less than half a century, these scholars not only introduce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to China, but radically changed the Chinese culture as a whole. Sadly, their inability to reach a consensus with the traditionalist caused numerous problems for the first Chinese Republic.

The long duration spent away from home has resulted in them being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point of view of people who were not westernised. This is an area that is worth studying in a rapidly globalised world, which requires us to reconcile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s alike.

This is also an area of study relevant to Singapore. As more and more young students are venturing to western universities for their higher studies, we will need to address how to ensure these students can relate to the rest of Singaporeans. As we are becoming more exposed to western influences, we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its implication and impact on our society. We should learn to avoid the issues faced by the revolutionaries when they are building an eastern nation influenced by western thoughts and institutions. It is advisable not to make the mistakes of these revolutionaries, whom failed to understand many western ideals are solution aimed to deal with western problems. [1]

It is through the study of history that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our own modern culture. Should we perceive ourselves as a western nation because our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ince primary school is in English? Or should we continue to view ourselves as Asian nation?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has always remained with us whenever we study influential Chinese figures such as Sun Yat-Sen and his advisers who were western educated Chinese. If the people who influence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re said to be westernised, then we must reconsider what does it meant to be a Chinese. As such, the study of history remains a hugely important aspect of education today, and better prepare ourselves in this globalised world. History cannot be neglected. 泉

[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pg 494

In action for NTU against NUS in recent SUNIG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女子足球日益引人注目

Raising Awareness On Women's Football

文：陈慧仪
By Priscilla Tan

足球一路来是新加坡热门的运动项目，直到如今亦如此。1998年第一届‘亚细安虎牌杯’决赛，凭沙西古玛一粒有争论性的进球打败越南队夺冠，成为传奇般一代传一代。自此，我们的雄狮队发奋图强，于2005年赢得亚洲足总颁发的“年度进步奖”和三度夺得‘亚细安虎牌杯’(现改称‘亚细安铃木杯’)。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加上政府和媒体都顺应潮流。随着2012年打败泰国队夺得‘亚细安铃木杯’掀起的热潮，新传媒亦主办第一届足球比赛，称作‘首发XI’，吸引了全国1400位业余球员参加。这项目的成功重点发布于今年2013第二球季内，吸引了16个国家派队参加。然而，当父亲和儿子都热衷于足球时，有多少人会

关注新加坡女子足球运动呢?

自我孩提时起，父亲便带我去观看足球赛。虽然这种运动主要是男人的天地，观看足球赛亦燃起我对足球的热爱。我开始和同龄的男孩一起踢足球直到我念中学，我多想能加入女子足球队。我的梦想成真是在我报读维初直通车课程后。大约我把维初女子足球队建立起来四年后，我很荣幸能代表国家女子足球队参加2012年亚细安大学运动会的女子足球赛，虽然表现差强人意。

新加坡要发展女子足球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亚洲足球强国如日本和泰国的女足，在国际体坛上成绩彪炳，我们望尘莫及。许多新加坡人还是认为足球是男人的专利；他们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女足的茁长。缺乏应有的支持和认同便形成一个恶循环，运动员缺乏推动力，成绩也因而平平。

虽然对女足的认知逐渐增加，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使女足在年轻球员中更普遍化。女子足球队的潜能还有待开发。倘若能够得到诸如足总和新加坡体理会等机构在财政上的资助，我有信心新加坡女子足球队有朝一日定能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复制雄狮队成功的经历。

(本馆2013年大学组奖助学金得奖者)

Football has always been very much a part of the sporting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still continues to be today. The first 'Tiger Cup' finals win against Vietnam from a controversial Sasi Kumar goal in 1998 is a football 'legend'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Since then, our 'underdog' Lions team have surged on to achieve the Asian Football Federation's 'Mover of the Year' award in 2005, and secure three more 'Tiger Cup's (now know as the AFF Suzuki cup).

The Singapore Sports Council, together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local media are also riding the tide. Following the enthusiasm and pride from the most recent Suzuki Cup win over Thailand in 2012, Mediacorp launched their first football reality competition, the First XI, which attracted over 1400 amateurs nationwide. The success of this program is highlighted in a second season running this year, attracting participants from 16 different countries. However, as fathers and sons bask in the accomplishments of our local football scene, how much is known about Women's football in Singapore?

Since I was a kid, my dad would bring me to watch football matches. Although a sport largely dominated and appreciated by males only, this exposure inevitably nurtured my passion for football. I started playing football with boys of my age until I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and had a dream to play in a girls' football team. It was realised when I was approached to try out for the Direct-School-Admission (DSA) spot in Victoria Junior College. Almost 4 years after successfully making the VJC soccer girls' squad, I have been gifted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for Singapore's first women's football team at the ASEAN University games 2012, and am a proud representative of National Womens' Team. However, my achievements were not without struggles.

Singapore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its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women's football team. Counterpart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Thailand, both of whom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re playing at standards that we remain a far cry from. Many Singaporeans believe football to be a male dominated sport as aforementioned, and remain skeptical towards the increase in female participation. This lack of support and awareness proves to be the catalyst to a vicious cycle, fueling the lack of athlete motivation and hence results.

Despite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recognition, more work can still be done in order to gain more popularity among the younger players. The great potential of the women's football team has yet to be realized, and with more resources and support from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and the Singapore Sports Council, I am confident that Singapore's women's football team can eventually rise to the level of competition displayed by our rival countries, and replicate the success experienced by our Lions team. 泉

Team photo after our last game in Bangkok

The end of yet another year – the year 2013 年终总结

By **Wee Zhen Yi**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Year 4 Accountancy Student

文：**王贞嬉**
新加坡管理大学四年级生
(本馆2013年大学组奖助学金得奖者)

又一年即将过去。在2013年来到结尾的同时，我们有兴趣知道的是，本地，区域和全球的新去向和新展望。就在近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总理李显龙向新加坡人概述了近期的经济走向和未来20年的发展蓝图。这意味着什么?

延续了新加坡对母语教育的理念， 总理强调学习华语的重要性。今天，新加坡的年轻人在世界各地留下脚印，来去香港和中国内地省的次数也极为频繁。不难发现，学习华语，并且说一口好华语是多么重要的。我本身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修读会计和精算学。在跨国公司纷纷努力打入中国市场的大环境下，许多经商和就业机会都在中国。撇开工作原因不谈，身为华侨的我们，学习母语也是了解华族文化的必经途径。

和以往的国庆群众大会不一样的是，今年提出的政策更为亲民。 如今的民间课题，不外是房屋和医药问题。那今年的大会向新加坡人派了什么“红包”呢？以下是大会部份摘要:

医药

在医药方面，政府将为健保双全计划(Medishield)进行三项改革。好消息是，在不久的将来，这项计划将不再有90岁的年龄定限。再来，在之前的计划下，一些已患上疾病的人士不能受保。而新的制度则会让所有人投保，并且不提供退出的选择。第三，这项计划也可能提供更完善的医疗保护。

住屋

住屋课题也是人民的顾虑。先前就已实行的特别公积金购屋津贴(Special CPF Housing Grant)将提高申请资格的入息上限， 从$2,250 增加至$6,500。四房式组屋申请者也能获得津贴。再来，一项住屋新计划，住屋提升津贴(Step-up CPF Housing Grant)也会帮助未发展组屋区(non-mature estates)的两房式组屋者提升至三房式。

在这个全球日益变迁的环境下，我们面对的是改革和改变。俗语说“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唯一的不变就是改变。对20来岁，未经社会磨练的我来说，这些政策变化也许是人生的冰山一角。 社会为应变，将不断求新。

As the year 2013 draws to a close, we are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lies ahead for us in the local, regional and even the global arena. In the recent National Day Rally (NDR),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outlined the 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unveiled the blueprint for the next 20 years. How will these changes impact us?

In line with Singapore's Mother Tongue Policy, the Prime Minister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 Singaporeans, young and old are increasingly mobile. They leave their tra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many have been to China, not just once but perhaps multiple tim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realize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speak and write well in Chinese. As a student in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MU), I am reading Accountancy with a second major in actuarial science. 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vie to win a share of the Chinese market, I soon realized that many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re found in China. Moreover, business reasons aside, learning the mother tongue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 for us to get to know our own Chinese culture.

In a rather radical move, the Prime Minister also presented us with policies that seem much more populist than ever. Our bread and butter issues of today are very tied up with our housing and medical needs. So what are some of the related goodies that we can look forward to in the near future? Let's take a look:

Medical

To help us cope with rising medical costs, the government is proposing to upgrade the Medishield scheme to Medishield Life. As such, three distinct changes are proposed. Firstly, there will no longer be an age limit for insurance cover and those above 90 years old will continue to be in the scheme. Secondly, those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or illnesses will no longer be excluded from the programme. In other words, the Medishield Life scheme will literally cover all for their entire life. Lastly, the scheme is also expected to give better and improved insurance coverage. But what this also means is that premiums are expected to go up and the opt-out option will no longer be available.

Housing

In a key move to curb rising housing cost, the Special CPF Housing Grant has undergone a revamp, and the income ceiling was raised from $2,250 to $6,500. The grant will also be extended to cover 4-room flats applicants. To help HDB upgraders, a Step-up CPF Housing Grant was also introduced to allow those who are staying in 2-room flats in non-mature estates to upgrade easily.

In a world of rapid changes, what we have to face is uncertainty and transformations. As cliché as it sounds, we all know that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As a budding young undergraduate, these policy changes are likely to be a very small fraction of what I would see in my lifetime. As society adapts, I too will. And I must. We all have to. 泉

槟城五层楼

孙中山和槟城五层楼

文：**朵拉**(马来西亚)

在国外求学，回来度假的年轻小友问我：“你说你是老槟城，那你听过红毛路(注)的那间鬼屋吗？”(注：红毛为福建话，意指洋人。)

槟城的路名极具槟城特色。英文名是一个，中文名是另一个，市井小民唤的又是不同的一个，但全是指向同一条路。

英文名为northarm road，一般岛民直称“百万富翁路”，一听便知道大众对这条路的观感。莱特刚占领槟岛时，刻意规划这一区为洋人所在地，是当时的黄金地段，至19世纪末，这里的房子逐渐落入华裔富商及达官显要之手。

红毛路的历史悠久，说有鬼屋，不足为奇。我好奇的是，小友指的鬼屋究竟是哪一幢？时已渐黄昏，我开车载多年在国外深造的年轻小友穿过红毛路。沿着海边走，两旁皆为风格独特的洋楼，充满欧美风情的别墅，间中杂有后期建筑的高楼大厦，多为价格昂贵的高级公寓或办公大楼。

一路古树苍天，环境清雅，快到东北部时，小友指着对面庭院宽敞的破旧大屋说：“应该就是那幢楼了！”

啊！小友你说的是五层楼！

“五层楼？”小友叫起来，“这有五层楼吗？”

有四个华文大字——时中分校

这一条路我时常走，自世遗古迹区或是渡轮码头，回家的路必得经过，我知道五层楼，槟城人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仔细去观看。它好象永远就在哪儿，永远会在哪儿，成为一个永恒的标志，所以人人都忽略了。

底下一层，楼上一层，看着就是两层楼。小友伸手指头笃着计算，话犹未完，自己推翻自己：咦，不对，应该是三层楼。

最底下的那楼，比较低矮。上边的两层，极像欧洲的古堡，楼板和天花板的间距极高。屋子的窗户上边剩下几片破损的玻璃，空空的大窗口，以洞门大开的姿态迎接沧桑一日一日一点一点来袭，苍茫的暮色把窗内渲染得黑黝黝。

是什么时候破落若此？向来熟视无睹的我抑止不住惊讶，把车子停在路边。

本来围着砖块和铁栏篱芭已荡然无存，空荡荡的大片庭院，只有丛生的杂草，还有几棵阴郁的大树。残破的屋顶，无法完全遮盖住房子，热带的丰盛雨水和充足阳光，让蓊郁的树及攀藤类的叶子繁茂地粘贴在老墙上，看着是一片荒凉萧瑟。

有头发的屋子！年轻小友说出她稀奇古怪的幻想，一看，却没有错，攀附在屋子墙边和生长在屋顶上的树，真像一间头上长了黯绿头发的老房子。

楼下没有大门，二楼的门面，有四个华文大字：“时中分校”，下边则为英文“Shih Chung Branch School”。

槟城的英语很有槟城特色，一个学校的名字，揉和了中国和西洋的两种文化。Shih Chung 是中文“时中”的音译，Branch School则转成英文，分校的意思。

传说当年创办这学校的人，崇拜孔子，认为应该时时保持中庸，所以叫时中学校。

“你怎么说这是鬼屋？”我问小友。

“我有一些洋同学来过，他们拍照回去，告诉我说这叫槟城鬼屋。”小友似有被我冤枉的委屈：“你看不像吗？阴沉沉的，很有鬼气呀！”

一个被人遗忘的荒芜大宅，盘根错节的苍劲树根紧紧地在底下攒住斑驳生苔的墙壁，颓垣败瓦有一大半被强悍的簇密绿叶霸占，时值黄昏，又逢天快落雨，乌云密布的阴霾天色，被岁月无情地侵蚀得老朽的废墟，使得不识民国历史，不知槟城旧事的小友视它为鬼屋。

1895年首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开始奔走海外寻求支援，1905年终于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一个由几个革命团体联盟的组织，采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为基本理念。

后来孙中山与胡汉民、黄兴等到新加坡，经过吉隆坡抵达槟城。由于屡次革命失败，他已不容于满清政府，连日本、南洋荷兰属地等，也拒绝让他登岸，距离中国比较近的地方，只有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小岛槟榔屿。

抵达槟榔屿，经一位邱先生介绍，住中路65号小兰亭俱乐部，也就是今天的槟城阅书报社。此地曾为福建女校(后改名槟华女子小学)校址，是我的母校。孙中山到槟榔屿，因为有人要引荐他去见一位富商，却遭受拒绝；庆幸的是，在这里孙中山认识了两个重要的革命支持者，吴世荣与黄金庆。他们对孙中山提倡革命，推翻昏庸的满清政府的言论，佩服不已，除了热情招待，且介绍热心爱国的南洋朋友，这些人后来大多加入同盟会成为会员。小兰亭俱乐部变成他们聚会的场所，在这里联络感情，发表演说，互相讨论，同时灌输三民主义思想。

阅书报社是孙中山纪念馆

今日屹立于中路65号的槟城阅书报社，也是槟城孙中山纪念馆，即当年小兰亭俱乐部，院子中间矗立着由槟城孙中山博物馆研究中心前任主席叶丹林出资的三人铜像。中间伸出手来喊前进的是孙中山，左右两边就是孙先生的死忠拥护者，为革命而倾家荡产的吴世荣和黄金庆。

1907年，孙中山再偕胡汉民、黄兴来槟，这次也包括汪精卫，仍宿于小兰亭俱乐部。他们在椰脚街22号平章会馆(现已改建成槟州华人大会堂)发表演说，呼吁革命救国，要求人民颠覆满清政府，获得热烈掌声，但与会者亦有保皇党党员，当场起来责备革命党诋毁皇太后，以平章会馆作为华侨公共机关，不应当作此无父无君的演讲。经过

槟城阅书报社暨孙中山纪念馆

这次辩论，平章会馆恐怕得罪保皇党，重新制订章程，往后再不许于平章会馆作革命演说和集会。

孙中山本来于1906年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分会，并称“南洋支部”(也是“南洋总机关部”)为南洋革命指挥总部。后来却因陶成章和章太炎的倒孙事件，令新加坡同志对他失去信心。可是，在槟榔屿，除了吴世荣与黄金庆二人，尚有很多愿意与他生死相随的革命支持者如陈新政、熊玉珊、杨汉翔、林世安等等。孙中山的筹款对象本来只侧重在富商、矿家、种植园主等大资本家，但是，槟榔屿的小商店老板，教师、店员、矿工、园丘工人、小贩甚至人力车夫等亦纷纷献出他们的力量，积少成多齐来支持革命。

1908年，吴世荣在他位于亚依淡的瑞福园开会，正式成立槟城阅书报社。章程由汪精卫起草。是年年底召集大会，吴世荣被选为创会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1909年1月设址于黄金庆的柑仔园94号，另外还有浮罗山背徐瑞霖主持的公益书报社和大山脚林世安主持的华侨书报社，包括黄金庆的维新书室，全是革命党人聚集的阵地。当年英属马来亚，同盟会是地下组织，各个名称的阅书报社，都是借其名来行革命宣传活动之事，在马新两地的阅书报社前后超过50个。

槟榔屿成为孙中山南洋革命基地

1910年4月，汪精卫在北京试图谋杀满清摄政王失败被捕，消息震惊了槟榔屿一众革命同志，他们又一次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牺牲，其中以当年巨富吴世荣和黄金庆，始终不渝，为了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竭尽所有资源和个人财富。这段期间新加坡同盟会出现反对孙中山派系的情绪，孙在新能获得的支持有所局限，而槟榔屿的同志矢志不改，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于是转移到槟榔屿。槟榔屿成为孙中山南洋革命基地。

史上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就是在槟榔屿策划的。史家称“庇能会议”，乃英文PENANG音译。会议召开日期为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动员了所有支持者的财力物力，筹款运动在马来亚各大城小镇展开，筹得47,663叻币，占当时海外华社筹获的款项之四分之一。不过，广州三二九之役，也就是第二次广州起义，仍然以失败告终，且牺牲惨重，是历史上最壮烈之役，却轰动国内外，深远地影响了日后的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证实共有86位烈士殉身)，马新华侨占了30名，其中有4人(罗仲霍、周华、陈文褒、李雁南)来自槟榔屿。

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这个消息一传到南洋，支持者立即汇叻币2万元到香港，用以稳住革命军政府，海外华侨的汇款在巩固革命成果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有听过“庇能会议”？

2010年10月我到武汉出席“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会后到神农架采风旅游，从神农架回武汉时，车上的人都累得在打盹，不容易睡着的我，盯着窗外看，经过一市区，穿过车外一片闪烁的灯火，街头熙攘的人群，一座层层梯阶的小丘上边有两个大字“武昌”，不禁“咦”地一声。坐在我旁边来自山东临沂的王先生说：“武昌火车站。”然后问我“你听过武昌吗？‘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我当然听过“武昌起义”，但是，来自中国山东的王，可能没有听过“庇能会议”。“广州起义”，“武昌起义”，都是“庇能会议”的结果。“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政权，在创建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海外华侨扮演了积极的重要的角色，“庇能会议”却不为人知。

眼前幽寂寥落的五层楼，残旧颓败看似仅存三层，毫不起眼。但在洋楼旁边的那条路原名为“五层楼厝边路”，这是福建话发音，意思是“五层楼屋子旁边的路”，可见得五层楼当年的风光。1880年，这栋傲视乔治市的典丽宏伟洋楼为19世纪槟榔屿富商谢德顺、谢德泰兄弟所建。谢德顺将他膝下唯一的女儿谢柳美(亦有一说是名谢柳眉)，许配给吴世荣为妻。

吴世荣，祖籍福建海澄县人，1875年生于槟榔屿富商之家，父亲吴有才是槟榔屿著名富商，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在华侨社会颇著声誉。吴世荣年轻时继承家业，从事面粉、面条和火柴生意，店名瑞福号。他生活俭省，粗茶淡饭，时常着袭乌布裤，以节省洗衣费，有“乌布裤之子”称号。吴世荣克己节俭，但对慈善与革命事业，援助巨资而面不改色。他和谢柳美婚后，一家十余口曾居住在五层楼。1904年女儿吴丽川就在这里出生。这栋豪华大院，年节时灯火辉煌，宾客如鲫。

吴世荣的妻弟谢松山后来回忆说：“‘庇能会议’后次年，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呼应。1912年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国民华临时政府，吴世荣作为南洋各埠同盟会的总代表，回国出席开国大典。”

孙中山名言：“华侨是革命之母”

当时孙中山在上海码头等待，“轮船的汽笛声打破了浦江两岸暂时的萧寂，十多分钟后，一位身着风衣的翩翩男子，出现在舱门口，军乐再次响了起来，等待的人们肃然起敬。孙中山百感交集，箭步上前，与这位男子紧紧拥抱。寒暄之后，孙中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以最为亲切和诚挚的口吻，说出了后来史家常常津津乐道的那句名言：‘华侨是革命之母。’从上海码头登陆的这个人，就是南洋华侨吴世荣。”

“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出处原来在这儿。谢松山说“吴世荣从1905年开始认识孙中山后，前后十次的起义，每一次他都积极筹款，迎来辛亥的胜利时，他早就倾家荡产了。”“由于他专心一志为革命事业奔走，差不多把父亲遗下来的各项生意逐渐荒废了，但他仍然不以为意；相反的，苟因事业有所急需，他不惜向人举债应付。”“他宁可将自己的产业，一块一块地卖去，而不愿坐视党人的困难。”

腰缠万贯的吴世荣，把革命当成神圣的使命，鼎力支持，自己的地卖光了，还把妻子的金银珠宝典当赞助革命，最后连嫁妆五层楼也出售。吊诡的是，购下五层楼的人，是清朝驻槟领事戴喜云。售楼款项拿去充当革命经费，付钱去推翻满清的人却是清朝官员。

五层楼再度成为中国的领事馆

戴喜云也是一个传奇人物，24岁从广东大埔南来，抵达槟榔屿时身无分文，开始从苦力做起，后经营药行并从事鸦片酒类等生意致富，是20世纪在槟城拥有最大城市产业的人。他的官位是1908年因捐三万金兴建北京模范监狱，并在几次水灾中捐纳巨款而获得清廷颁给官衔。戴喜云将五层楼作为华人领事馆。武昌起义成功，戴喜云辞去清朝官位，儿子戴淑原马上任民国驻槟领事，五层楼再度成为中国的领事馆。

戴喜云逝世后，中国领事馆被改为酒店，欲仿效星嘉坡莱佛士酒店，命名为槟城莱佛士，可惜不久便闭门竭业了。

1915年间，梁恩权，应权两兄弟，遵从父亲梁碧如遗嘱，租借五层楼办碧如女学，经费由梁家承担，招收女学生，教导刺绣图画等专科，直到1920年，英殖民政府施学校注册条例法令下停办。1937年，由于时中学校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校舍不敷使用，戴氏兄弟拨款四千余元修复祖业，廉价租予时中立分校。1941年，东亚战事期间，英殖民政府征用为军事指挥机关。隔年，日军占领后，成为日军政府办事处，二战结束，英国人重返，又被英国人占据使用。1946年时中学校复办，向英方要求归还，3年后英政府才将五层楼还给时中分校，1994年停办，因戴氏后代已将此楼脱售他人。

我曾经看过五层楼的旧照片。宽阔的庭院，花木扶疏，庭院外边还有几棵火凤凰，像火焰一样的红花，燃亮了周边的风景。典雅华丽、气势宏伟、精雕细琢的五层楼，因占地宽广，楼似不高，其实是槟榔屿当年最引以为傲的最高建筑，最明显、最豪华的乔治市地标。在五层楼院子里，近围墙旁边有一排矮房子，听说是工人的居所。老照片里，一辆载人的三轮车在墙外经过。

岁月像车轮一样缓缓地流转过去。

有这么漂亮？年轻小友无法想像。100年？那些人离我太远了！那么久以前的事。年轻小友摇头，不太明白你说的故事，但是，住在里边的人都死了吧？那也就是鬼屋了嘛。

期待市政府修复保留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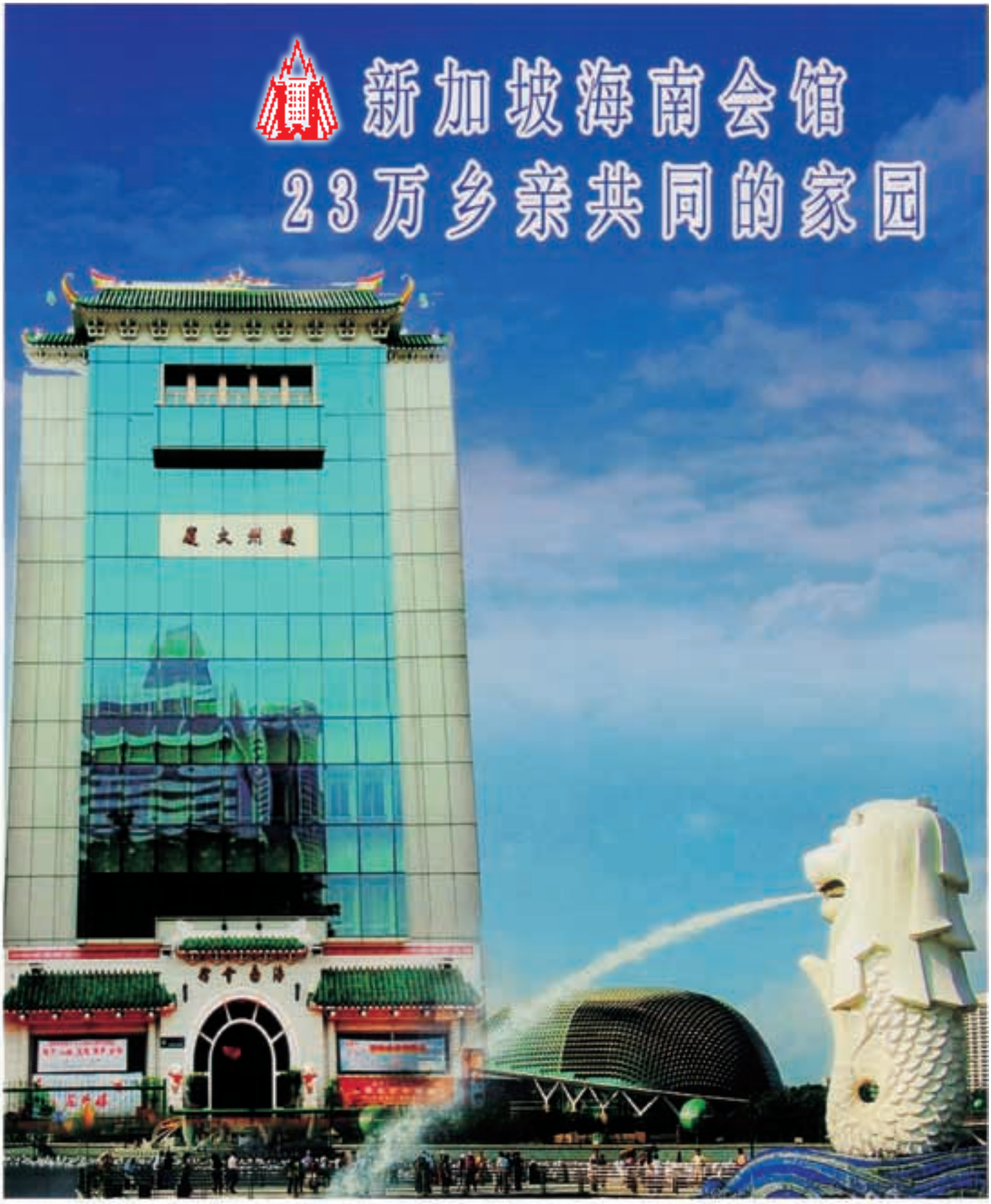
暮色中，黯暗的楼内仿佛人影晃晃，是孙中山？是黄金庆？还是吴世荣？当年为革命奔波、付出、不遗余力的人都不在了，这19世纪槟榔屿最具特色，最夺目的五层楼也快坍塌了！人们时常安慰说没关系，历史的记录会留下来，然而，文字的记载只能启动想象，真正摸得着的物证仍归建筑的历史。

满载历史和蕴含文化价值的五层楼，本是遗存丰厚，风情别具的老房子，因为自己的不珍惜，现在在外国人和年轻人眼里已成一幢空洞阴幽的鬼屋！人们期待市政府的修复行动，但愿不是重建另一座崭新的高楼，那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另一种抹煞。

重新启动车子，我一踩油，五层楼过去了，暮霭仍旧沉沉，但是，孙中山先生以行动告诉我们，把希望放在明天吧！

明天将会是新的一天。泉

写于2013.09.03于槟城



新加坡海南会馆　　琼州天后宫

47 BEACH ROAD, #01-01/02, KHENG CHIU BUILDING, SINGAPORE 189683

TEL: 6336 3457, 6339 9685 FAX: 6339 0815 Website :http://www.hainan.org.sg